# 炎黄春秋

第4期
2013年

## 本刊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

## 中国政改研究会的来龙去脉

## 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

## 李慎之逝世十周年祭

##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 目 录


**特 稿**

1 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本刊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 ……本刊编辑部

**亲历记**

8 《社会报》在改革浪潮中起落 ……蓝成东
11 中国政改研究会的来龙去脉 ……杜 光
15 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陈仲旋
21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朱维铮 口述 金光耀 采访整理

**沉思录**

27 李慎之逝世十周年祭 ……董 健 口述 高子文 整理
32 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 ……孙旭培

**求实篇**

38 党在法下：八二宪法的关键原则 ……黄 钟
45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 ……沈志华
51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 ……胡学常

**往事录**

56 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 ……马龙闪
62 “灰皮书”的由来与发展 ……张惠卿
69 也说《顾准文集》的出版 ……唐继无

**人物志**

71 关于牟宜之 ……李 锐
73 毛泽东与胡风事件 ……钱理群
78 蒋荫恩其人其事 ……王 鹏

**故纸堆**

80 1942年《大公报》怎样披露河南大灾 …… 张高峰（遗稿）

**品书斋**

84 假如郭小川活到今天 ……邵燕祥
87 《鲁迅嘉言录》献词 ……曾彦修

**海外事**

91 同一个诺奖，不同的命运 ……陈为人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谆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本期：终审 杨继绳　执行主编 徐庆全　校对 英 进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 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

## ——本刊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

○　本刊编辑部

《炎黄春秋》2013年新春联谊会会场

2013年2月27日上午，“《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北京大方饭店举行。本刊的编委、作者和读者13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总编辑吴思主持，社长杜导正致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希清代表研究会讲话，他说，在杜老和社委会的领导下，在各位同仁的

共同促进下，这份杂志越办越好。尽管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但17万的发行量，绝大部分都是自费订阅，这说明这份期刊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李锐、江平、资中筠、高尚全、胡德平、李洪林、高锴、钱理群、陆德、胡德华、浦志强、周志兴、钟沛璋、刘苏里、高放、马晓力、周晓平（代表周有光）、蒋彦永等陆续发言。杜光和魏久明带来了书面发言。下面是发言摘要。

**杜导正：**欢迎大家出席本刊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我代表杂志社全体人员讲几句话。第一，现在改革的呼声非常高，改革的共识在哪里？大家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依我看，改革的共识早就放在那里了，那就是八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公民行为的底线。推进改革，就是要落实宪法赋予每一个党派、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本刊“新年献辞”已经详细进行了论述。新的一年，本刊将高举八二宪法这面旗帜，不遗余力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本刊是以刊登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的，对于建国后六十多年来的历史，不管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一直恪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真实的反映历史原貌。对前三十年的历史，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作了“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对这个决议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决议已经对那三十年的历史作出了较为客观的总结。我们在讨论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时，不要忘了这个决议；我们今后刊发文章和讨论问题，仍然会守住这个底线。第三、2012年，有关部门曾要求我们进行改制。本刊从创刊开始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国家没有给一文钱，没有给一个编制，一直是按照企业的经营方式运转。我的老朋友朱厚泽同意我的话，说炎黄春秋是个“四不像”体制，这是与那些拿着国家的钱和编制比较得出来说法。其实，这个“四不像”体制，实际上就是企业的体制，也就是有关部门所说的“转企”；换句话说，有关部门要求我们的改制路子，我们二十多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实在是没有改制的必要。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去年那次改制就没有再进行下去，有关部门也没有再找我们。

目前，杂志运转良好，发行量日日增多。从杂志领导体制来说，社委会是最高领导机构，第一线有吴思、杨继绳、徐庆全“三驾马车”具体工作，是稳定的体制结构。第四，我一再说，我们能走到今天，而且还愈来愈多的得到读者的肯定，与我们的编委会成员的大力支持、与几千位作者、几十万读者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是走不到今天的。在这里，我还要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与我们共同坚守。谢谢大家。

**李锐：**刚才杜老讲话，要高举八二宪法这面旗帜，我非常赞同。当年，鲁迅写过《呐喊》，对当时的社会体制发出改变的声音。炎黄春秋就要举宪法的旗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呐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推进政治体改革而说话，我在88岁时写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最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用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宪政大开张，需要的是大家不断呼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炎黄春秋有17万多份的发行量，应该是几百万读者，有他们的支持，有我们在座的人的努力，炎黄春秋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上，应该会有更大的作用，影响更多的人。现在，我们还要关注另一个问题：环境问题。这不是个政治问题，确实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现在环境的恶劣，雾霾、污染等都很严重。过去，我们这个党是农民党，文化水平较差，科学素质也比较差。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说，我们要建设工厂，从天安门望去，到处都是烟囱。现在，我们不再干这样的傻事了，但是，对于环境重视的程度还不够，要加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江平：**《炎黄春秋》新年献辞讲宪法，实际上涉及宪政的问题。宪政应该是依法治国的表现。但是，在我们党的文件里面，党的政治报告里面，没有提到宪政，只提宪法。

我们应该大声呼吁，我们国家应该更多地按照宪政的理念治国。我们提到宪政，或者宪政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向世界各国的宪政理念靠近，或者说我们强调的是趋同，我们强调的是宪法里面的普适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宪政社会主义，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特色的内容往往是以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来确定的，这很可能使法治走向人治。我们在当今世界应该更多强调共同点。因此我很赞成高举宪政的旗帜，宪法的旗帜，来展开讨论和研究。

**资中筠：**我想讲一下最近的想法，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最重视历史，甚至说灭其国先灭其史。史怎么能灭呢？无非是说，怎么解释历史有利于自己的政权。中国人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就是站在王朝的立场来总结历史。

怎么总结苏共被替代的历史？一个出发点是，不管苏共怎样伤害了俄罗斯民族的元气，伤了多少人，都不管，就关心他怎么被替代了。假设从这个角度出发吸取经验教训，注意民生也好，反对腐败也好，目的还是维持千秋万代的统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是以怎样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为标准的，不是说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维持某个王朝继续下去。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苏联经验，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苏共党员和军队的觉悟挺高的，他们有进步的思想。如果从忠于王朝这个角度来说，就会责备苏共为什么没有忠贞之士。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总结历史的角度。人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从根本上来讲，这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高尚全：**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三句话说得很好，关键是怎么落实。

首先关于平等使用生产资料，现在还不平等。现在60%以上的在国企，其他的中小企业占得很少。我们看看土地，国有企业占到了多少？这方面生产资料就没有平等使用。其次，从市场经济来说，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困难很大，行业垄断依然存在。以银行为例，前年的银行利润有多少呢？10400亿人民币，比2010年增长36.3%。这个增长怎么来呢？一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二在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我支持十八大提出来的反垄断。第三，关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说农民受到法律的保护，保护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会发生群体的事件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农民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宪法上第12条讲了，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怎么界定他的财产是不是合法？所以，说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也需要落实。我建议中央要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来贯彻落实这三句话，落实十八大精神。

**胡德平：**中央去年纪念八二宪法实行三十周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在社会上反响非常大。前几天，政治局学习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又讲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这是中央的声音。在社会上，《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都在新年献辞里谈了宪法，上下是一致的，上下都有这个共识。

宪法怎么普及，怎么实施，怎么执行呢？我觉得要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1956年八大，说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观点现在还在说，这么说也可以，但是还要和现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正视公民维权和权力腐败的矛盾，正视民生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落实宪法，就要和解决这些矛盾结合起来，和改革结合起来，还要和整党结合起来。整党，首先就是学宪法，以宪法来对照，我们这个执政党，是不是依法治国，是不是保护公民的权益。

**李洪林：**大家都知道，文天祥被俘后写了《正气歌》，如何让正气充满人间，他举例说，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对历史要秉笔直书，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史德。《炎黄春秋》做到了这一点，能够把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是《炎黄春秋》的正气。《炎黄春秋》要坚持这一点，能够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

**高锴：**习近平同志一上台，对套话和空话进行批评，而后又讲了几次宪法问题，大快人心。批评就是要讲不同的意见，要有不同的声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包容不同的意见。要对不同意见进行法律保护。有人说讲话不能出格，不能有不同意见的言论，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的言论，人的言论自由哪去了？宪法明确规定言论自由嘛。我们能不能给党的方针政策提提意见？我认为可以提的。包括宪法，我认为都是可以提意见的。宪法以前讲计划经济，现在不是都改了吗？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社会就不能进步。

**钱理群：**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改革的好事。

中国改革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但是立足点应该放在自下而上的改革当中。很简单,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必须触动权力,而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不会自动放弃。有真正为人民国家所想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要推动改革,也会成为体制同僚的公敌。民间的作用是形成压力集团,对体制内拒绝改革的施加压力,同时也对体制内的改革者提供支持。我们不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有一句话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

去年讨论中国教育改革的时候,我听一位教育家说,今天中国的坏人都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做尽了坏事。我想,我们好人也应该联合起来做好事。我提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这么一个概念。改革要从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我们周边的存在开始,从一件件可以做的改革的好事做起,改变自己及身边的存在。今天要推进中国的改革,特别是监督不受限制的权力,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首先要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我记得何方先生在他的《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当年曾经参加延安的宪法促进会,今天恐怕也应该有一个宪法促进会,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从一件件具体可行的事情做起,逐步推进,例如推进官员财产公布,促进公安、法院和检察院权力的独立和相互制约,给民间社会组织以更大的独立性等等。我始终相信鲁迅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关键还是眼睛往下看,从我们自己做起,中国的希望在民间社会。

**陆德:**现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成为我们经济转型最大的瓶颈。要改革,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要动,必须要触及利益集团,但这个触及又是很难的。

去年我们的M2,人民币是97万亿,美国的美元M2折合成人民币不到70万亿,我们的钞票比美元还要多,但是我们的财富GDP只有美国的1/3强,所以这些钞票随时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经济要稳定要发展,要投资,投资一过,又引起货币问题,现在处于两难境地。

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向全世界宣布,2005年到2020年15年间,我们的单位GDP减排要降低40%到45%,但我们的GDP总量还要成倍增加。以8%的速度增长,15年GDP翻两番,GDP是2005年的四倍,但是我们单位GDP减排才减40%到45%。这四个GDP砍掉一半,排放量是原来的两倍。我们2020年要全面达到小康,污染增加一倍算什么小康?

这十年我们的贫富差距拉的是最大的。西南财经提供的数字,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1,0.61是动乱线。

2017年党的十九大要召开,七个常委要换掉五个,习近平同志在前五年取得政绩十分关键,我们要全力支持他的改革,多提供正推力。

**胡德华:**前面有人谈到苏共垮台的问题。苏共为什么会垮台?如果苏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党,为了解放全人类的党,或者像战争年代表现的那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么,这样的党如果垮台,不但苏联人民悲伤,全人类也要悲伤了。但苏共究竟是什么样呢?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源于三个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这么一说,垮台就不值得大家悲伤。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苏联的历史,还有现状,这样才能以史为鉴。苏共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比一

比，中共做了什么？中共有改革路线。这个改革除了经济改革，还有能不能自由讨论的气氛。了解情况是第一步，不了解情况怎么知道应该保卫谁？

**浦志强：**前面发言者讲到了对形势的判断，对政治现实和未来的期待，他们讲的都有道理。我想说的是，最近五年是一个法治倒退的时期，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已经压倒了稳定本身，维稳成了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必须进行改变，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希望政治有进步，走向一个法治时代。至于怎样去做，我作为一个职业律师，不考虑太多的政治，我希望具体考虑一些制度上的设计问题，一些个案的问题，用个案推动法治和社会进步。

去年我们在重庆做了一些劳动教养的案件，重庆有人因为批评时政，因为发表了一条微博就被劳教两年，因为发表两条跟帖就被劳教两年，因为在重庆的“天涯论坛”上讨论重庆卫视的红色频道怎么办，就被作为“112重案”一个晚上抓了三十多人，这是活生生的文革复辟。我们在重庆那样做，事实上针对的是整个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现在我们看到，十八大之后在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上讲，将停止使用劳动教养。2月5号云南的政法委书记也说在云南全省停止三类劳动教养，暂停所有劳动教养的审议。我们希望全国人大能够授权新的政府领导人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因为劳动教养是一个不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弊政，和中国的宪法、中国的立法法、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还有中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直接抵触，它使我们无法和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接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社会在静悄悄往前走。我不认为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立即解决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我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废止劳动教养的问题。

**周志兴：**我想讲一个主题，就是知识精英的责任和他们的缺陷。

知识精英这个词儿，现在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在体制内，一种在体制外，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体制

外。所谓体制外，就是现在没有官员身份、有知识有理想的人。知识精英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起的是启蒙作用，现在的改革，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有更多的知识精英来提供智慧，用他们的文章，用他们的演讲，引导现在的社会向法治社会前进，同时也给现在的决策者提出意见和建议，责任非常重大。但是现在的知识精英确实问题也比较多，我希望能够提高一步。

第一是要继续学习。第二就是要倾听别人的意见。我们经常和左派，中间派，右派在一起聚会，我看中左和中右的人是可以一起交流的，如果说做不到意见的统一，起码可以做到互相认识，听别人把话讲完。现在很多时候，左派也好，右派也好，经常是别人把话没讲完就开始骂，或者是只看到一个名字就开始骂。只有听了别人的意见，才能够发现我们跟别人是不是有相通的地方，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三，现在知识精英的缺陷是没有多方位的交流。我主张知识分子即学者官员企业家这三部分人要不断交流，他们在交流中会形成共识。

**钟沛璋：**当今世界波涛汹涌，将出现新的格局。而我国处于重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国的前途如何，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大事。我建议要把握好三点：一、要有信心。千百年来，我国就是在内忧外患的抗争中，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今天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内忧外患的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二、要有耐心。实现伟大振兴，要有一个过程。历史学家说，中国目前正穿越历史的三峡，之后滚滚长江才能奔向大海。三、不迷信。千百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民族性，就是每逢历史关头，总是盼望有一个英明的领袖来扭转乾坤。我们不要忘记

毛泽东给我们的教训。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事实上,他造成了一个人可以凌驾全国人民之上的党国体制。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人民却跪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只有靠人民自己的觉醒和奋斗。改革这种毛泽东自称是无法无天的党国体制,中国才有伟大的前途。

**刘苏里:**我最近连续做了口头调查,问一些亲朋好友在干什么?答案当然五花八门,但都重复着同样一句话: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不沾政治的边。我跟他们讲,且不说你搞不搞政治,政治一定会搞你,在我们这个国家,尤其是今天这样的状态下,政治无处不在。如果我们不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做什么,那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全社会都在侏儒化,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整个人民的矮人化。这样说来,整个民族很矮。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无法比较高矮的,只有站在整个世界民族之林,才发现他们有多高。我们的矮,是精神的矮。这就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高放:**我在凤凰卫视大讲堂讲过一堂课,题目是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命运。我在讲演里说,历史上一共有三种政治体制,一是君主专制的体制,二是民主共和的体制,三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妥协的君主立宪的体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民主共和的体制,可是苏联实行的是党替人民做主的体制,这种体制我把它命名为党主立宪制。我说党主立宪制是君主立宪制的变种。我列举了很多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产党设总书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设总书记。苏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开始设总书记,设总书记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党政分开,不许总书记在政府机关兼职。后来斯大林总揽大权,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兼国家主席,把这三大权统一了。我说这种体制是党主立宪制,党主立宪制是历史上第四种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机构是不稳定的体制,这种体制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必然变化,苏共变化就是典型的例子。

**马晓力:**我们这个党一直是什么状态?就是以“左”立命,以右转危,多数情况下都是“左”的。就说宪法吧,从宪法有了以后,就没把它当回事,所以才有了毛主席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习近平同志最近又一次讲到,要进一步落实宪法,宪法的权威在于实行,这是很大的进步,也是了不起的宣誓。刚才江平老师讲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宪政国家这个口号一定要喊响,我特别同意。要把学习宪法、落实宪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周晓平(左)、蒋彦永**

**周晓平:**我代表父亲周有光说几句话。本来他很想来,但因为身体的原因来不了,他说了几句话,让我在会上说说。他说,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希望。现在有个新词,叫历史虚无主义,那么,那些虚假的历史又叫做什么呢?那就叫不尊重历史。历史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科学,就像理科的数学一样,

如果不尊重历史，还搞什么社会科学？他觉得这是大问题。父亲认为，《炎黄春秋》尊重历史，每期都看，每篇文章都划圈圈，有朋友来就给人家看，交流，叫人家订，说这东西最好了。他说，他现在参加的活动只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活动，他希望《炎黄春秋》永远办下去。

**杜光**（书面发言）：《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的本刊编辑部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杂志社献给社会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近几年来，社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取得体制内外对改革的共识，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炎黄春秋》的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解答。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当在宪法的基础上取得共识。第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朝野上下政治生活的共同基础，也是体制内外都能接受、最具共同语言的政治形式。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尽如人意，但总的说来，它的诸多条文还是符合于现代民主原则的。第二，现行宪法是几代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所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它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人的共识和共同心愿。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有责任挑起这个积累了百年之久的历史重担，落实宪法的规定，实现人民百年来的愿望和期待。这既是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第三，改革和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领导，都应当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以宪法为准绳。第四，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制度和法规，就是把权力关起来的笼子，制定这些制度和法规的过程，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它必须以宪法为根据，所以，归根到底，是要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

《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会不会成为报春的燕子，为我们带来2013年宪政大开张的喜讯！我怀着殷切的期盼，拭目以待。

**魏久明**（书面发言）：前面几位同志讲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讲的话，是对的。正确认识历史兴衰的原因，接受历史经验教训，才能促进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过去苏联等一些国家剧变，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原因很复杂，但不能说这是外部的原因发生的，因为内因是决定外因的。大概是1993年，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路过俄罗斯，在莫斯科呆了几天。我和我们国家使馆的同志和原苏联远东所的专家私下聊天，我问他们：苏联解体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倒退？他们都异口同声回答："是历史进步！"我当时听了很惊奇，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相信苏联大多数共产党人在苏联解体时不发声，一定有其原因；我也相信苏联人民会总结历史经验，走上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中国历史上的兴替，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借鉴。建国后几十年经过反复和铺垫，正因为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吸收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的道路，才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今后我们仍然要正确地吸取历史上兴替的经验教训，谨慎客观地从事，同时要与时俱进。

**附：出席会议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 丁　东 | 习　静 | 马小冈 | 马立诚 | 马仲廉 | 马国川 |
| 马晓力 | 王　才 | 王　进 | 王克明 | 王俊义 | 王彦君 |
| 王强华 | 任大援 | 刘元生 | 刘仰东 | 刘志琴 | 刘苏里 |
| 刘家驹 | 老　鬼 | 吕日周 | 孙大午 | 庄　重 | 江　平 |
| 牟广丰 | 许人俊 | 许水涛 | 邢小群 | 何　方 | 何燕凌 |
| 吴　伟 | 吴　薇 | 宋以敏 | 张　鸣 | 张小英 | 张天来 |
| 张北英 | 张丽娜 | 张希清 | 张泽石 | 张夏白 | 张素芳 |
| 张惠卿 | 张静娴 | 李　乔 | 李　焱 | 李　锐 | 李永忠 |
| 李世强 | 李尔柔 | 李玉贞 | 李伟东 | 李红骑 | 李国华 |
| 李洪林 | 李炳华 | 李树桥 | 李胜平 | 李欲晓 | 李维民 |
| 杜　光 | 杨　杰 | 杨天石 | 苏双碧 | 谷秀敏 | 邵燕祥 |
| 陆　德 | 陈徒手 | 陈崇保 | 周小平 | 周志兴 | 季　音 |
| 林京耀 | 郑笑枫 | 保育钧 | 姚力文 | 姚监复 | 施滨海 |
| 胡治安 | 胡舒立 | 胡德平 | 胡德华 | 胡冀燕 | 赵于平 |
| 赵友慈 | 赵德润 | 郝怀明 | 钟沛璋 | 闻　一 | 展　江 |
| 徐宝珍 | 徐玲玲 | 晏乐斌 | 殷　毅 | 秦　晖 | 秦肖娜 |
| 耿福胜 | 袁　鹰 | 谈　翀 | 资中筠 | 郭道晖 | 钱理群 |
| 顾　骧 | 高　放 | 高　锴 | 高尚全 | 崔卫平 | 曹　祺 |
| 曹思源 | 章立凡 | 阎　军 | 阎长贵 | 程理嘉 | 董郁玉 |
| 蒋彦永 | 谢小玲 | 鲁　谆 | 浦志强 | 虞　音 | 雷　颐 |
| 穆广仁 | 薄会川 | 薛德震 | 魏久明 | | |

本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文图片由王海印拍摄）

# 《社会报》在改革浪潮中起落

○　蓝成东

对《社会报》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份创刊于1985年2月16日的报纸是在改革大潮中兴起的一朵浪花。作为《社会报》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之一，笔者觉得有必要将《社会报》从创刊到停刊的史实一一写出以飨读者，并供有志于撰写《中国报刊史》者作一参考，也算对历史作个交代。

## “小小骂、大大帮忙行不行?”

《社会报》总编辑是由学会会长曹漫之教授兼任的，但他年事已高并不具体过问办报事宜。邓伟志副总编当时是声名鹊起的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以思想解放著称的中年学者。

《世界经济导报》的钦本立老总以善打“擦边球”而著称于世。邓老总也有他的名言：过去批判某某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那我们（对共产党）小小骂，大大帮忙行不行？邓认为，《社会报》既非党报，若要说官话实无存在必要，因此《社会报》的办报宗旨是发他人所不能发、不愿发。要独树一帜为民“喉舌”。

《社会报》几期试刊后，找了《文汇报》理论部几个志同道合的编辑，他们对已出的几期试刊很有兴趣，表示愿意兼职承担具体编辑事务，双方一拍即合。邓认为这是《社会报》发展过渡期的最佳安排了，一是能极大地扩大新闻来源；二是比招聘专职编辑省钱，更无须承担劳保福利；三是他们去和印刷厂打交道比我们方便。

《文汇报》四报人加盟，使办报力量大增。自1985年下半年起，已出定期的双周报，1986年起则出周报，一切均按计划进行。《文汇报》一些赴全国各地采访的记者不乏好稿子，但《文汇报》却未必能用，就上了《社会报》。更有些《文汇报》常驻外地记者，不时发来一些各地的社会新闻，使得《社会报》得以更好地树立起面向全国的形象。记得当时《文汇报》总编马达多次夸奖《社会报》办得不错、有特色，甚至批评说《文汇报》那么好条件为何写不出那些好文章，却不知《社会报》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他的部下采写的。像《文汇报》那样有影响的大报，倘能真正依赖报人意愿办报，恐怕也很难有小报生存发展的余地了。

《社会报》很想开风气之先。邓伟志曾设想划出一栏目，供自由投稿，投稿者不必认同本报观点，文责自负，但未获准。又曾筹划在上海搞选美活动，得到的回答是：上头有批示，对广州共青团已搞了的一次选美下不为例，其他地方再不许搞。也许广州邻近港澳，已算特殊对待了，笔者的感觉是上海的整个环境较广东等地保守得多，想开改革风气之先，几乎不可能，即使广东已有的，上海有关当局也未必感兴趣。如广东《南风窗》杂志报道广东领导干部多渠道听取民意，《社会报》亦有类似设想，曾设法向时任市长提出，未予置理。这也许就是《现代人报》原拟在沪办而最终迁粤的原因了。1986年底，深圳举办了首届健美比赛，《社会报》一摄影记者自筹旅费去深圳拍了一大批照片，我们想选登部分，竟被指责为顽固坚持自由化办报方针。

《社会报》对言论文章是很重视的。言论文章未必出自名人高手，但人云亦云，无甚新意的党八股官样文章一律不登。

《社会报》设有“争鸣”“标新立异”等专栏，经常对社会思潮热点，敏感话题组织探讨。如“争鸣”专栏曾讨论诸如“第三者”、“马路求爱”、“婚前性行为”、“允许不允许安乐死”、“匿名信合法吗?”等以往极少涉及的“敏感”问题，被读者誉为“讲真话，不讲套话、假话、空话。”“敢言别人所不敢言”。最著名的一次是“标新立异”专栏对“大公无私”问题的探讨。讨论必然包含各种对立观点，只要言之有理，能自成一说者都照登不误。但那些封杀《社会报》者认定《社会报》的倾向是反大公无私的，因引发讨论的第一篇文章认为大

公无私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是奴隶主的口号，显然踩了那些表面上把“为人民服务”口号高唱入云者的脚。胡乔木还曾用此来围剿打击于光远，因《社会报》曾发表过于光远赞同天津大邱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的口号的报道。其实那篇文章的本意至多不过是主张“大公有私”而已。

在文章结尾，作者坦言：“‘大公’应该提倡，‘无私’则可休矣。”上海某重点大学一哲学教授看不过“左”将们对《社会报》的蛮横指责，还特地找出毛泽东在50年代写的哲学笔记，也是肯定“大公有私”这个口号的。笔者对胡乔木鲜有好感，不屑道：“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当年“四人帮”批邓，胡若真信奉“大公无私”就应像另一胡（耀邦）那样，高举“骨头”，就不至于“私心重，骨头软”而“反戈一击”去批老邓了。

真正引起保守派对《社会报》震怒，是《社会报》经常整版篇幅系统地报道一些著名改革派人物针砭时弊的讲话文章。《社会报》从试刊到被封闭前后不到两年时间，总共出了68期，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改革派精英，如刘宾雁、王若水、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温元凯等，《社会报》几乎都有报道。1986年4月，《社会报》与《世界经济导报》联手，对轰动全国知识界的“马丁事件”作了连续报道，并不指名地批评了邓力群，在一篇严家其夫妇的专访里率先介绍了后来备受争议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特别是1986年7月29日，《社会报》继6月10日发表《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访王若水》一文后，选择了纪念双百方针30周年的日子，以整版篇幅并配以照片，评论发表了《民主需要理论，理论需要民主——‘宽松’中访郭罗基》一文。时值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倡导“三宽”气氛，故用了“‘宽松’中访郭罗基”这一副题。

不料，该文刊出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就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沪上各报总编会议。因邓志伟出差在外，由笔者前往与会。

会上疾言厉色地指责《社会报》严重违反宣传纪律，称什么一份地方小报居然未经请示，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所作的人与事的决定妄加评论，是决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几件事。一是正当《社会报》在连载女作家遇罗锦的三次婚姻时，有人打电话来责难，谓据“美国之音”报道，遇罗锦已在西德申请政治避难，你们怎么还在连载她的故事。我们则答曰：我们从不听“美国之音”，也不会依据“美国之音”作报道。一是当时上海破获了一个以高干子弟陈、胡为首的流氓团伙。上海市委的头头们感到左右为难，要摆出动真格，取信于民的架势，又深恐“曝光”过多，损害“威信”，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按以往惯例，凡要造成声势，公判大会都在可容纳一万余人的市体育馆召开，而这一次有意识选择一个只可容纳二三千人的静安区体育馆召开。早在刚破获时，市委宣传部就严令全市各大小传媒在最后判决前一律不得报道该案，还美其名曰：新闻单位要注意不干扰司法审判。其实，到了最后开庭那天，也未允许记者入场采访。据笔者一个出庭作辩护律师的朋友透露，判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早就内定好的，律师纯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时，我们获悉辽宁有一份叫《共产党员》的杂志，组到一篇披露上海公安局如何侦破这一犯罪团伙的稿子发了出来。我们一见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全文转载，与市委宣传部打了一个“擦边球”，并在开公审会的当日，赶到现场叫卖，深受市民欢迎。

1986年秋，上海铁路西站发生一起严重的列车倾覆事故，使得居住在铁路沿线的棚屋居民造成严重伤亡，而有关方面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却只顾推诿责任。《社会报》仗义执言说了几句公道话，批判了官僚主义的敷衍塞责，草菅人命。不料，得罪了某些权势人物，他们对《社会报》实行软硬兼施，破天荒第一次邀请《社会报》出席铁路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会上《上海铁路报》总编特意找到笔者交换名片，表示兄弟报刊今后要多加强联系通气，而暗地里却去市府交通办告状，称由于《社会报》的报道，造成他们善后工作的困难被动云云。还有一件事是《社会报》一名特约记者通过他自己的关系找到了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并作了采访，铁道部有关领导知道后大为光火，到中宣部告了《社会报》一状。中宣部责成上海市委宣传部予以处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立刻电令我们撤下已排好清样的这篇报道，并指责我们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办报方针与指导思想有问题。

1986年的中国,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即中国的改革应从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的社会改革。为此,《社会报》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编辑部等单位,于11月初在上海召开了“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并邀请了刘宾雁、王若望等知名人士到会作报告。不料会议不久即传来一消息,浙江社科院一“左”将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等散布自由化思潮。又有消息说徐惟诚将7月29日的《社会报》交到了邓办,引起了高层震怒。这时的《社会报》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 萧条肃杀的1986年冬

1986年底,京沪等地骤然而起的学潮,使得中国敏感的政治气候一如当时的气温急剧下降,《社会报》的处境就更艰难了。没过几天,约在12月25日,市委会宣传部部长潘维明带着主管新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新闻处处长柴志豪等一干人,神色严峻地来到社联召开紧急会议。潘维明称,《社会报》在市委批评后迄今未有改进,现又发展到有记者卷入学潮,已被新华社上了内参。其实真相只是一借用的工作人员在某厂联系广告业务时,问及有关当时盛传的邓小平退休事,表示同意《深圳青年报》的观点而已。潘维明称市委非常关注,已连夜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社会报》立即停刊整顿。社联几个老干部不服据理力争。主持社联工作的郭加夏秘书长(原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不平则鸣:《社会报》发了那么多鼓吹改革的文章,即使有一两篇错误,最多追查有关人员的责任,甚至可撤换负责人。《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文革中发表了那么多乱党乱军乱国的文章,也不是换个领导班子就得了。心底里还是倾向改革的潘维明见势只得作出妥协:考虑到《社会报》的社会影响,可边出刊边整顿,但《文汇报》四报人须立即撤出;《社会报》须改名为《社会学报》,每月清样须送宣传部审查通过才能付印。

由于清样须先送审,结果改名后的那一期《社会报》尚未正式付印,清样已被送上中宣部。据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被指责为对《社会报》明批暗保。这也许指潘维明出席了《社会报》易名为《社会学报》的迎新茶话会,虽是把丧事当喜事办,也得煞有介事。潘维明代表市委宣传部充分肯定《社会报》的成绩,并希望易名后的《社会学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提出了思想更解放,学风更严谨,探索更大胆的口号。北京的某些人看了自然极不舒服。这样《社会报》1987年仅出了一期,总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刚排好清样,市委宣传部就一个电话过来通知停刊整顿。通常不过问具体事务的学会会长兼总编辑曹漫之也一再要求我们顾全大局,顾全如坐火山口的潘维明的处境。看来潘也确有其苦衷,不久就离职去中央党校学习了。

1987年7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芮杏文所作中共上海市委1987年上半年度的工作报告,谈及市委的“反资”成绩时称“对《社会报》已作停刊处理”。

1987年那次“反资”,除《社会报》外,还有《深圳青年报》《安徽科技报》遭停刊。《社会报》虽已被停刊多年,但在中国报刊史上自有其一席地位。■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 中国政改研究会的来龙去脉

○ 杜 光

1988年7月12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了自己的诞生。研究会的宗旨是“广泛联络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团体和个人，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它虽然自我定性为“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的特殊敏感性，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是党内元老薄一波，担任会长的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周杰，另聘请24位有关部委的领导人为顾问。

但是研究会成立只有一年，便因为发生“六四”事件而政治形势突变，不得不于1989年7月决定“暂时”停止活动，偃旗息鼓。谁知道这一停就停到今天了。我认为有必要记下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情况和短暂的生命历程。

## 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1987年7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政治报告提出了七个改革任务，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

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并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邓小平在1986年6月和9月的几次讲话里提出来的。9月18日，赵紫阳邀请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等座谈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的问题。23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建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5人组成，研讨小组的任务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研讨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的基本工作方法是阅读材料，议论问题，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赵紫阳的建议经过常委分别批示同意后，10月4日便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办公室(以下简称政改办)。

政改办成立后，从中央机关等处陆续抽调了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才俊，参加政改办的工作。他们除积极开展自身的研究讨论外，还邀请专家、学者、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11月中旬，根据政改办的建议，又建立了7个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专题研究组，要求他们组织人员，分别就以下专题进行研究：1.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由廖盖隆牵头；2.党政分开，由温家宝牵头，陈俊生、王汉斌参加；3.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由周杰牵头；4.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由贺光辉牵头；5.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由王兆国负责；6.社会主义民主，由胡绳牵头，李定参加；7.社会主义法制，由佘孟孝牵头。接着，又在中央党校建立了7个同样专题的研究组，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牵头。

在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的时间里，政改办自身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14个专题研究组分别举行的座谈讨论，更是不计其数。在此期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赵紫阳主持下召开了7次会议，听取政改办的汇报，讨论、指导进一步开展研讨的具体措施。

1987年4月，政改办在自身研讨和吸收两套各7个专题研究组研讨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经过深入讨论、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于8月底报送中央研讨小组。9月14日，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总体设想》，决定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9月27日，邓小平在《总体设想》上批示：“完全赞成。”10月20日，七

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总体设想》。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经过这样广泛、充分的讨论研究，在集中了无数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但是，怎样贯彻落实，却难度很大。实现党政分开，改变政治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无疑是克服现行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的最佳选择，它被十三大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选目标，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人民日报》在十三大后不久的11月26日发表了赵紫阳10月14日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内容：《关于党政分开》，赵紫阳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的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法展开。"

如何开展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是实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最重要的课题。由于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和利益攸关，推行党政分开的每一个改革措施，都会遭遇到体制内部的强大阻力。为了扫清障碍，非常需要从思想理论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性质、意义和步骤等等，进行系统中肯的研究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保证党政分开这个伟大变革得以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十三大以前的研讨，主要是在体制内部的高层进行的，而且一直处于闭门研究的状态，不公开，不登报。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当然是必要的，适宜的，但在正式提出改革方案后，为了贯彻实施这个方案，使它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就必须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讨论和宣传。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使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成为迫切的需要。于是，就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

## 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一年

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一年，但这一年里的生气勃勃的各项活动，为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是"六四"打断了它的蒸蒸日上的势头，它将有可能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无可限量的贡献。

**（1）组织概况和工作计划**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是1987年底开始筹备的。12月16日，陈一谘和严家其来到中央党校，同史维国、杜光探讨成立研究会的问题。3月2日，中央党校正式致函国家体改委，说明："为了广泛团结从事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深入开展改革理论的研究，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商洽，以中央党校为主发起成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中央党校。现报上研究会筹备组名单和章程草案，请予审查，并望准予备案。"同时上报了筹备组成员的名单：史维国（召集人）、陈一谘、严家其、陈群林、杜光、陈小鲁、高山。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研究会于7月12日举行大会，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前夕，已经有会员1221人，其中个人会员273人，团体会员34个，948人。400多名会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了筹备组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和常设机构。

在7月12日成立大会通过的常设机构是：名誉会长薄一波，会长周杰，副会长史维国、陈一谘、高放，干事长杜光，副干事长唐欣、盛斌、朱满良，顾问有于恩光、李定、杜润生、宦乡、高扬、范荣康、赵复三、尉健行、崔乃夫、鲍彤、贺光辉、蔡诚等24人。根据研究会开展活动的需要，研究会建立了学术委员会，由高放兼任主任，崔佩亭任副主任。干事会各部的负责人，分别是：研究部主任王伟光，副主任李忠杰、卢中原、齐连池；会务部主任侯少文，副主任张峰；事业部主任朱满良，副主任李中印；出版部主任柏铮，副主任姚鹏；联络部主任韩康，副主任马小军。另外，研究会成立后还陆续建立了几个民间性的研究所，包括：国家公务员研究所，所长仝志敏，副所长初尊贤、李如海；社会调查所，所长于冰，副所长卢中原；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史维国，副所长盛斌；国外情报信息研究所，所长王小平，副所长唐云、张海洋；政治理论研究所，所长刘德福，副所长荣剑。已经报来准备成立的还有县级政权建设研

究所、祖国统一理论研究所、政党制度研究所、党章研究所、党内民主与党的建设研究所、政治发展战略研究所等。正在准备建立的还有湖北孝感的社会调查中心、沙市的企业领导体制研究会。此外,还有两个挂靠在研究会的二级研究机构,一个是青年外语人才联谊会,一个是成都的人事产业研究中心。

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在7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1988—1989年工作计划纲要》,提出18项活动内容,其中由会务部承担的3项:发展会员;定期召开听取意见的座谈会;每年六七月举行理事会;后来还加上编印《会员通讯》。研究部承担的有4项:组织会员的研究活动;成立课题组,筹办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筹办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咨询公司。联络部承担的4项:与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建立联系;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会员出国访问进修;筹备1989年将要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国际学术讨论会。事业部承担3项:创办经济实体,实现创收;与国内企业界和基金组织建立联系;开展有偿服务。出版部承担的任务有3项:办好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组织编辑政治体制改革丛书,筹办出版发行公司。另有一项是建立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基地,由干事长、副干事长直接承担。这个工作纲要,基本上就规范了研究会此后一年的活动。

**(2)《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

但有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列入这个纲要,这就是接续《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工作。这套丛书是中央党校研讨小组接受政改办的委托组织编辑的。研讨小组在十三大后即告结束,为了加强这项工作,1987年11月成立了丛书编委会,由鲍彤、周杰、贺光辉、史维国、严家其、陈一谘等六人组成,但实际工作仍然照常由我们进行。编委会成立的时候,已经有四分之三的书稿完成初稿。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审核、修订,或删或增,统一规范,保证质量。有的书还请了有关的专家作为顾问,进行指导,如《民主政治总论》请了于浩成,《选举制度》请了萧蔚云,《宪法监督》请了应松年,《政党制度》请了季方。为了及时汇报、交流丛书编辑、修订的情况,我们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5月,印发了14期《编辑简报》。这套丛书包括政治制度、政党体制、政府机构、人事制度、民主制度、司法制度等六大类,39种,58册,约三千余万字。各卷内容按照三个部分九个方面的材料汇编:第一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外政治家、思想家的有关论述,与该专题有关的重要文献;第二部分包括中国历史上有关制度的改革,解放以来中国有关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各国有关制度的比较,西方国家有关制度的比较;第三部分包括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理论观点摘编,重要的书目论文索引。

按照分工,这套丛书中的9种12册有关人事制度的资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曹志、刘俊林主持,由劳动人事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其他5大类30种46册,由我作为中央党校研讨小组成员负责组织,研究会成立后,我作为研究会的干事长继续主持其事。丛书编好后将全部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5月,我们分五批把这套丛书交给华夏出版社。华夏出版社非常重视这套书的出版,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工作,还聘请了一些社外的出版界人士参与审定书稿。10月25日,华夏出版社在政协礼堂召开《政治体制研究丛书——资料卷》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丛书的主要内容和编辑过程,宣布丛书的书稿已经全部加工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发印,年内即可有部分卷册问世,预计到1989年9月底全部出齐,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

但是,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际的风波以后,彻底破坏了我们的想当然的期待,直到1994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这个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被领导人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这套丛书的滞销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这套丛书在当时没有发挥作用,当然是十分可惜的。但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能抹杀的。近几年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逐渐增加,在朝者在野者都时有论及。我热切地希望,在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这套丛书能够得到重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3)研究会的其他活动**

第一,组织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如建立一些

专题研究组，确定了参与研究的人员和带头人，课题的主旨和纲要，完成的大体期限，需要支付的最低限度的经费等等。

第二，组织了7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其中两次邀请有关研究机关和大学的学者参加，两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分别是党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还有三次座谈会是邀请党校学员，分别就加强法治、廉政建设和企业领导制度进行座谈。

第三，同国外学术团体建立联系。

第四，研究会下属的几个研究所也分别开展了一些活动，如：社会调查所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县里，组织了县级政权建设的社会调查；又受长城空调器厂委托，进行“全国同行业名优产品市场情况”调查等。

第五，我们还准备：1.组织90年代理论沙龙，成为比较松散的定期聚会形式。每次有主题，但又不限于这个主题。参加人员多少不拘，还可以带自己的朋友来参加。2.筹备建立出版发行公司；3.酝酿成立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咨询中心；4.在有条件的城市建立分会；5.在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召开理事会。这些打算都落空了。

第六，编印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编印出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是研究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研究会成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准备。按照原定计划，初期出版双月刊，16开本，每期96页，一年后再改成月刊。创刊号在1989年1月15日出版，订阅者六千余户。这是一份国内唯一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容的刊物，选登的文章，全部围绕这个主题，而且特别注重联系实际，不尚空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成果。它本应发挥团结改革力量、唤起民众的积极作用，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但“八九风波”以后，只出了三期便无可奈何地结束了，第四期已经印好，却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发行。

7月28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举行第四次常务理事会，“暂停活动一个时期，下属各研究所予以撤销”。于是，刚满一周岁的研究会就这样从社会上消失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 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 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 陈仲旋

## 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

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肯定行，紫阳同志（那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都称同志）的脾气很好，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并举例说："有一次，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电话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结果我把时间搞错了，让办公厅通知今晚召开，时间快到时，我提醒他到会。他听后一怔，说不是明晚吗？随即动身赴会去了。事后，他一句批评我的话也没有，可我难过了好几天，如果不是紫阳同志早已胸有成竹，照样可以赴会讲话，那就真坏事了！"就这样，我被推上了这个岗位，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果真如汤戈夫所说那样，我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里，的确没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不论对待什么人，他都没说过一句重话，也从来不发火。有一次，他身体欠安休息期间，才有时间和我闲谈一下，说我写的一篇东西（指我给新华社分社写的内参）还好，但文字过长。我很高兴他指出我的缺点，可惜的是也就是这么一次。

## 从来不用秘书代劳的省委书记

我去赵紫阳身边工作时，他才44岁，后来又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第一把手。他讲话很有条理，层次分明，论据充分，使人一听即懂。只要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调查研究，回来后完全不需要秘书为他整理材料。他非常善于发现下面的好经验、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的记忆力极好，都记在脑子里；再加以思考、总结、提升。形成系统概念后，就会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作出决定。

除了在全省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需要由秘书长杨应彬根据他的思想，组织起草文件以外，他在其他各种会议的讲话，都不需要他人代劳。他经过思考后，亲自写一个"提纲"，就在会议上做总结或是报告，一讲就是两三个、三四个小时，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听得聚精会神，明明白白。

在我担任赵紫阳秘书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了一份中央文件，内容是：反对秘书专政，不用秘书代劳。可见当时靠秘书代劳现象已很普遍，而赵紫阳从来不用秘书代劳。

## 他走遍了广东每一个县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1960年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统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是第二书记，实际上主持广东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给全国城乡造成大饥荒、大萧条，持续三四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经常下基层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县及许多公社、大队。

1962年，在去汕头地区南澳县的途中，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后一个县。去南澳县，可不那么容易，汕头地委请了当地海军帮助，派了艘护航舰载送我们到南澳。途中，大浪滔天，军舰

俯仰摇摆30度，我这个海边长大的电白人早已晕船躺倒，而他，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却始终手扶舷栏眺望远方，给我留下了长久记忆的瞬间。

文革后期，赵"解放"，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十个月后又调回广东，据跟随他从内蒙古到广东的蔡肇发秘书说，周恩来在主持有关赵调广东等问题的会议上说，赵在内蒙古十个月时间，跑遍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和许多旗、县，表示了赞赏之意。

赵紫阳调回广东几年后，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后又调四川省当第一书记。后来，又是蔡秘书告诉我，赵到四川，依然是多数时间下乡，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广广东的经验："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四川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提高，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形成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对这样的赞誉，赵紫阳当之无愧。

## 他没有星期天

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规定省委书记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而赵紫阳早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前，每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1962年，我刚到他那里没两天，就跟他下乡，回来后，开了两天会，处理一些文件，就又下乡去了。很少时间呆在广州。如在广州，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班。他晚上不是看文件就是开会，直至深夜十二点。即使决定星期一开会，这个星期天也要下去。时间不允许他走远，就到附近的佛山地委、南海县委、大沥公社走一趟，晚上才回来。佛山地区是主要产粮区，我们去得最多，潮汕地区是粮食亩产高产区，也去得不少。有人说，赵的日历上没有星期天，我也被家人称为只是"存在于户口本上的人"。

## 农村基层干部的知心朋友

赵紫阳下乡，从来不走马观花。他每次下去都是围绕如何搞好农业生产这个大课题，进行各方面的调研，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了解下面情况，及时发现值得注意的苗头和问题，帮助解决困难，总结经验。他不但与地、县、市的领导座谈，也到公社、大队座谈，听取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呼声和要求。他听到哪里有增产的经验，必定要到实地看看，听取具体汇报，并做详细询问。总之，哪里有经验，他就到哪里听取、再总结和推广；哪里有困难和问题，他就去解决。

赵紫阳每下去一个地、县、公社，一定要在那里住上几天；南海县大沥公社地近广州，车程不用一小时，为了传达宣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二十三条》，他在大沥公社的凤池大队住了半个月。

由于赵紫阳很有耐心听取大家意见，鼓励下面畅所欲言，从不对人吹胡子瞪眼，更不给人扣帽子，所以，当时的东莞县委书记林若，佛山书记杜瑞芝、专员杨德元、张勋甫，汕头书记刘俊杰，惠阳书记原鲁、李富林，还有顺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沥公社陈贤芳，中山县委谢明仁等等，都很乐意与他谈心，对他讲真话。在他们眼里，赵既是省领导，又是知心朋友。他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干部有独特优点。他曾对我们说，珠三角的干部思想活跃、开放，语言丰富、生动。他还曾针对这些干部文化不高但能干的特点，戏称他们是"不学有术"。

## 毛泽东批示："这两个老贫农是我们全党的老师"

1964年9月至12月，赵紫阳在中山县环城公社库充大队搞"四清"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到后，作了上述批示。

那一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须派工作队到农村、工厂，发动农民和工人揭发、清查干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赵紫阳带领一个"四清"工作队，化名赵明，到库充大队"蹲点"，在一对生活最贫困的老贫农家里食宿。那是土改时分给他们的一座旧碉楼，共三层。主人安排赵住三层，我和警卫员郭继生、科长老赖住二层，老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住在底层。他们家里实在太穷了，赵与我们在他家里吃的多是番薯、马铃薯和稀饭，外加大头菜，鱼、肉是看不见的。就这样，赵在那里住了近四个月，以后还去过多次。

在这段日子里，赵紫阳同这两位老贫农连续详谈了近二十个傍晚。主要内容是征询他们的意见，看看这次"四清"运动怎么搞比较好，要注意什么问

题？对大队干部有什么看法？等等。两位老贫农主要的意见是，希望工作队对大队干部不要采取激烈的做法。9月25日晚，也就是进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吴才添就对赵紫阳说："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产搞好，特别是要搞好冬种，冬种至关重要。如果生产搞不好，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现在贫下中农没人敢出来当干部，集体生产没有人领导，生产就搞不好。对干部不要一下子打击太猛，要告诉干部有什么问题就主动坦白，坦白了就没事。如果你们打击他太猛，他就会顶，社员就会感到威胁。"他还说："明天开群众大会，最好第一讲搞好冬种，第二讲搞好工分，第三讲搞好卫生，第四讲搞好积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要讲得太深，不要讲具体人，不要讲斗争。否则社员会有顾虑，不知道这次运动又要斗争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讲深一些。要号召干部主动坦白，叫他们抓好生产，特别是马铃薯的生产，因为我们的马铃薯都是出口的，对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影响很大。""贫下中农要慢慢组织起来，开头小一些，以后再扩大，不要一下子合起来，这样是没有力量的。""不要急，慢慢来，你们对干部打击太猛、太快，干部就顶，你们走后，他还是一样。慢慢把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干部就怕了。那时你们走了，干部如果还是这样，我们写个条子给你们，你派一个人来调查一下，他们就有几十个怕啦！"

11月11日晚，吴才添又向赵紫阳提出："最好搞完运动后，你们工作队留下一个同志，这样可以管得住干部。""你们清的账目要出大字报，公布给大家知道。"（实际上是提出了账目公开、办事透明的原则。）

对于贫下中农协会，吴才添说："贫协筹委办事，要个个筹委都盖上章才能办，不能一个人盖章了就办。"陈二妹说："筹委会要多商量、多联络、多互相监督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就容易被人拉拢收买。"那时，他们实际上已提出了民主监督、防止独裁、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等重大问题。

赵紫阳很重视他们的意见。他在工作队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四清运动是群众的自我解放运动，如果群众主要依靠贫下中农协会的力量，就能巩固胜利；如果只依靠工作队，就不能巩固胜利。"运动结束后，他还真留下了工作队员陈开枝（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编注）在库充多住了一段时日。

赵紫阳要求全省"四清"工作队都要按吴才添他们的意见办，还让我将吴才添夫妇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送给正在花县"四清"的陶铸看。陶铸看后，又送北京给毛泽东看。毛做上述批示后，令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后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领导。"文革"中，我看到北京红卫兵印的毛泽东的一些未公开发表的会议讲话（书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其中记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什么会议忘记了）讲到了此事：说赵完全按老贫农的意见搞"四清"，还说那位老贫农家里养了只狗，原打算杀吃，后来因为有上面的干部（赵当时化名，群众不知是赵紫阳。看来毛知道得很清楚）住在他家，决定不杀，继续看门。因赵当时是大走资派，他的名字被×××代替，一般人可能不清楚毛说的是谁，而我一看即知。这些材料是编造不出来的，再则当时也无人敢编造毛的讲话，我觉得可信。赵紫阳在库充采纳了这两位老贫农夫妇的意见，并要求全省的"四清"都要按他们的意见办，所以，"四清"对全省农村干部的伤害不是很大。

因为这样，库充大队的干部和农民都很怀念赵紫阳，1982年9月18日，库充大队的新老干部和老贫农陈二妹等31人（吴才添已去世），还一起到北京看望赵紫阳。《羊城晚报》当时还做了报道。赵紫阳与群众的关系，从来都是亲密自然的。1989年，赵紫阳下来后，库充大队的所有干部和陈二妹见到我时，都同声嘱托，一定要替他们向赵书记问候，祝他健康长寿。赵紫阳在库充大队的往事已过了三十多年了，库充人仍然关心、怀念着他。

2000年，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从九寨沟旅游回来，向我动情地述说当地人描述赵当年如何下令保护了九寨沟。九寨沟能有今天，他们很感激赵。当我听到这些，总是会想，只有真正替人民做好事，人民才会永远不忘。

## 推行联产责任制

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后，全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农民积极性一落千丈。当时，我被派到中山县沙朗公社鸡笼大队兼副大队长。那正是最困难的时刻，农民没粮没

柴，到处是水肿病人，都快饿死了，过去的"鱼米之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的亲身经历，只是个小缩影，面对全省如此恶劣的形势，赵紫阳当时是如何的心急如焚，是可想而知的。

1962年6月我到他那里工作后，7月12日就跟随他去清远县调查，听到了县委介绍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经验——"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立即赶往洲心公社。在我看来，这是非同小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天。"联产责任制"的发现，为广东的农业复苏，乃至以后为四川摆脱饥饿，重振"天府之国"美誉，乃至以后为全国粮食大增产，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该公社塘坦大队大围第一生产队一住就是三天。赵紫阳与当地农村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对他们的经验做了深入的调研了解后，赵肯定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创举。7月15日至18日，我们又到惠阳淡水的秋溪公社调研推广"洲心经验"的可行性，然后，立即决定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洲心经验"好就好在既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既不冒犯"天规"，又能增收粮食。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赵紫阳总结、推广"洲心经验"后，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第一把手参加。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赵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以前，赵已把"洲心经验"报告了陶铸，并得到陶的赞赏支持。到北戴河后，赵又向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做了报告，并将详细材料交给他。邓子恢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到了赵的住处，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认为广东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便决意在这次会议上向各省介绍和推广。因为它既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又不会被抓辫子、受批判。他离开赵住处时，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们都看得出来。

谁也没想到，会议开始没几天，就把"包产到户"作为"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讲话，并点名批评了安徽的曾希圣搞"包产到户"。理所当然，赵带去的"洲心经验"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兴的是，"洲心经验"已在广东生根开花、结果。赵从北戴河回来后，开了六天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随即，他就做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粤东行，到了许多县、公社、大队，督促、检查"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在广东，经济复苏之所以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联产责任制"，而且抓得很紧；抓住不放。

文革后期，赵调任四川主政。在不长的时间内，四川农业从濒临崩溃中摆脱出来，多年解决不了的粮荒，一下子大改观，改变之快使人惊奇，赢得百姓编民谣赞颂他。其实，他在四川推行的农业政策，就是"洲心经验"的继续，只是更有所完善、有所发展了。

## 李一哲大字报

1974年11月9日，时值"批林批孔"时候，在广州的北京路贴出了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副题：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这个李一哲，是三个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组成。李正天当时是广州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学生。陈一阳、王希哲是广州十七中学66年高中毕业生，留校参加"文革"。陈、王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引起了广州市、广东省、全中国以及港、澳、台乃至国际的强烈轰动。

1974年11月16日，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李一哲大字报"。赵紫阳这时已官复原职，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次由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将大字报的观点列出，撰文批驳，指出这些观点与中央唱反调；要澄清混乱思想，发展广东安定团结的形势。同时决定，省委写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把大字报发到机关、工厂、学校批判；但对作者不动（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省委给中央发了《关于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的报告》的电报，并把大字报全文

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交通运输紧急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1975年1月11月，省委书记王首道参加完中央全会，回来后在常委会上转达全会精神，并转达了赵紫阳（仍在北京）的意见：“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要注意对他们（李一哲）的人身保护；要防止采取过于急躁和简单的办法。要利用这个反面教员，激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

1975年1月15日，常委会再次开会，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回来的电话内容。赵说，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和我谈了，支持广东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见。中央领导提醒我们，批判高潮一起来，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赵强调：“各单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动大字报，要切实控制。”

赵紫阳调去四川、韦国清调来广东后，在1977年12月的广东第五届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1978年4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2月，省委宣布对“李一哲”公开平反。习仲勋、吴南生、王宁等先后五次与“李一哲”谈话。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为他们正式平反。

习仲勋与“李一哲”三人谈话时，王希哲说：“当时赵书记（赵紫阳）对我们是讲政策的。”“当时，说我们写反动大字报，赵书记说要让我们讲话，不准打人。他当时那样处理，合情合理，我们对赵书记没有意见。”李正天说：“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赵书记还让我们讲话，不说我们是反革命，没有抓我们，这是不容易的。”

习仲勋说：“赵紫阳同志当时组织批判你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理得很好。”“赵紫阳同志当时那样处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帮’那样猖狂的时候，能那样处理，是很得体，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胆识的。”

我在这里稍微详细引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接触，甚至参加了处理的全过程，因此感触良多。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大辩论”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甚至在‘文革’中，到处都分两派，也没有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辩论”。

最重要的感触是：让人民说话，允许群众发表言论、针砭时弊、参政议政。即使有人说了错话、坏话，也不应动则定罪名，更不能随便抓人和限制自由。这样就能达到“稳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蛮横不讲理，以权势压人，以大帽子吓人，甚至舞枪弄棒，那就决不会有真正的“稳定”。

## 前任秘书的感慨

赵紫阳在广东时，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除汤戈夫外，前面还有黄、高两位。他们都很崇敬、怀念赵。只要有机会，也常回来探望赵，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汤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总之是个“厂头”。“文革”时被打成“赵紫阳死党”，后来恢复工作，还当“厂头”。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老汤曾对他们说：“你父亲对地、县委书记们很关心，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关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处级，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离开时还是正处级，几十年了，现在还是正处级！”言时颇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汤戈夫患了“肌肉神经萎缩症”，在广州治不好，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协和医院。由于病房紧张，老汤病床安排在过道上。他的病发展很快，没几天即告病危。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老汤以为让他搬到单间，吓得连说：“我不能住单间，赵知道会不高兴的！”此情此景，闻之令人心酸！汤戈夫死时，级别是副厅级。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死前，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据说，赵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凝视良久，一言未发。……

汤戈夫的感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当他专职秘书几年，朝夕共处，他从不言及私事；从来没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当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我长时间跟随他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平时如此，逢年过节也如此。两个女儿出生时，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为此，我很不安。但我对赵

没意见，他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

他从内蒙古调回广东后，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便去征求赵的意见。赵回答："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过了许久，有人告诉我这一情形，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他公事公办，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谋利益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这不是更好吗？

## 把广州作为物价开放的试验点

1981年，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经济改革先行一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来到广东做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与广州市郊区菜农的座谈会。赵召开这次座谈会，目的很明确，是想研究在广州先行放开蔬菜价格可行性，为在全国放开副食品价格进行试点。座谈后，赵又与省、市委领及部门负责人再开会作详细研究。会上，省长刘田夫说，广州郊区菜农种菜之所以不积极，主要是价格问题，还不如去搞工副业。赵回应说："就是这个问题！"会上作出决定，鼓励近郊菜农以种植细菜为主，也就是高质量、多品种的好菜，同时价格放开，让市场调节，不能老让市民吃"无缝钢管"（通心菜）和大冬瓜。同时在远郊区，开辟新的种植基地，种植一些像椰菜、大白菜等"大路货"，以保证品种多类，价格兼顾。

广州实施、采取上述决定和措施后不长时间，市场上几乎什么菜都有了；菜也漂亮了，菜农把根去掉，洗得干干净净才摆上摊。价格确实贵了，有些高档菜甚至贵了两三倍。菜农当然高兴，市民也还是满意的，因为毕竟有的买了，可以随意了。

赵紫阳还建议广州开放鱼类价格，以鼓励农民、渔民积极养鱼、捕鱼。结果是，价格一放开，农民养鱼热情大涨，大量挖塘养鱼。没多久，大量活鱼上市，而且"开刀"零售，一条鱼想买哪个部位都行。但价格的确涨了许多，最高时达3元多一斤（如鳙、鲩、鲤）。对此，市民反映如何呢？

赵曾问我："菜和鱼的价格放开了，你们的生活怎么过？"我答："价格放开前，广州居民每月只有二毛钱鱼票。我家五口人，每月只能买一块钱鱼。我家附近有个兼卖鱼的小杂货店，尽卖些小鱼、杂鱼，都是死的，仍然难买到。如果明早有鱼卖，今晚就已经有人用砖头、小凳或别的物件排上队了，天未亮已是大排'人龙'。我们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无人去排队，所以我们吃不上鱼。现在什么鲜鱼都有了，虽贵，但能吃到。我相信，以后鱼一多，定会降价。"赵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市民的确反映良好，就说："广东人的承受能力强。"

果然不出所料，价格放开三个月，鲜、活鱼价格降到一元多二元一斤，就稳定了下来。广州的价格放开，给市场带来的变化十分巨大。我还保留了当年的一些数据：塘鱼：1980年96万担，1983年增至122万担；鸡：1980年260万只，1983年697万只；水果：1979年109万担，1983年213万担。

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我可以感受到赵在这里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有关价格改革的多次谈话，内容丰富，眼界宽广，见解高深，还是像我在他身边时那样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丰富了。

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常到广东视察工作。而广东又是最早的改革开放之地；他所到之处，都要求他题字。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这个要求更加强烈。可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人们在广东任何地方，都没看过他的题字，找不到他的题词。

## 出于内心的三句话

1980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同年，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是会议工作人员，借休会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当时，他们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来，条件并不怎么样，一般般而已。坐了一会，他们留我晚饭。饭菜很平常，可能临时留我，未加准备。

他边喝边闲谈；我则边吃边听。他讲："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我这个人，不拉私人关系"。听到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倍觉亲切。这样的事，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他对我讲的这三句话，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工作方法"这句，我当然熟悉，有感多年，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实事求是、注

#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朱维铮 口述　　金光耀 采访整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朱先生总是说等他有空的时候，但他却一直有忙不完的教学、研究和学术事务。即使在2010年7月患病住院后，他的病榻旁仍堆着研究生的论文和各种书籍，使我不忍开口再提此事。但2011年4月2日上午，在出院住家的治疗间歇，朱先生给我来电，让我到他府上做口述采访。那天下午，他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谈了他“文革”期间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经历。我在研究生邓爽的帮助下将口述整理成稿，交给了朱先生，得到了他的认可。2012年2月下旬，朱先生的学生们着手安排他就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做一系列口述，而“文革”的那一段由我来负责，朱先生也同意了。不幸的是，此计划刚要启动，他的病情就恶化了，不久于3月10日去世了。现发表这篇口述稿，作为对朱维铮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纪念。

整理者谨记

## 奉调《文汇报》“北办”

大约在1967年3月，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不久，有一天徐景贤找我去。他说，现在北京的大联合搞不成，主要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互相之间的矛盾十分厉害，毛主席说这五大领袖都不听话，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也不给他说，他很怀念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文汇情况》（《文汇情况》是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办的一个内参，印发范围很小，是毛泽东了解北京学术界、文化界情况的一个主要渠道），那时他了解很多情况，于是毛就指示恢复《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北办）。毛泽东是给张春桥讲这个话的，张春桥就找了《文汇报》的艾玲。艾玲当时刚刚被“解放”不久，由于她在批《海瑞罢官》时有功劳，担任了《文汇报》的革委会主任，但当时《文汇报》的造反派不愿她待在上海，所以张春桥叫她恢复北办，她也就回北办去了。但她找张春桥提了一点，北办剩下的记者，加上她一共只有五个，都是老记者，其中一个还是右派。这些记者只有和北京文艺界、知识界打交道的经验，没有和红卫兵打交道的经验。现在

---

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当他讲到“最多到七十岁”时，我不太认同。因为当时“邓胡赵体制”在国内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会希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我说道；“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说也奇怪，1989年他离开政治舞台时，距他七十整岁，仅差数月！至于他说的“我不拉私人关系”，这一点，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从“文革”后期至今，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从内蒙古到广东，又四川，再北京，从省委书记到总理，再总书记，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良才李子元（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从领导层面而言，他都是只身上任。走到哪里，就在当地任贤用能，从不结伙经营，安插亲信。回想那次谈心，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犹在耳，让我铭记在心。■

【编者注：陈仲旋（1932—2005）广东省电白县人，高中文化，1948年加入共产党，1952年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1962年至“文革”担任赵紫阳秘书。后为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本文是作者去世前在医院病榻上写成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朱维铮在上海市革委会工作时的出入证

要恢复北办，重点在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这些记者搞不下来，有困难。艾玲要求上海派一些对红卫兵熟悉的人去北办。于是张春桥就指示徐景贤，叫他从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特别是原来的写作班里面找人到北办去，这人要能够和红卫兵打交道，并且有比较强的能力。徐景贤告诉我说，他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当时写作班的几个头（历史组的吴瑞武和文学组的王绍玺）商量，他们认为符合条件的，就是朱维铮了。

当时我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副组长，组长是徐景贤，他管的事情多，因此组里的事情实际上是我在管。徐景贤要派我去北办，就来问我的意见。我感到有点问题，但既然是组织上叫我去，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记者。考虑过后，我就先和家里商量，最主要是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两个孩子都很小，我的前妻说她可以管他们，于是我就表示同意去。但是我想到这个任务非常复杂，尤其当时的五大领袖在全国到处闹，聂元梓跑到上海来，从打倒常溪萍到揪斗曹荻秋，再到揪陈丕显，主要是她和“新北大”公社在闹，此外还有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到上海来闹。所以我就对徐景贤说，我可以去了解这些红卫兵，但是我要求你告诉我，第一，我活动的范围是什么，第二，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对这些我很关心。过了两天，徐景贤来告诉我，到北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北京高校，特别是北京高校里面的造反派红卫兵，当然对另外一派也可以了解。我又提出来，我是着重了解他们的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徐景贤就说，要了解光明面派你去干什么。他还说，是毛主席向张春桥提出要恢复北办的，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到北京去与中央文革的联系就通过艾玲。张春桥已经让艾玲准备恢复《文汇情况》，这对毛泽东了解北京红卫兵来说显然是需要的。在我看来，毛泽东还是运用批判《海瑞罢官》时的办法，他自己搞一套班子去了解情况，这个班子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最近《文汇报》老记者郑重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与〈文汇报〉》，里面最主要的材料都是来自于《文汇情况》。

这样，我就到北京去了，一起去的还有文学组的刘景清，另一个是倪志良，一共是三个人。我对外的身份是《文汇报》记者，并且是艾玲的副手，当然不叫副主任或者什么的，对内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驻北办小组组长。徐景贤还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们几人把中央有关文革的新精神传回上海。这样我就有双重任务，一个任务是做北办的记者，去了解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的情况，向中央文革直接汇报；第二个任务就是我必须在北京了解中央是怎么指导文革的，特别是有什么新的精神，及时通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当时觉得这是件难办的事。我作了些准备后，大概是在4月下旬到北京的，因为我记得五一这一天还上过天安门观礼台。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时在北京的灯市口大街，艾玲之外还有四个记者，其中一个记者是右派，叫刘群，数这个右派最能干，但他是不能出去的，主要是管北办内部的事情。还有一个叫吴尔祥，很能干，是艾玲最相信的一个，“文革”后他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还有一个叫李根蒂，是延安陕北公学出来的。再一个是女记者，叫吴闻，五十岁左右吧。北办有一辆极小的甲壳虫式的、两个座位的小汽车，这样就有一个专职的司机。还有一辆两轮摩托车，也是这个司机开，他实际上就是通讯员，专门负责送材料到中央文革，然后从中央文革拿材料回来。此外有一个做饭的老头，年岁很大了。我去时的北办就是这么一些人。北办所在地是一个四合院，前院是办公场所，后院是几个记者包括家属住的地方，我们去后也都住在那里。艾玲的丈夫是总参的，所以她不住那里，每天都由那个通讯员兼司机接送她。开始我们写的东西都是手写的，潦草得不得了，看不清楚，后来就又从上海派了一个打字员来。

## 编内参《文汇情况》

我去时北办其实没做什么事，因为艾玲他们不熟悉不了解上海的造反派，也不熟悉不了解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等我们去了以后，我熟悉了情况后就跟艾玲商量。艾玲说，张春桥讲因为毛主席说北京的造反派有许多事不跟他讲，所以毛主席要了解他们的情况，张春桥要她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像过去批判《海瑞罢官》时搞的《文汇情况》一样。因为《文汇报》曾经被毛泽东批评为"右派报纸"，那时《文汇报》记者出去了解情况，别人认为这张报纸是右的，不太提防，所以很多人对批判《海瑞罢官》有意见、有质疑或者是有批判，都直截了当地讲，这些讲话通通汇集在《文汇情况》上，对毛泽东的决策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对此很赞赏。但这个情况当时在北京极少有人知道，是高度机密。那时我在写作班里，经常看《文汇情况》，有时一天好几期。可以说《文汇报》后来成为造反报就是从《文汇情况》开始的。所以我跟艾玲讲，《文汇报》是全国第一张造反派夺权的报纸，打着这个旗号出去造反派比较容易接受，而艾玲又是《文汇报》革委会主任。我们就商定，毛泽东既然通过张春桥讲要了解五大领袖的情况，我们的重点就划在五大领袖所在的学校，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和北京地质学院。当时北京的高校分成天派和地派，北大、北航是天派，地质学院等是地派，我去的时候，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所谓五大领袖是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我们实际工作时重点只是四大领袖，北师大我们很少去。因为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谭厚兰与关峰的助手林杰有特殊关系，所以她背景特殊，我们觉得还是避开她比较好，只做些一般性的了解，所以北师大我们是很少去的。直到王关戚垮台以后，我们才去北师大了解情况，但是北师大后来涣散的不得了。这时北办连我去了三个，一共八个人，但能外出的是七个人，我们商量的分工是，除了我和艾玲以外其余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学校。我和艾玲两个人不具体负责哪一个学校，负责每天情况汇总。艾玲因为在文革初期被斗得很厉害，所以不太愿意出去，坐在北办里的时间比较多。我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就往哪里跑。

当时北京热闹得不得了，一会这个事情一会那个事情，互相之间斗的情况多得很。北办恢复时，艾玲跟张春桥说，我们不了解中央精神，怎么开展工作？张春桥就同意由中央文革出面，凡中央文革或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解决红卫兵问题和解决各省革委会成立问题的会议，都通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参加。这个待遇相当于中央文革自己的记者站。当时这样的会新华社派记者，《人民日报》也派记者，但中央文革了解情况主要通过它自己的记者站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我们要了解中央精神，主要是因为上海方面想了解。当时各省为筹建革委会吵得不可开交，中央文革就将这些省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个一个叫到北京，常常是周总理半夜接见他们，两派或三派的头目。接见的时候也叫我们去。还有就是中央文革接见红卫兵时也叫我们去。这样的场合都是上海来的三个人轮流去，特别是接见红卫兵，尤其是接见北京红卫兵时，一般都是我去。因为我想知道中央的精神是怎么一回事。

北办重新开始编的《文汇情况》，送中央文革成员每人一份，并根据中央文革要求送给"毛办""周办"，其他再送《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革的记者站。上海方面除了送《文汇报》革委会外，就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始时送徐景贤指定的市革命委员会里的几个人，即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和写作班的人。以后由于情况越来越紧，上海就只送两份，一份送《文汇报》革委会，只有周国荣、邵传烈、朱锡琪能看，一份给市革会的就只送徐景贤了。后来王承龙大闹，文汇内参不送他也是一个原因。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张春桥指示刊头上不要写"文汇情况"，也就是说成了白头内参，什么标记都没有，就是日期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这几个字。这之后，北京方面就只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毛办""周办"，一共五份，其他全都不送了。于是艾玲就说，现在送的人口子越来越小，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这样下去我们会死无其所的。后来五大领袖搞武斗，毛找五大领袖训他们，其实毛掌握的情况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北办"的

内参。白头内参虽然越出越少，但到我离开北办时还在出。

中央文革跟北办关系密切的主要是张春桥，姚文元不大过问的。到后来不断出现江青的指示，指示主要是要去找谁，《文汇情况》送给谁也是江青定的。中央文革里面开始比较关心北办的是关峰，关峰曾经找艾玲去他那里长谈过两三次，谈了不少关于对文革的想法，艾玲有没有报告我不知道，反正《文汇情况》上面是不敢讲的。艾玲给我说过，关峰讲在中央文革每天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犯错误，他跟艾玲讲“你我都应该夹紧尾巴做人”。后来我给徐景贤打电话汇报的时候，告诉徐，关峰给艾玲讲“我们要夹紧尾巴做人”。徐景贤也给我讲要夹紧尾巴做人。

## 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

我们在北办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中央领导每天都有接见，主要是接见各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当时除了上海等少数几个地方成立了革委会，其他省份都成立不了，斗得一塌糊涂。中央就一批一批地把各省的两派叫到北京去，直接解决问题，通常都是由周恩来出来协调两派。这样的接见有时候一个晚上有两场甚至三场。北京高校的两派斗，中央文革也经常会找他们去，他们斗得厉害的时候，忽如其来的会通知去把这些造反派头目叫到人民大会堂去。当时我们北办参加的接见主要是这两种，即中央解决各省问题时的接见和召见北京高校的两派。有时也会有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央的人全体出来接见，那是比较隆重的。当时这样的活动北办都有权参加，《光明日报》都不能够参加，《解放日报》更不能参加了，各个省的报纸只有《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能够参加。

参加这样的接见时，我们都会记下中央领导讲话中一些新的精神，除了讲各个省的具体情况以外，主要是他们讲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关、戚，他们有一些什么指示，还有周恩来讲了些什么，康生、陈伯达讲了些什么，我们都会及时地向上海通报。但张、姚一般讲得很少。当时徐景贤在上海每天都有新精神，因为他得到消息比人家快。我们当天参加接见，半夜回北办后我就打电话回上海，通报今天的新情况，电话那头是写作班的陈冀德，她记录下来后就报告给徐景贤。这样徐景贤第二天就可以讲出来新的精神，所以那时上海跟中央跟得紧，就是因为派了人去北京的结果。这样的接见参加的多了，慢慢的我们就特别重视中央文革接见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其余的接见天天有，到了后来大家都不愿意去了。参加这样的接见，每次去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比如说，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接见，我去了好几次。那时安徽一派说夺权夺得好，叫“好派”，一派说夺权好个屁，叫“屁派”。中央召集两派开过两三次会，我都去了。最初通知开会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到了那里以后，就一直在等，可以一直等到半夜周恩来才出来，因为周恩来实在太忙了。这样一等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真是无聊透顶，因为进了人民大会堂后就不好出来了，而且也不能乱跑动。最初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没去过人民大会堂，都还很愿意去，后来有关各省的接见叫他们去，他们都烦恼得不得了，我就说我要求你们去。一般情况下，中央文革接见北京高校的头头都是我去。艾玲他们原北办的人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他们没有向市革会汇报的任务，这些事情都是上海派去的几个人在做，所以非常累。

当时我还年轻，三十岁刚出头。每天一早起来就外出，到北大、清华等学校去，然后晚上回来凑情况，凑完之后要写稿子，再发稿子，经常晚上还要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我记得白天接见极少，大概就两次吧，军委五大将一起参加的，其他的接见全都是夜里，而且都是很晚很晚，尤其是周恩来参加的接见。最晚的一次，通知傍晚六点去人民大会堂，到周恩来出来时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上海当时很重视中央文革的人讲了一些什么。当时北京有许多小报和各种各样印出来的材料，多得不得了。我就要求北办的人，每到一个学校造反派的总部，比如清华有“井冈山”，后来又有“四一四”，就去问他们今天有什么材料，问他们要材料。各学校下面的院系也有自己的造反派组织，也都印自己的材料。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有卖小报的，一分钱一张，一次去可以买一百多张，这些小报里除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还有一些历史性资料，比如毛泽东1957年反右时的

讲话，还有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揭露材料，如彭德怀罪状等。从灯市口到卖小报的地方比较近，我每天都从地摊上买一些小报回来。通常我就把五大领袖和这五个学校的材料整到一块，看看有什么新东西，选一选，把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划出来，然后送回上海。后来我知道写作班成员天天抢着看这些材料。慢慢的我发现，我在接见现场有时记不住领导讲话的精神，又不愿作笔记，但等到第二天一定会有小报登出来，所以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新精神，只要去买一张小报，就全有了。这也是一种办法。后来北办那些人就如释重负，问有些活动可以不去吗，我说可以的，去买一份小报，就都知道了。但中央文革的活动是一定要去的，有些小报也不敢登，登了以后会被惩罚的。

朱维铮与金光耀在一起

我在北办时，有时候刚刚睡下去，突然有电话来了，我赶紧起来，问是什么地方的，对方说我是老人家办公室，出了个什么问题，你们赶快去了解一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接到老人家办公室电话，说人民大学有一个苏联回来的、姓孙的自杀了，要我赶快去了解。当时艾玲已经回家去了，我赶紧把北办的人叫起来，去人民大学了解情况。我记得有十来次从“毛办”“周办”来的电话，直截了当地指挥。这就证明北办出的内参情况，在毛、周那里都能看到，而且印象很深。所以他们才会越过中央文革办公室，直接指挥我们。

## 与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来往

我们在“北办”的生活忙忙碌碌，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一开始就有规定，出去要用脑子记，不许拿出笔记本来，回来凭脑子记的来写，要真实客观，不要有评论。北办的记者都非常辛苦，真正见那五大领袖时，通常都是我去的，因为我有一个《文汇报》北办负责人的身份。那五大领袖讲起来造反了，其实对身份计较得很，你说是记者他根本不理你。比如说聂元梓，她架子大得很，我绕了几个弯子去见她，说自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她就问我，《文汇报》跑到北京来干什么，你们要了解这些情况干什么。我就说，《文汇报》是造反报，全国造反最早，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到北京的情况，在报纸上发表，对上海以及上海附近的文化大革命都有指导意义。我和聂元梓见面，她哼哼哈哈两个多小时，我一个字都不敢记，全靠回去后凭记忆赶快把它写出来。北办有的人记忆力很好，回来很快就能写出东西来，有的记忆力确实很差，习惯于笔记本记，写不出东西来。当时我们写东西要客观，不加自己的评论，主要是要写出阴暗面，比如北京高校的这几个组织和各省的造反派有什么关系，他们有些什么议论，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指示有什么议论。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了解的阴暗面的重点，至于他们怎么赞美文革，就不需要我们说了。北办记者中吴尔祥比较能干，能够抓问题，艾玲很欣赏他。他这个人比较敏感，他跟我说我们这样搞下去，没有人会了解我们，因为要求保密，哪怕把我们抓进去了，我们也不敢随便乱说，会死无其所的。我发现艾玲就受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话，但吴尔祥是北办几个记者里面抓问题抓得最多的。开始让他跑北大，后来北航、北京地质学院都由他来兼跑，重要的人都由他去见，他抓的情况最多。我带去的两个人都不太行，但我本人每天都会抓一些东西。因为艾玲是报社革委会主任和“北办”正式的主任，有时候要把她拉出去壮声势。有一次要去见老佛爷（聂元梓），就请艾玲一起去。艾玲往那一坐，说几句客气话，别的什么也不用说不用问，但她往那一坐，别人似乎就

愿意多谈一些。

我和五大领袖没有什么私交。蒯大富比较幼稚，和他谈着谈着，他有时候会拿出他写的诗让我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诗，我都会把它记住，回来后写出来汇报上去。北办其他人很吃惊，说你怎么会连诗都会看到，都会记住。我当时记忆力确实很好。蒯大富写了一首什么诗，我们照例都不加评论，如实反映上报。所谓如实反映其实都只有一面，讲好话的一面不反映，讲坏话的一面都会反映。北京的这五大造反组织和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都有关系，还和军队也有关系。有几个地方我们是不去碰的，一是党中央各个部门，还有军委各个部门。我在北办的时候，有人到北办来，要求通过北办向中央反映情况，碰见这种情况，我们都说我们只是上海派来的，只负责给上海报纸写点消息，写点别的什么，我们没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任务。

《文汇报》以前主要在文艺界，但我去北办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是高等院校，而且高等院校主要在五大领袖。艾玲他们就变得没有用武之地。王关戚垮台以后，江青开始重视文艺界的事情，艾玲就说他们要发挥北办原来的长处，他们原来的长处就是跟文艺界打交道。我请示徐景贤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文艺界。艾玲和吴闻等，就又开始跑文艺界了。我也跑过文艺界几个人物。我和艾玲两人经过隔离贺敬之单位的同意，还跑到贺敬之隔离的地方跟他谈过话，谈了之后贺敬之表示支持文革，他可以为文革写些诗，回来以后我们将这一点写在情况上面，贺敬之还真的很快就解放了。艾玲跟我讲，看来我们找他们还是有用的，帮到他们忙了。崔嵬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到他的家去过。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时候我在上海，因为正好回上海汇报工作，所以大揪“军内一小撮”时候我不在北京。在上海时正发生砸“上柴联司”的事，就派我做联络员。那天王洪文是前线总指挥，徐景贤、王少庸坐镇康平路，他们在市公安局给我搞了一辆摩托车，要我把现场的情况报告他们。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也坐镇上海。“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垮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我对戚本禹有点警惕。戚本禹的大本营在学部，也就是现在的社科院，尤其是历史所这样的地方。我对历史所一直很警惕，不敢多招惹。

在北京时，为了活动的方便我们以北办的名义去找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后来揪斗“五一六”时，把我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人挂上钩，说是他们发展我成了“五一六”。其实我跟他们只是访问的时候见过两三次面。

## 离开“北办”

我们去的时候说好是去三个月，到了三个月后，刘景清和倪志良两个就回上海了，特别是刘景清不愿意做这事，要回去。他们回去之后就要换人去。换的人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挑选。他们让我继续待在北办，我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待在那里。当时上海的写作班有一个核心组，市委机关联络站也有一个核心组，成员有徐景贤、吴瑞武、王绍玺。他们挑了一个党员来北办。真是莫名其妙，在北办除了艾玲和李根蒂，其他几个都是非党员，我也是非党员。这个新来的党员有一个头衔，就是党小组长，其实一共也只有三个党员。这个人原来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叫王金鑫，当时三十多岁，比我年龄稍大。他在外面活动的本领很差，整天就监督我。我在北办里被弄得很不高兴。我在写作班时一直都有党支部的，我就属党支部管。但他们现在成立党小组，我知道目的就是要管我，因为这个党小组管不了艾玲，也管不了别人。另一个新来的是团市委的，年轻些，但没有上过大学，没多少文化。

这两个人在北办待了三个月后就回去了。这时我在北办已经有半年了。后面调来的两个人做不成事，艾玲对他们意见相当大，说他们别的事情不干，专门监督人，给艾玲讲起话来也是一副党小组长的面孔，艾玲吃不消他们。他们回上海后，我就向徐景贤提出来，不要再派机关的人来了，机关的人来当不成记者，而且刚刚熟悉了情况，三个月到了就要回去。你既然让我待在那边，我想还是从《文汇报》里面挑一些记者来北京。当时《文汇报》社也有意见，《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变成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办事处，他们自己反而用不上了。《文汇报》的几个负责人都很会闹的。这样，徐景贤就接受我的意见，派了《文汇报》几个年轻记者去北京，这几个都是造反派认为比较可信的。

# 李慎之逝世十周年祭

○ 董健 口述 高子文 整理

李慎之(1923-2003)去世已经十年了。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启蒙思想家,为的是将他与以下两种与启蒙相关的人区别开来。一种是所谓的“纯文化启蒙者”。他们倾向于把古今中外的启蒙资源仅仅当作学问来研究,甚至以批评启蒙的政治化来强化这种“学术”。这类人的特点是把启蒙这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文化运动,变成僵死的教条的注脚。他们经常打着非政治的旗号,而实际上却是不懂政治,惧怕政治因而回避政治。第二种我把他们叫做没有“道义担当”的启蒙者。这类人在思想上对现实政治有一定的认识,有时也会谈及启蒙与政治的关系,但是一遇风险,他们便立即退缩回来,搬出所谓“生活的艺术”。他们为了适应现实体制将生活过好,回避一切政治风险,毫无“道义担当”精神。这类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犬儒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与他们截然不同,为了作出区分,我便在他的头上加了“真正”两个字。

在李慎之去世后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动。虽然他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但他在十年之前所追求、所呼唤的那些启蒙思想文化价值,如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人权、宪政与法治……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愈加迫切了。他的看法仍使人感到新鲜,甚至可以说,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展开好好讨论。所以在这十年里,我们感觉他似乎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所提出的问题,一个都不曾解决,仍然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来怀念李慎之,并不是追忆往昔,漫谈过去,而是谈我们的当下,谈我们的现实。

## 思想启蒙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李慎之在思想文化启蒙上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在他的同辈人中首屈一指,但他的最后岁月是寂寞、孤独、郁闷的,这令人感到十分惋惜和悲哀。在过去的十年里,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它与人民和时代的要求距离尚大,这与我们冷遇了李慎之一类的启蒙思想家有关,与思想文化启蒙的停滞有关。

思想启蒙与政治改革是两个范畴的问题。但从中外历史与现实看,可以说这两个范畴一直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着的,不能将它们混淆,但更不能完全分裂来看。思想启蒙是政治改革的精神助力,为政治改革扫清障碍,而政治改革则是思想启蒙结出的社会成果。两者关系非常密切。启蒙的英文为Enlightenment,本意为照亮。我每次看到这个词就会构想出一个画面:智慧而富有理性的“先觉者”举着一个火把,把道路照亮,指引着后面的人往前走。这个词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启蒙的含义。启蒙的对立物是“洗脑”。“洗脑”有时看起来像“启蒙”,但它与专制、暴力、欺骗、对人进行奴役相联系,在文化价值上与启蒙根本对立。“洗脑”留下的精神垃圾要由启蒙来清扫,“洗脑”中受奴役的精神创伤要由启蒙来疗救。李慎之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为政治改革提供思想精神根据,为其在思想精神上的合理性进行说明,为其

---

北办都换成了《文汇报》的记者,市革命委员会去的人只剩我一个了。这时有人在外面乱讲,《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实际上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去的人,朱维铮就是市革委会的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借用北办记者的名义在北京搞活动。这话传开后,张春桥也紧张了,特别那时已出了王关戚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就说,叫朱维铮回上海吧,就这样把我调回去了。时间大概是1967年12月下旬。■

(责任编辑 徐庆全)

1999年6月李慎之在美国凯特林基金会演讲

扫清道路。因此启蒙与政治改革必然有一种先后和互相配合的关系。

西方的启蒙和政治改革之间的互动,我认为进行得比较有序。比如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后来西方工业社会发展提供新的价值观念,两者慢慢糅合,最终诞生了现代民主政治。在中国则不然。从1840年开始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启蒙的要求一再出现,而政治改革的要求也一再出现,但两者的穿插、交汇、糅合比起西方来却不是那么有序。常常出现的现象是:启蒙还没来得及导引出政治改革,就被反改革的政治力量扼杀了;而当有一定的改革倾向的政治力量要求启蒙的时候,启蒙又能够得到部分的进行;启蒙在部分的进行时,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又会变形,变成“非启蒙”。所以,中国的启蒙,我给它起过一个名字叫做“夹生饭”,就是说这碗饭还没有真正煮熟,还需要重煮。李泽厚曾概括过这个现象,叫做“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他讲的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因为“救亡”也需要启蒙。事实上,他说的是“救亡”造成的一种新的政治专制力量对启蒙的扼杀。比如用抗日来压制自由、民主思想,看上去是国人的民族主义选择,而实际上仍然是启蒙所反对的那种专制力量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将启蒙压下去,是政治专制的暴力促成的。本来应该是启蒙促进政治改革,这下子变成了不改革的政治以“国家、民族”高于一切的名义令启蒙止步。

这种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一次,后来到了80年代又发生了一次。启蒙发展到一定阶段会由于政治的干涉而断裂。启蒙和政治改革二者交叉互动的无序性,造成一种精神领域的“夹生饭”,这样,一方面使得启蒙思想发展不够,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改革困难重重、曲折多多。关于这一点,李慎之曾多次谈到,并且有全面、深入的阐发。他特别强调政治改革之前、之中的启蒙之扫清障碍的彻底性问题。在处理启蒙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时,他往往首先从政治着眼,然后再追究到背后的文化根源,而不是像某些文化人那样首先从文化着眼,做文字游戏式的解读。比如关于人的个性的建立问题,他不是从空泛的人的个性开始说的,而是先从中国社会的状况入手,考察人存在的政治现实,从而深挖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他甚至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政治体制决定的。”他特别强调政治,强调文化与现实背后的权力运作,强调人与人之间权利资源的分配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提炼出“文化传统”这一概念,用以指称从秦始皇到现在一以贯之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分是他非常重要的思想贡献,这也是他为了解决启蒙与政治改革的关系而分析的一个最深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否定,但文化传统必须否定!

在今天,人们急切地呼吁政治改革,以为我们可以一步就迈入现代民主政治。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回避思想文化启蒙对政治改革的重大意义。政治改革需要思想的助力,需要精神的支撑点,这就离不开启蒙。在80年代,李维汉跟邓小平有过一次谈话。他向邓小平建议说,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一定要批判封建专制。邓当时接受了这个看法,于是有了他1980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要不要反封建,其实就是要不要启蒙的问题。在80年代,反改革的力量都是反对启蒙的。党内就曾有人直言说:“反什么封建,反封建不就是反党吗?”李维汉与邓小平的谈话可以看成是党内高层对政治改革与启蒙的关系的重视,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可惜这种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之间的良性互动维持了不久就又断裂了。在这之后,直接把李维汉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将其进一步发展的就

是李慎之。特别在90年代之后，他更强调启蒙的思想文化价值及其政治性功能，进一步把启蒙与改革紧密联系了起来。

## 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四次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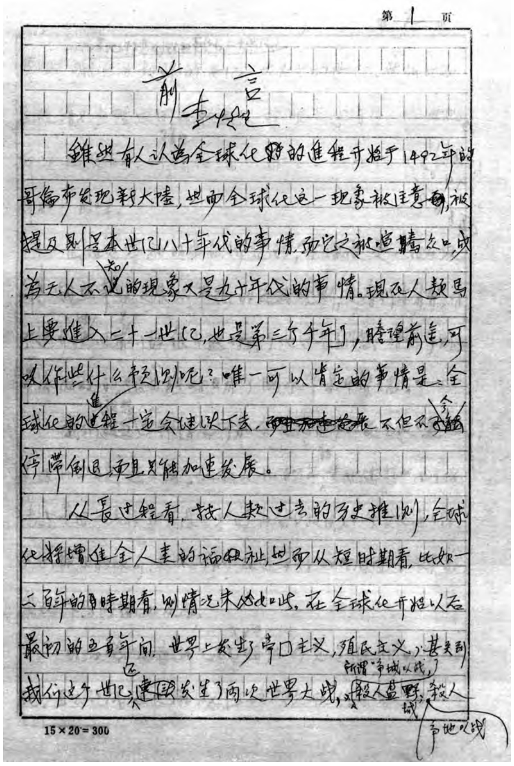
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经历过四次浪潮。在这四次浪潮之前，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零星的启蒙思想火花。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最早对封建君主的罪恶提出批判，认为“君”（皇帝）是“天下之大害”，因为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只有各个个人得以为其“私”才是合理的。在他所论述的这个“私”字上，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个人主义的因素。清末到民初，龚自珍、魏源，以及梁启超等都曾阐发过启蒙思想，但都没有形成浪潮。

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出现于“五四”时期，基本的内容是科学和民主。西方启蒙运动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化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大都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中国，为新觉醒的一代中国人所接受。我们常说的“五四精神”，就是指的这些启蒙价值观念。李慎之正是在这种精神遭到破坏时起而为之鼓吹的人物之一。北大一百周年校庆时他写了《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将自由主义明确认定为北大的精神传统。自由主义传统是现代启蒙第一次浪潮中所形成的大学基本理念。

到了上世纪30年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二次浪潮出现了，叫做“新启蒙”。这一次是由左倾激进的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发起的。李慎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在“新启蒙”里，启蒙的内容已经变了。他们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启蒙的内容，代替了“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并且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也一直都相信这是进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有很大的问题。首先，“五四”所建立的科学和民主的价值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按照李慎之的看法，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而不是哪个阶级的价值。第二，陈伯达等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启蒙”，从其结果看有严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好的，包括它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当列宁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付诸实践的时候，历史证明这是一种错误。陈伯达等人当时不可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他们看到，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这些理论扭转了思想文化启蒙的根本方向。更明确点说，所谓的“新启蒙”，“新”在资产阶级启蒙变成了无产阶级启蒙，实际上是把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宣传变成了启蒙，是对“五四”启蒙的反动。“新启蒙”在很长时间迷惑了很多人，李慎之也曾把它当成新的现代化追求。民主、科学追求现代，而马列主义追求更新的现代。过去我们一直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启蒙，应该启资产阶级未启之蒙。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反现代”的现代性，把毛泽东式的极“左”当成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反现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现代。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比较天真，没有什么根据。直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这个“反现代”的现代性才终于破灭。今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列宁的这一套社会革命理论，从它在各个社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的各种影响看，就是“反现代”，根本没有什么现代性。因为他仍然是试图把人拉回到奴隶状态，在上是专制主义，在下是奴隶主义。第二次浪潮过去后，启蒙就不再提了，因为在“左”倾激进者看来，“五四”的启蒙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需要它了。

一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趋势才迫使中国出现了启蒙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为开端，至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被查封而结束，历时十年。这次启蒙浪潮的核心精神，可以说是对第二次浪潮之反动的再反动，对长期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左”倾激进思潮的大反拨。代表人物有周扬、夏衍、王元化、王若水、黎澍、高尔泰等。他们发扬“五四”启蒙精神，总结“左”倾假社会主义（即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的教训，特别是“文革”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教训，结合中国现实，解释和接受西方现代启蒙的思想文化价值。周扬关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长篇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王元化关于“五四”精神的文章，王若水、高尔泰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论文都是这次启蒙浪潮的经典之作。他们以真人道主义批假社会主义，甚得人心。但是，时机又被我们错过了，当时的极“左”势力支持了胡乔木等人反启蒙的错误观点，使得启蒙出现了曲折，周扬等人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个浪潮

在以后一些年里被压了下去。李慎之在这一时期未唱主角，但他的思想是与这一浪潮完全相通的。


第 1 页

前言

李慎之

虽然有人认为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于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然而全球化这一现象被注意，被提及则是本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而它之被宣传得众口成为无人不知的现象又是九十年代的事情。现在人类马上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也是第三个千年了，瞻望前途，可以作些什么预测呢？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是：全球化的进程一定会继续下去，不但不会停滞倒退，而且只能加速发展。

从长过程看，按人类过去的历史推测，全球化将增进全人类的福祉，然而从短时期看，比如一二百年的时期看，则情况未必如此。在全球化开始以后最初的五百年间，世界上发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甚至到我们这个世纪还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所谓"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15×20=300

李慎之先生手迹

这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沉默了。李慎之也不再公开发表言论。但从90年代初开始，他一直思考启蒙问题，并最终掀起了启蒙的第四次浪潮。我说这是第四次浪潮，基于以下两个事实。首先是他对启蒙有系统的见解和执着坚持的精神。当90年代有些文化人出于政治压力而“反思五四”时，李慎之则开始大力发扬“五四”精神，发表文章大谈启蒙。他把思想文化的启蒙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由政治中发现启蒙之必要性，由启蒙中寻找改革之路径。这在当时体制不允许，极“左”保守势力又很强大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丁东编选的两卷本《李慎之文集》是启蒙第四个浪潮的重要文献，将在思想史上放出光辉。李慎之提出了著名的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的观点。当时人们认为全球化只是经济的全球化，只是加入世贸组织，而他则强调全球化还应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和文化价值的全球化等问题。而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民主化。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谈得非常得意，跟我说，“实际上，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说你这样讲很危险，他却回答说1979年访美时他跟邓小平就讲过同样的话，邓当时只是笑一笑，没有反驳。他的“三化合一”论实际上就是谈启蒙和政改问题。对于来自西方的思想，李慎之不认同照搬，强调还得看看中国自己的文化。对于现代化，他不认同匆忙地复制，而是强调吸取国民性改造的经验教训。他基本上同意唐德刚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到2040年才能真正完成。李慎之的最大的思想成就是将世界性的文化启蒙的价值放在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之中，来进行提炼，产生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准确看法。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经历过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里，也是很先进的。他非常好地吸收了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文化遗产。他给启蒙赋予了新鲜的活力，使之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历史诉求。在晚年，他多次讲到，如果有下辈子，他愿意做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把思想文化启蒙作为毕生的事业。

其次是李慎之的周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队伍。李慎之是第四次浪潮的领袖人物，在他身边围绕着一批知识分子和改革人士。老一辈的有李锐、朱厚泽、何方、胡绩伟、李普等等，他们大都亲历经济和政治改革，对中国的政治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批“两头真”的老人都在第四次浪潮中发表了很多有深度有针对性的好文章，影响很大。年轻一辈的有徐友渔、刘军宁、秦晖、朱学勤、高华、丁东等等。他们的著作也大都可视为第四次浪潮中的重要文献。他们都以李慎之为师，与他一起探讨中国的启蒙与政治改革之路。

在90年代，由于政治改革迟疑不前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文化界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反启蒙”势力。这一势力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延续了红色思想资源的老左派；另一类是吸收了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思想的所谓“新左派”。后一类人中也包括某些“新儒家”的文化人，他们更多地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排斥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理论更为高深复杂，但实际上这种高深复杂的背后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判断一种思想是否有价值，不能孤立地只求所谓的“深度”，更要看它所面对的文化环境和它的社会适用性。李慎之的启蒙才是实实在在的启蒙，是为中国现代化所急需的。

李慎之所领导的这一次启蒙是一次有纲领有思想有队伍的思想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自五四以来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次现代启蒙浪潮。政治家如果能够吸收这个浪潮中的思想资源，将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改革的深入。

## 思想文化启蒙与道义担当精神

思想文化启蒙并不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启蒙者很可能会遇到阻力，受到各种政治、经济的打击，有时甚至遇到人身危险。尤其在中国，启蒙不仅是文化观念的选择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道义担当的考验。李慎之先后就曾经历过两次打击。真正的启蒙者所需要的道德上的承受力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人格精神在李慎之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出来，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能力是非常弱的。这一点可以与苏联相比较。同样的专制氛围，同样的压迫，苏联知识分子能够在狱中写出好作品，一旦社会开放，不加修改就发表，出现了所谓的“回归文学”，而我们却不能。中国作家受到迫害并没有完全沦落，为什么就不能写出真正的作品来呢？反而往往是选择顺从迫害者的价值，为文化专制服务。我想，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在李慎之看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修齐治平”不过是为了使自己的文化受到统治者的赏识，缺少独立的精神。即便是道家，也只不过是回避而不是抗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一次又一次的“洗脑”对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精神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甚至摧毁了他们对是非善恶的基本辨别能力。我可以谈谈我自己的感受。1991年我被招参加教育部干校的学习。来这里参加学习的都是大学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照理说这样的内部学习应该是互相交流互相论辩的，但当时整个政治氛围极“左”（大搞反对“和平演变”，文革那一套变着法儿又重来了）。所有与会的人都顺着有关方面所要求的“精神”进行学习与批判，丝毫没有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甚至人们都纷纷为执政者出计献策来怎样统治学生的思想。我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中国现代启蒙理性的彻底解体，是文革结束之后辛苦积累起来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彻底丧失。我感慨在中国启蒙成果的丧失和专制的建立是多么的容易。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思想文化界人士，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以前讲“沉默的大多数”是说一种反抗的力量，但今天却已不是这样。在今天的中国，沉默是因为“生活的艺术”，因为糊涂或者麻木。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李慎之，就更能够发现他的道义担当精神的可贵了。

我一直把李慎之看成是我的启蒙老师。与他结识，深深感受到他的道义担当精神和人格力量。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扬州大学教授曾华鹏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回来后告诉了我关于李慎之的一件事。李慎之由于“不合作”态度被撤了职，但是可能由于疏忽，他仍然被通知去参加了全国人代会。大会开始时，宣布取消两个主席团成员，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李慎之。分组讨论会上，李慎之在文教组，他首先发言，说：“刚才大会宣布取消两个主席团委员，赵紫阳大家都认识，李慎之可能大家不熟。所以我需要解释一下，以免给大家带来‘麻烦’。李慎之就是鄙人。”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对他非常敬佩。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需要多大的勇气。90年代初，南京大学筹办“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匡亚明校长请李慎之来参加。他来的头一天，我们就长谈了一晚，谈当时的形势，谈未来的发展，那时他还比较乐观。在20世纪的末尾，为国庆50周年，李慎之写出了独特的历史感悟，也说出了大众欲言而未能言之言。他回忆了50年来中国的变迁，以启蒙思想考察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与现实，呼吁中国社会走上自由民主的现代化道路。我看了之后愈加感佩他的人格力量。一位美国作家说过：“一句真话比一颗行星冲击地球的力量还大。”李慎之就会说这种真话。

在第四次启蒙浪潮中，李慎之是当之无愧的思想文化标杆，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我们从他那里接受到的不仅是诸多的文化理念，更重要的是他的那种道德力量。在这面临转折的关键时期，真正的思想启蒙者的道义担当的人格是可贵的，值得发扬的。■

2013年1月12日于跬步斋

（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高子文：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

○　孙旭培

## 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何以成了问题?

今天的人们对民主自由有无普世价值,争论不休。一方说: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民主自由就是有普世价值的好东西。另一方说:民主自由要分清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的东西。

可是,在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那里,这是不需要争论的。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主席提出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主席还在交谈中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以上这些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认识,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其中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所有这些言论无须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乃至全党,那时谈民主自由是与国际接轨的,是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谈的。正是这些思想和主张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帮助共产党打下了江山。

从以上言论还可以看出一点,那时的民主主要是指向国家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新中国成立后,民主的国家制度就不怎么谈了,民主只成了民主作风,常常说到的是“民主集中制”,“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这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方策在我胸中已有,但是我让你说话。这里的民主只限于“让人说话”的民主作风:你可以在我的意思指导下,说一些大同小异的话。但是由于没有刚性的政权架构和国家制度加以保证,让不让你说话,听不听你说话,就看我有没有民主作风了。民主中的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本来就能在辩论、讨论以后解决决策问题;但一搞民主集中制,常常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了,即使有些小的制度规定,也往往变成搞形式、走过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前27年,我们不从普世价值出发建设国家的民主制度,结果全党、全国在专制主义的“一言堂”的压迫下,遭受了太大、太多的灾难。

我国从晚清,特别是从《大清报律》颁布以降,就开始有新闻自由和法治,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就中断了呢?根据笔者在《新闻自由之路》一书中的研究,这与新闻自由的理念和实践,两次以不同形式地与国际社会相背离有很大关系。一次是清末民初的极端放任的新闻自由,另一次是共产国际的新闻理念和政策对中共的决定性的影响。

## 清末民初新闻自由的弊病在于违背普世价值

过去总有人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下没有新闻自由可言,纵有也是徒具形式。但是自由总是从有形式开始,连形式都没有就不可能有起码的

新闻自由。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提出新闻自由的4条标准，也就是4种表现形式：自由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批评。这4条标准中，以自由出版报纸和自由批评（政府）两条最为关键。我们曾以这两条标准考察清末民初的我国报刊，证明我国是有新闻自由的。

清末的两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采取的均是注册登记并缴纳保证金的制度，即办报无需批准只需呈报，但需缴纳保押费。与国外相比，同一时代的法国《出版自由法》采用的也是注册登记制。日本《新闻纸法》采用的是注册登记加保证金制。这说明清末新闻出版管理宽松程度比法国低，与日本持平。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和《出版法》，集中了日本等国报律中的限制性条文，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那些规定虽然条文比较严苛，但通常未得到严格执行，使民间办报很普遍。

批评政府也十分常见。从《大公报》（支持维新但不偏激的报纸）发表的“言论”来看，清末1908至1911年三年中，我们按“星期合成法”抽样，共获得样本181份。在这些样本中，《大公报》共发表批评政府和时政的言论63篇，占抽样总数的34.8%。也就是说不到3天就有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批评涵盖了政治、法制、军事、外交、教育、交通、民生等几乎所有方面。袁世凯执政时期，1912年1月至1916年7月，《大公报》刊发“闲评”453篇，其中批评政府的有373篇；所占比例为82.3%。许多批评是有相当深度的，例如，在“姚荣泽案”中，《大公报》批评袁世凯“以命令变更法律，大总统之蹂躏司法”。即使在“癸丑报灾”发生以后，对政府的批评仍然很多。恰恰是癸丑报灾发生的1913年，是《大公报》批评政治的言论最多的一年。1913年10月，国会选出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通常是举国庆祝之时，可《大公报》在“报灾”发生之后仍发表文章，讽喻“民国由临时而变正式”，可“大总统如故也，副总统如故也”，乃是“老店新开”，“营业之失败，或更甚于老店”。

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那个时代虽然也有新闻自由被压制的时候、也有新闻自由不足的地区，但给人总的印象是新闻自由过头，特别是革命党办的报纸。章太炎这样著名的报刊政论家在报纸上写文章，称光绪帝为“戴　小丑”。武昌起义发生后创办的《大汉报》，从创刊第一天就杜撰《孙大总统告同胞书》的假新闻。《中华民国公报》“大量杜撰了所谓某省独立、某省响应、某部即将来援的新闻”。1912年5月20日，主笔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短文，题曰《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当时的《民权报》是在上海租界办的，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将戴季陶抓捕入狱，而当时的中国总理唐绍仪竟然发电报求情，最后只“罚洋三十元”结案。这说明，中国的权力当局也搞不清新闻自由的确切含义。1913年5月8日，济南《齐鲁民报》刊出评论，公开号召北方军人“倒戈反袁”，宣传“政府而叛国民，军人不应听政府之命令”。号召军人反戈反对总统，这是典型的煽动叛乱，是任何新闻自由的国家都要法办的。即使在新闻自由度较高的美国，也有“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判例，禁止导致“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言论。由于不守法也不受新闻自由规矩的传媒的推波助澜，再加上其他原因，作为其反面的专制主义反而得到复辟的可能。在这里，专制主义似乎成了对滥用自由的惩罚，尽管它本身也不能长久。

在西方，自由与法律是相对应的范畴。法律界定自由，自由对法律负责，“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洛克语）。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与新闻出版法的关系，马克思说：“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这些是文明世界对自由的科学认识。自由的概念发展源远流长，有过不少说辞；达成这一共识，是17—18世纪实现的。那些拥护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无论是英国的霍布斯、洛克，还是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直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本人，都强调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没有一个人把自由解释为“为所欲为”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法律也是可以批评的，也可以建议修改，只是不能动辄以抨击“恶法”为名，煽动违反法律，破坏法律的实施。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的含义与上述普世价值的距离较大。《辞源》列举一些古典文献

中谈到的自由，解释自由的含义是，“谓能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大公报》1903年就指出：底层社会所理解的“自由”，“为任便而行，毫无拘束之意。其类则肆意杀人亦可谓自由，恣意行淫亦可谓自由，欲抢掠亦可谓自由，凡出于吾心之所欲，必使偿之而后快皆可谓自由。”（《自由辨》，7月11日）总之，中国人历史上对自由的理解，含有随心所欲，自由放任之意，没有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近现代中国人仍有很多是这样理解自由的，这种理解对新闻自由的健康运行，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因而总是出现很多超过新闻自由范围的非法的新闻活动。如果说，在清末进行那些不遵守法律的新闻活动，就是为了把国家搞乱，把封建王朝推翻，因而还具有合理性；那么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建设新的共和政体的过程中，报纸动辄扬言杀总统、总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梁启超语），这种“新闻自由”还具有合理性吗？在这种舆论环境中任何政府也治理不好国家。只是由于袁世凯最后上演过称帝丑剧，太臭名昭著，没有人去细分是非罢了。总之，那个时代从社会精英到国家掌权者，都没有搞清新闻自由的法定含义，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由的理解，来实施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新闻自由，使新闻自由走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虽然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受到的戕害也很多。

顺便廓清一个问题，共产党人从南昌起义开始，就走上武装反对当时政府的道路，同时以“新闻自由”为武器，与当局作斗争。实际上，新闻自由只能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共享，不能由执政党与革命党共享，因为革命党所做的是推翻现政权和整个现存的法律体系。其报刊活动无法以新闻自由论之，只不过是借新闻自由之名罢了。因为那个年代毕竟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动乱的年代。这也是本文不分析、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自由的一个原因。何况《国际新闻自由公约》也规定，“当本国领土内有战争或非常事变时”，各缔约国“可暂时停止履行本公约所规定之义务”。

但是，许多共产党人却以为他们当年能以报刊从事革命宣传，是他们钻了国民党出版法的空子，其实当时《出版法》就有不得“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等等一系列的规定，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国家混乱，政治腐败，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是很难有空子可钻的。

对新闻自由理解出现失误，也与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出现很大偏差有关。虽然19世纪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但中国人却未能把握自由主义的精髓。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方面是缺乏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出现过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思潮，很少有人谈到言论、出版自由要对法律负责。由于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思潮对革命者利用报刊活动，假新闻自由之名，推翻旧政权，曾经起过很大作用，许多人便误以为，那就是新闻自由；而这种自由似乎又是与制定的出版法不可能很严密，总是有空子可钻有关。这种错误认识，至今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成为通过新闻立法规范新闻自由的重大障碍。

这里还需特别提及的是，对自由主义的偏颇理解，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与毛泽东1937年9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有关。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当时革命队伍的各种消极表现。“自由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被解释为“不要组织纪律”，“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老子天下第一”的错误做法。出现这些坏现象当然应该批评，但不能把它们扣在自由主义的头上。不难看出，毛泽东是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的含义来理解自由主义的。特别是这篇文章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学生的语文课本，影响深远，结果自由主义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头脑中非常厌恶的东西。

在西方，自由主义包含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想观。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不违法不得禁止。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兴起的平等的思潮，它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子天下第一”，绝不是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恰恰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又一种表现。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仍有很多人，包括掌握很大权力的人，缺少“自由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也缺少“自由主义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层认知，他们的认识与普世价值拉开了很大距离，以为有了新闻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因

而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充满疑虑、抵触甚至恐惧。这说明，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有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问题，也就是需要一个承认普世价值的问题。摒弃那些对自由、自由主义的落后于时代和国际社会的误读、误解，才是新时期建设符合文明标准的新闻自由的第一步。

## 莫把共产国际的新闻理念当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新闻思想传入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尽管毛泽东在社会上写文章，谈民主自由仍是与普世价值一致，但在党的新闻工作中，其新闻思想、新闻做法，是从另一个侧面与普世价值拉开了很大距离，实际上也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背道而驰。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其“自由报刊”、“人民报刊”思想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认为，“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马克思强调新闻出版自由的普遍性，说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是“普遍的权利”和“普遍自由”，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特权”。这些是与17世纪的弥尔顿、18-19世纪的杰弗逊等人把出版自由视为人人享有的“天赋人权”的观念相一致。对于到底什么是新闻出版自由，恩格斯在1844年作过一个完整和准确的回答，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新闻出版自由。”为了保障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极力主张新闻出版立法：“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实践与马恩的论述强烈反差的需要，某些学者解释说，马克思提出“自由报刊”、“人民报刊”的思想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企图把它区别于马克思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可是，持“两个时期思想”辩辞的人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马克思在成了共产主义者之后，背离或放弃了言论出版自由思想、人民报刊思想。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只要无产阶级政党报刊存在，而不准有其他报刊存在。无论“早期思想”还是后来办党报时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一生所坚持的思想。

下面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办党的报刊时期，所论述和践行的思想吧。

即使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马恩也强调党的报刊的自主和自由，马克思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被列宁称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的《新莱茵报》，是德国“民主派机关报”（并把这几个字标在报头下）。而在德国革命中对民主派批评得最多、最尖锐的，恰恰就是这张它自己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创刊的第二天，马克思就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因而在当时进行的革命中“遭到了失败”。马克思由此谈到报纸对自己党派的态度，说：“平常向代表社会舆论的任何机关报提出的要求是：对于它在原则上同意的党派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我们将不以这个要求为满足。我们将不用虚伪的幻想去粉饰所遭到的失败。”

恩格斯1891年要求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新时代》发表马克思批判党的纲领的文章《哥达纲领批判》，为此，他在给党的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指出：“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恩格斯后来还说：党“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报刊‘国家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缺点”。“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从马克思、恩格斯处理党与党报关系的论述，可见他们的新闻自由、报刊自主的思想是多么彻底。

我国多年来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对于上述所有论述几乎一字不提，讲的都是列宁、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人的观点、主张。

那些是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高度集权的新闻观念。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分析共产国际的新闻理念和政策的变化。

国际共运史上有三个国际。第一国际，马克思是其创始人之一和思想领袖。第二国际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组建的。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如法、德等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系列文件中，都有反对书报检查，积极为社会大众和工人政党争取新闻自由的主张。并且在党内的报刊上，也实行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总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新闻方面的主张，都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一致的。

列宁在1914年8月4日德国社民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后，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列宁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鼓吹暴力革命，推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规定凡"加入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国际执委会有权决定它们的路线和政策，对它们发号施令，甚至把它们的领导机构直到整个组织进行改组和解散。"并提出"在各级党组织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

这个铁的纪律适用于各共产党的报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二十一条）》规定："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自主权，执行与党的政策不完全一致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法国共产党的党内新闻传播政策的要求是，"根据严格的原则性观点论述国内或国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事件的每日评论，就应当作为党的声音而不是某人的观点来加以发表……"。共产国际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指示说："……即使在编辑部认为党的负责领导人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犯了错误的情况下，编辑部仍应遵守所通过的决议。"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全苏联实现了共产国际规定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都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的规定，社会上的新闻自由和党内的新闻自由一样都消失了，并迅速演变成为一种高度集权的新闻模式。这个模式的特征是：报纸国家化；报道宣传化，主持政治的与评议政治的高度一体化；新闻不实行法治，而是以党治面目出现的人治。显而易见，这种模式背离了普世价值，同样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共产国际这种铁的纪律，使各共产党的一切指导工作的文件看不到新闻自由的字样，而代之以新闻宣传。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铁的宣传纪律在中国党内完全实现了，它使政治功利进一步成为新闻选择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成了毛泽东强化自己在党内话语权的法宝。

## 新闻自由立场前后矛盾："阶级分析"能自圆其说吗？

"十月革命"前，列宁的新闻思想中出版自由思想占据重要地位。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自由（列宁通常把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这六项公民的自由权利合称为"政治自由"）评价相当高。他说："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足、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比利时"政治自由早就成了公民的财富"等等。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大力赞扬和提倡出版自由，可是"十月革命"后，他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他多次猛烈抨击出版自由，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每天发行数百万份报纸来有系统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列宁还说："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展，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有位学者对列宁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批判性定语进行粗略统计，有假的、虚伪透顶的、资本对报刊奴役的、资本家的、富人的、压制舆论的、收买舆论的、收买报刊的、贿赂报刊的、毒化人民的、麻醉人民的等十几种。

无独有偶。毛泽东与列宁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态度和做法很相似。如本文一开始所谈到的，毛泽东多次称赞美国的民主自由。他还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前

相比判若两人。毛泽东1957年3月对新闻出版界代表说："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毛泽东在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一文所加的批语中写道："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

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在掌握政权前都与普世价值接轨，极力称赞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民主，掌握政权后，只想搞专政，就猛批新闻自由。从赞成新闻自由到反对新闻自由，怎样才能自圆其说呢？办法就是搞阶级分析，区分无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自由，然后来个"兴无灭资"。会用这种手法的还有斯大林等。斯大林用出版印刷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说明苏联有出版自由，即"工人阶级出版自由"。1927年，他接见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的工人代表团时，当有代表提出问题："为什么苏联没有出版自由？"斯大林回答："你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哪一个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很多为工人阶级出版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完全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里。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可是实践证明，只有那些有资格代表工人阶级的掌权者才能自由使用那些"所必需的东西"。没有自由的形式，没有国际新闻学会所规定的自由标准，所谓"阶级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不过是取消自由的遮羞布。

有一种说辞，"无产阶级政权要保护的是大多数人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自由"，被用来为取消自由辩护。此观点乍一听很是冠冕堂皇。实际上，对于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来说，要保护的恰恰是少数人的自由。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见解敏锐而透彻。十月革命胜利时，她在监牢中写了《论俄国革命》一书，在谈到苏联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时候，她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即使无产阶级新闻自由，在实践中也都被置换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组织的新闻自由。在中国，虽然有"全党办报"的动听口号，这本意味着党内有代表性观点有进行交流、讨论的自由，可实际上，这一点根本不存在。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被进一步置换为全党都要宣传党的高层意志甚至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全国报纸每天都以毛泽东的言论作为最高指示反复宣传。所谓多数人的自由最终却成了极少数精英的自由。

但是人们不难看出，从苏联到中国，那些对言论出版自由作阶级分析的说法，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普遍的权利"；也违背苏联和中国的宪法，因为两国宪法都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更是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公民，都有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总之。我们需要的是公民自由，而不是阶级自由。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说法是违宪的。

正是这种既违背宪法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和政策，导致我国新闻媒体在建国后几十年不断为专制主义和错误路线推波助澜，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灾难；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面对腐败日益加剧、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形势，自由度很低的新闻媒介却难有作为，使改革发展大业面临新的困境。

为了说明阶级论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现实，有必要多说几句。阶级本是用来说明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拥有生产资料、剥削他人的是资产阶级；不拥有生产资料、受他人剥削的是无产阶级。阶级论用到言论出版自由这样人人都应有的权利领域，既荒谬也无法操作：是先划分阶级再决定有无言论出版自由吗？那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呢？是根据你所发表的言论后划分阶级吗？这同样涉及一个标准问题，将会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也完全无法操作。所以"阶级自由"历来只是说说而已，只是有权力者独享自由的托词而已。如今由于互联网**（下转第55页）**

# 党在法下：八二宪法的关键原则

○ 黄 钟

八二宪法通过规定各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条文中不再把任何政党作为国家机构等方式，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个关键的宪法原则。党在法下原则的确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巨大进步。

所谓党在法下，就是相对于任何政党，宪法具有无上的权威，任何政党都必须守法，绝没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任何政党违反宪法或法律，都必须担责，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党在法下，重在强调对政党的外部约束，使任何政党都无法凌驾于国家之上，即使政党自我约束不足，不仅有法定的选举等等机制让政党及其成员必须承担其行为引起的政治责任，而且，政党及其成员违反宪法或违反法律，其行为也具有可诉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修改草案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

## 一、党在法下，既是极其重要的政党原则，也是极其郑重的政党承诺

1949年之后，党在法下并非很快就被中共奉为一项政党原则，而是历尽曲折，1980年代初才在党章中得到体现，成为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要的政党原则和极其郑重的政治承诺。

**（一）1949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宪法的关系，从中共党章的角度来看，大致有三种形式：只规定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法律”；党在法上；将党在法下作为原则和承诺**

自五四宪法颁布，至中共十二大闭幕，其间于1956年、1969年、1973年、1977年和1982年通过了五部党章。前三部党章，都是五四宪法颁布之后，七五宪法颁布之前通过的。

八大党章通过时，五四宪法已颁布实施了两年。但该党章没有一处提到“宪法”，自然也没有“遵守宪法”之类的表述，仅规定了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只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法律……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提到中共及其党员与宪法是什么关系。

依八大党章通过时的语境，说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并不等于宣示党在法下。理由大致有四：

一是，说遵守法律，不等于说含有遵守宪法之意。依照五四宪法，宪法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不涵盖“宪法”。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之职权，“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可见，说遵守“国家的法

律”,不等于就说包含遵守宪法。而八大党章,其起草和通过,过程极其严肃,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说法,草案“是经过各地党的组织的讨论和多次修改而成的”,而主导党章修改的中共领袖们,对五四宪法并不陌生。因为33名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中,公开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就有20名,除了饶漱石和高岗外,其余18人均为八大代表,且不是被选为中央委员就是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八大产生的政治局常委,全是当年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而毛泽东更是“宪法草案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都亲自参加了讨论。”因此,八大党章没有提中共和党员要遵守宪法,恐非疏忽所致。

二是,要求党员遵守法律和要求政党遵守法律,要求政党遵守宪法和要求党员遵守宪法,也不是一回事。因为政党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责任及其追究,和党员个人违反宪法或法律的责任及其追究,有关联但不能等同。这就如同一家公司违法,不能只让职员顶责一样。

三是,虽然八大党章称党员有义务“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但是由于国家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制和政治机制,以确保任何中共党员尤其是其领导者违反任何法律都可以追责,因此对于领导者以及执行其指示的一般党员而言,仅仅是一纸弱弱的说法而已。否则,中共中央发动的反右、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就搞不起来。

四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七五宪法颁布,25年里,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的法律,屈指可数,至关重要的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民法典等,都付诸阙如。本来,法律不健全可以努力去健全,可是在反右运动中,完善立法的呼声,也被当作右派谬论打压。比如法学家杨兆龙1957年5月9日在《新闻日报》上发表的《我国重要法典为何迟迟还不颁布》,就成了“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更有甚者,1958年12月20日,党的中央政法小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里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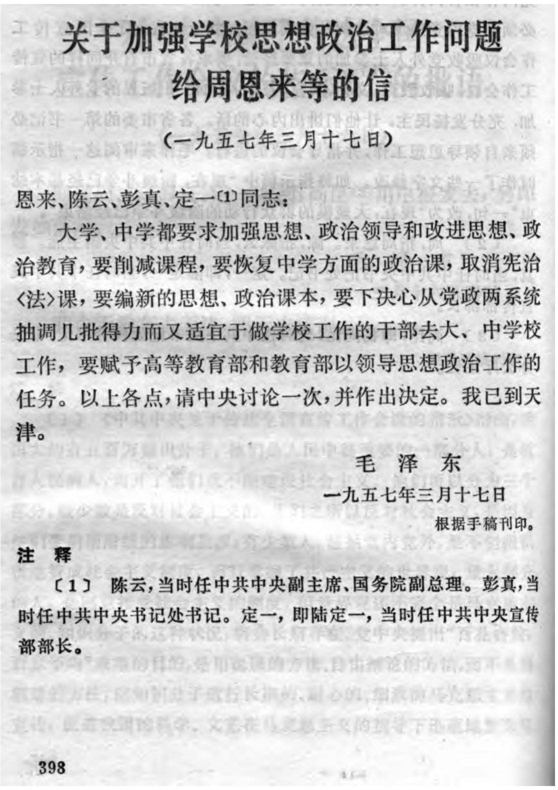
况且中共中央1949年2月就已宣布废除“六法全书”,指示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六法全书为依据,要求在“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作依据”。就连多次引用过“恶法胜于无法”这句法谚的董必武也称,“不要以为新法律尚不完全,旧法律不妨暂时应用”;“若是一切因袭旧的,以为即使反动的法律总比没有法律好,那何必要革命呢?”于是,在旧法已废新法奇缺的现状里,即使真想“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也没多少法律可供遵守。这就为强势的党权乘虚而入,提供了巨大空间。

而从抗战以来,到制定五四宪法,再到八大党章通过之际,中国共产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40年刘少奇还在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及至五四宪法,其序言就已写上了“我国人民……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随着地位的急剧变化,中共守法与否,也就成了影响中国宪政命运的关键因素。

后来人们一说到党在法上的问题,容易想到文革。其实,党在法上,并非文革中才出现的新鲜事。在文革之前,宪法就早已形同虚文,法律缺乏权威。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言论,就直观地反映了这一点。1957年3月1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里说,“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上,刘少奇主张人治,说“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毛泽东则称,“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据刘少奇的外甥女婿蒋碧昆教授回忆,在1959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对他说,“你年纪轻轻搞宪法有点浪费了”。

中共九大和十大通过的党章,只不过是将党在法上这一事实,以一个政党的最权威形式,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这两部党章,连个“法”字都没有,更不用说出现遵守法律或宪法之类的表述了。相反却自我授权党在国上。九大党章要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都必须接受党



**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1]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98

的领导”；十大党章则称：“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而且这两部党章都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中共十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甚至说，“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

这实际上跟人民主权原则相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宪法，不是在第二条就是在第三条里都有同样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随着毛泽东去世后政局的急剧变化，“党在法上”逐渐在弱化，“党在法下”的观念日益明确。即使是1977年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党章，虽然仍自我授权“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及民兵，……都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但也还是提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党员做到”“遵守……国法”。

1979年9月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要带头遵守法律”，而且是“从党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个党员，都必须一体遵行。”这是中共中央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不仅所有中共党员都必须遵守法律，而且中共各级组织也必须遵守法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明确宣布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进步。1982年9月6日，中共十二大又进而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入党章（此后无论党章做何修改，这一点一直未变），同时将“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为党员义务。之前，中共十二大报告就说：“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和八大、十一大党章相比，十二大党章不仅要求党员守法，而且增加了党也必须守法的规定。十二大党章不再像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那样自我授权党在国上。在中共党史上，这是首次以党章的权威形式，确立了“党在法下”这一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做出了“党在法下”这一极其重要的政治承诺。而能否做到，是关乎政党信用的大事。

再看中共之外的八个党派，其现行章程虽然对党在法下这一原则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但都无疑在其总纲里或具体条文中予以确认。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声言自己可以是高踞法上的特权党，允许可以存在凌驾法上的党派成员。换言之，任何形式的党在法上现象的存在，都是与现今各党派的章程，也就是各党派的承诺，背道而驰。

**（二）现今中国各政党，从其章程来看，都表示自己是建立在公民意思自治基础上的民间组织，而非国家机构。这是从政党性质上确认了党在法下**

现实中，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影响力，但从宪法和法律角度来说，它们都是民间组织，而非国家机构。这一点，也为各政党所认可、所宣示。政党的民间性或者说非政府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党由党养。

就中共而言，在1949年之后通过的所有党章里，除了1969年、1973年及1977年通过的三个党章里没有退党自由一说之外，其他各个党章都非常明确，一个中国公民入党或退党，基于个人志愿。

而党费问题，也直观地体现了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区别。所谓党费，"指党员向党组织交纳的用于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的经费"。自1956年以来的历部中共党章，都有党员要"交纳党费"的规定。这种经费筹措方式，是从形式上一直肯定党由党养而非党由税养的政党原则，彰显了党、国有别，表示政党组织不是国家机构，任何政党职位上的党务人员都不能算作国家公职人员。

也正因为政党的这些特点，中共十二大报告中说"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之民间性或者说非政府性的准确描述。

依据中共之外其他党派的现行章程，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党由党养，也是它们宣示的基本原则。这些党派当然和中共一样，也不是权力组织或行政组织、国家机构。

## 二、党在法下，是八二宪法极其重要的原则

党在法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在1949年之后同样经历三十多年的曲折，才成为立宪者的共识、全民的共识，最终在八二宪法中得到体现。如果说各政党章程确立党在法下原则只是一种政党承诺，那么，八二宪法则把党在法下确立为对一切政党的外在约束和强制要求。

**（一）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都未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

《共同纲领》被毛泽东称为"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其序言说，"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可是，至于"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有谁不遵守怎么办，要不要追责，若要追责，追责程序如何启动，等等这些，《共同纲领》并没有规定，并且此后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规范这个问题。因此，"均应共同遵守"，停留在缺乏可操作性的口号层次。

事实上，《共同纲领》的权威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比如，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局上的讲话提纲中，有这么一段：

>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而《共同纲领》不仅序言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而且第一条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第三条称"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

可以说，党在法上的问题，在《共同纲领》有效期间始终存在。在《共同纲领》通过之前，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就已宣布在没有新法律的时候"共产党政策"等同法律。日后也是这么实践的。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之职权。据此，比如规定何为犯罪，处何种刑罚等等问题的刑事法律，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来制定和解释。可是，1950年3月1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不仅规定哪些是"犯罪行为"，而且要求"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等等，实际上是一个政党在颁布刑事法律。同年10月1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不仅在其"特作如下规定"里有"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等表述，而且规定"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10月19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说，公安部门"又是党委的"。次年5月，他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称，"这次镇反运动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指挥下"。这意味着党在国家之上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

及至五四宪法出台，党在法上的形势，并没有得到改观。

1959年4月，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接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五四宪法只规定了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而没有提到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也没有提到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政党遵守宪法和法律，而只是说："宪法是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

毛泽东在五四宪法出台之前曾说过，宪法"是根本大法"。但令人深思的是，1954年分别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的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毛还担任过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可是根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他们在五四宪法通过前后，看不出有谁公开强调过中国共产党要遵守宪法。这种一致的不强调，恐怕也非疏忽大意。

**（二）从七五宪法到七八宪法，"党在法上"成为宪法的核心内容**

和五四宪法的起草委员会不同，起草1970年宪草（七五宪法只是对它略有删改）和1978年宪草的委员会，没有一个非中共党员参与。

1970年中共中央成立的修宪起草委员会，其57名成员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且党内职务最低的一人也是候补中央委员。而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的1978年宪草，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组成的修改宪法委员会起草的"。

五四年宪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党化色彩之浓，以至于把中国共产党也写成了国家机构——这等于是通过宪法对一个政党做出了永久性的执政授权，在中国的所有成文宪法中，这称得上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宪法史上也属罕见。

宪法学家吴家麟1986年在《法学》第12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说：

在制订1954年宪法的时候，对党组织并非国家机关这一点认识还是明确的，因此除了序言部分以外，在宪法本文中没有涉及党的领导问题，这种做法是恰当的。可是在1975年宪法中，这类条文到处都是，例如，宪法竟然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等等。按照这些规定，党不就成了国家权力机关了吗？而且还是凌驾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的"太上机关"哩，大概该称之为"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吧！

七五宪法总共30条，有6条提到"中国共产党"；序言总共8段，有4段提到"中国共产党"。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第十五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十六条）

七八宪法总共60条，有4条提到"中国共产党"，序言总共8段，有3段提到"中国共产党"。比如，"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第十九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第二十二条）；"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十六条）。

可以说，无论是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无

法从中看出制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机制和程序在哪里。而张春桥1975年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所说的那种“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正是使党免受制约。

**（三）八二宪法将党在法下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

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改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9月15日,宣布宪法修改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次的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不再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

在此前后,如何看待中共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已为朝野共同关注。如果说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包括“党中央委员会”必须遵行法律,这还只是从政党自身角度提出要自我约束,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等人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前后的言论,以及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就已经是在从立法层面进行探讨了。

一是提出了党员在法下。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里说,“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权”,并且指出要“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篡夺……国家权力的漏洞”。这个结论,既是为了换取和提升执政的合法性,也是基于毛泽东在军队、政府、法院、检察院这些国家机构中均未担任任何公职,且仅为自1965年1月之后再也没有举行过会议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他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却可以动用国家权力置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刘少奇于死地等等历史教训。

二是提出了党也在法下。1980年4月18日,彭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有人问:是法大,还是哪级党委大,哪个党委书记大?当然是法大。不论哪级党委,更不论哪个负责人,如果他的意见与法律不一致,那是他个人的意见。谁都得服从法律。

三是提出了党、国有别。

1981年3月7日,彭真说:党的意见经过最高权力机关审议通过,变为国家的法律、决定;否则,只是党的主张。

随后,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张友渔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也发表文章说: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法大,还是党委大?”我认为答案应当是:“法大。”我们国家的法是代表人民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各级党委以至党中央也不能不守法,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果发现法律需要修改,应当把党的具体意见,以至草拟方案,建议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它的常委会进行修改,而不能不经过合法程序,任意将它弃置不顾。

在1982年第3期《青海社会科学》上,张友渔又发表文章,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宪草中中共与宪法的关系: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写了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党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务院总理由党中央建议提名。特别是1975年宪法有一条,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现在修改宪法把以上的条款修改了,……

在文章中,他说宪草避免了把党写成一个国家机构的毛病:

在修改宪法时,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参照1954年宪法的作法,把党的领导写进序言中;也有的提出,可以在条文中规定党的领导,同时规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实行党的领导。修改草案采用了前一种形式,把党的领导写进序言中,而不是写在具体条文里,这样做,可以避免把党写成一个国家机构,避免前两个宪法出现过的毛病。1975年宪法把党放在国家机构中写,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又规定是在党的领导下,党就成了最高的“最高”了。这显然是不对的。

对于宪草中的军事条款,张友渔说也是针对过去的党政不分:

修改草案还在《国家机构》一章中增写了《第四节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这些规定,既改变了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这样党政

不分的情况……

制宪者已经意识到了，宪法权威的维护，关键在于要党在法下。1982年9月，彭真在同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谈话，在谈及有人说宪法规定得挺好，就怕将来不能执行的问题时说：

> 提这个问题的不少，可以在宪法修改草案说明里讲。“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大家有警惕性是好的，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消极的东西，已经开始引出积极的成果。宪法草案的总纲、序言写了各党派、团体都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四是提出了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必须追究。曾担任过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的王汉斌回忆称：

> 从11月27日下午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分团审议宪法修改草案。……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代表提出，光讲宪法必须遵守还不行，还得写上“对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我们研究认为，写上这一条好是好，就怕做不到。怎么办？经请示彭真同志，他说：还是应当写上。……经过研究，在宪法第五条中增加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制宪者们为确立党在法下原则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该原则体现在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宪法之中。八二宪法没有一条条文中出现过“中国共产党”，亦即明确了党、国有别，任何政党都不是国家机构，“党的领导”和“执政”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明确了“党的领导”，但也否定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那种永久性执政授权的做法。依照八二宪法，执政地位的获得，须不断地通过法定程序来一届届地予以确认。这一点，是党在法下原则的极为紧要之处，也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贯彻。

与1954年宪法只是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第十八条）不同，八二宪法不仅在“总纲”中的第五条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且在序言最后一段也特别强调：“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些表述，不仅确立党在法下原则，而且还将护宪规定为一项政党义务，一项不容推卸的职责。

不过，明晰和落实这一原则的相关制度缺失甚多，比如，要追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起码需要：一是离不开在机制上确保政党及其成员的行为具有可诉性，且司法必须独立于政党以保障司法公正；二是明确政党的法人身份，建立和完善政党法律制度，以使政党活动有法可循；三是离不开选举制度、人大代表大会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以期在制度上能够追究政党及其成员违反宪法或法律的政治责任；四是离不开言论出版自由的保障，以期政党及其成员的行为，避不开“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及其悠悠众口。

尽管如此，应该看到确立党在法下这一宪法原则本身，就已经是为中国宪政的发展奠定了一块良好的基石。这块基石的奠立，从其过程来看，是中国共产党的共识，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共识，是全民讨论后的共识，也是三千余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共识——因为表决通过八二宪法时，发出的3040张表决票里，只有3张弃权票，无一人投反对票。

当然，确立党在法下的宪法原则是一回事，把这个原则落到实处，又是一回事。而能不能真正落实党在法下原则，是能不能实现宪政民主、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因为若没有党在法下，就不会有宪政民主，就不会有法治，就难以提升执政合法性。■

（责任编辑 吴 思）

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网上购书 方便快捷

网址：http://yh100.taobao.com

本刊唯一授权网上书店

联系人：关小姐 淘宝旺旺：zssy8888

#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

○ 沈志华

关于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是一个热门题目。对此，中国学术界和中共党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二十余年内中国激进和极端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离，同时又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注1]这种理解，大致说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中共的激进和极端政策埋下了伏笔？这个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注2]本文选择其中一个虽然不大却很重要的方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及当时风靡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考察，希望为寻找答案做些努力。

## 毛泽东本人提出和赞同的建议

中共八大期间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会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注3]然而，在中共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注4]此外，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所有的大会代表在发言时也不约而同地都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学习中共八大文件时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新党章为什么未提“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没有讲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现在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反对个人崇拜？[注5]国外研究者也因此对毛泽东的地位做出了种种猜测。他们认为，新党章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集体领导，这“进一步证实毛大权旁落”。“对毛泽东威信的真正打击是从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他们还猜测，“刘少奇可能的确试图减少毛泽东的作用”，甚至断定“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从新党章中删去的提议，最初来自彭德怀”。[注6]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判断和推测。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而且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泽东多次将送他审阅的文件中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或改为别的说法。[注7]从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献和史料看，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其过程也是清楚的。

自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在中共党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最早讲到这个问题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1948年11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提出在教员和学员中，“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给吴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注8]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

图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全国政协礼堂外景。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注9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注10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被删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泽东亲笔删改的。注11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报送的内务条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8月14日,毛泽东又将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的电报稿中“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注12

这样,由于毛泽东本人一再反对,中共中央终于做出了正式决定并通知全党。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通知》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稿时加了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注13这个《通知》的精神并没有限定在党内传达,12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向与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注14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那时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有明确指示,并在中共八大前已广泛告知党内外(只是没有传达到基层)。所以,在研究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时,追究起草文件时是否专门做过决定,是否有人建议或者是谁“最初提议”的,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莫说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史料,即使存在这样的决定和建议,相信其内容也不外如此。既然党内高层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发过通知,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且一再强调不能提“毛泽东思想”?这是否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毛泽东和中共早在赫鲁晓夫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之前就有了这种主张和想法?

## 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

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

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注[15]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顾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苏共的态度及其对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影响。

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10月会议决定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教门。斯大林决心与铁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张和在巴尔干独立门户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此同时，针对东欧各党“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和主张，斯大林在共产党情报局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围剿“狭隘民族主义”的斗争。注[16]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当时，国共之间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经开始，中共绝对需要苏联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据苏共中央联络部观察，从1947年9月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后，中共就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的好感，并广泛地利用会议材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斗争。注[17]所以，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对南共和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南共的决议，指出：铁托集团由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基本观点，因而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11月1日，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切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压迫下争求解放和保卫民族独立，取得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援助，乃是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注[18]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提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降温的，其目的和考虑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压力本来可以也应该解除，但他为什么仍然坚持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其原因还在于苏联——苏共此时开始的反对个人崇拜的举动及其在中国党内的影响。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报刊就开始从理论上谈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提到个人崇拜问题。在1953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贝利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注[19]接着发生了“贝利亚事件”，苏共中央为此做出的7月决议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在“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中，“走上了一条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注[20]苏共中央还特意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注[21]

此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传到国内。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使馆向中宣部报送了两个材料，介绍了苏联报刊和宣传中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3、4期刊载了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张闻天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一份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在京有关人员。注[22]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这年12月中宣部发出的那个关于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不能说与这些背景没有直接关系。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更加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投票

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注23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注24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注25一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东欧各党紧跟苏联自不待言，连法共和意共都赞成批判个人崇拜的现象。注26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则在7月10日发表社论，欢迎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注27甚至朝鲜也逐渐减少了个人崇拜式的宣传，最先改变的是取消了“金日成万岁”这个口号。注28在这样的氛围下，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高层领导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在中共八大和有关文件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乃为客观形势所迫，而非主观愿望。

## 中共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

如此看来，中共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能说明毛泽东本人和中共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表述有任何怀疑，所谓毛泽东地位下降的推测更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从毛泽东历次谈到这个问题时的说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而并非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国后，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这使毛泽东在党内外的威望和影响空前提升。人们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没有人会怀疑其领导的正确，更不用说会有谁对毛的地位提出挑战。

从中共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这个关乎共产党发展大计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各国共产党通行的口号，中共当然不会公开提出异议。然而，中共八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中共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报告也只是从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个人崇拜问题。尽管在制度层面做出了一些加强集体领导的规定，但中共并不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邓小平在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

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注29

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并间接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

当然，中共八大关于中共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个人崇拜现象从延安整风时就已经开始了。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授予了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权力，神化了毛泽东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会上，不只是刘少奇，包括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对毛泽东都是一片颂扬、崇拜的言词。延安整风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迅速传遍延安，《东方红》也是这时传播开来的。注30

不过，关键的问题还是毛泽东本人的态度。从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苏共批判个人崇拜的心情是双重的——既高兴又担心。毛泽东高兴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正如他后来对苏联大使尤金讲的：“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注31毛泽东担心的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和取消个人崇拜的做法将导致中共党内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蛇无头不行”的混乱局面，所以他才认为赫鲁晓夫“捅了篓子”。毛泽东并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突然冒出的一句话，绝非偶然：“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注32后来又说，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指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注33中共八大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

看来，毛泽东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对中共领袖的崇拜，欢迎的是苏联党批判个人崇拜，而不是中国党也批判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论的基础上，中共八大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的制度规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斯大林的错误为什么会发生和发展？潜在的问题更在于，各国党会不会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事实上，自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就力图对此做出回答。中共八大还试图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实行集体领导，发展党内民主，中共八

**图为参加中共八大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大会主席台上**

大除提倡重大问题和选举都必须经过会议或集体讨论，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外，还在制度上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实行党的全国和省、县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相应地取消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目的是保证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能够定期召集并充分发挥作用。邓小平承认，从中共七大以后，11年不开党代表大会，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党章规定的。注34“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虽然这些年份里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缺憾”。邓小平对这项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认为这是“一项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注35

然而，毛泽东经常讲，民主从来都是相对的，而且只是一种手段。因此，中共八大所说的民主，指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这里，民主与集中始终是一对矛盾，长期来看，其内在逻辑总是趋向于集中制。只有当“过分的”集中制严重地损害了党组织的活力时，党内民主问题才会被提出来，而发展党内民主最终还是为了更好的集中。邓小平说：“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注36刘少奇说得更明白：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决不是减弱而恰恰是加强了“党的集中制”。注37这就难怪中共八大结束以后，除1958年召开过一次八大二次会议外，常任制就再没有真正实行过，而中共九大直到13年后才召开，其拖延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八大。

中共八大确有许多非凡之举，就改造共产党自身而言，在许多方面的主张和动议，甚至超过了苏共二十大，比如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发展方针的调整、对经济体制改进的设想、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等等。所以，这次会议能够鼓舞人心，激发全党的热情和干劲，使国人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局限，中共领导人没有、也很难认识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没有、也很难对师承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代革命家，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的中国社会精英，他们并非没有改造中国的雄心和能力，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转变。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但最终只能用老办法去解决。1956年对于苏联、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确实抓住了历史主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这个历史主题，因此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会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中共八大刚刚开过一个月，暴风雨就来了——在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紧接着是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反右派”运动。就本文提出的问题而言，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并非出于抵制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最明确地表达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这是个别人，大多数人不赞成。这也是独创精神。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是崇拜真理，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对不正确的部分也赞成，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注38

惟其如此，才使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逐步升温，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本文注释：**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

○ 胡学常

## 一

上海,延安,北京。蓝苹,江青,李进。山转水移,时空变换,江青总能在自己的名字上弄出新的花样。

“李进”最早与世人见面,是在1951年。是年6月,为了深入揭批电影《武训传》,江青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武训家乡山东堂邑、临清等地调查武训历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调查团撰就《武训历史调查记》,连载于1951年7月底的《人民日报》。此长篇“调查记”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前言”里列举了调查团的13名成员,“李进”赫然在目,且注明来自“中央文化部”。“前言”还特别提到三位撰稿人,“李进”也名列其中。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新选入的诗词里有一首七绝,竟然是伟大领袖献给“李进同志”的,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云: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几乎与《毛主席诗词》面世同时,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也刊载了这首“题照诗”。稍后,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无限风光在险峰”——读毛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郭文同一版上,还刊出了“庐山仙人洞”照,署名“李进摄”。看来,这个“李进”是颇有来头了。

一般读者只知“李进”非同小可,不会知晓“李进”究竟是何许人。高层是知晓的,少数高层,再次见了“李进”,甚至能琢磨出隐藏其间的政治意味,同时不免忧愁幽思乃至不寒而栗。

“文革”期间,江青自称是文教方面“一个流动的哨兵”(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名“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此是文雅的说法,如粗俗一点,便是她日后接受审判时气急败坏所言,乃是“他(毛)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见特里尔《江青正传》,第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毛短期间让李进高调亮相,实是廓清了迷雾,揭去了伪装,使江青能够正大光明地现身前台。自此以降,李进大可借着毛的雄风,勇往直前。江青在咬人之时,或是在争做娜拉,实现其革命理想;或是在报仇雪恨,一舒郁积;或是在追逐名利,满足贪欲。总之,这个女人压抑太久,积聚了太多的欲望和能量,就待毛泽东发话了。

而毛泽东呢,面临相当孤立的政治危局,几乎不能相信任何人,除了自己的亲人。眼下,亲人里,太子未立而亡,另一个儿子,早已疯掉。毛对此很是耿耿在怀,在倒彭的庐山会议上,毛言及古语“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然后恨恨引申道:“我无后乎! 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出版单位不具)唯一可用的亲人,只有自己的老婆了。江青虽有些毛病,但她政治上很强,敏锐,坚定,还擅长点革命之火,有一股敢打敢拼的精神。关键时刻放出去,会收到出奇制胜之奇功。昔日,毛唯恐江青出头,曾阴诫胡乔木,“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现今却不同了,毛明确告诉周扬,“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册,第26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一些高层,其实已经窥破毛的用心。但制度如此,毛复如此,面对毛江“夫妻店”的强势,他们又能有何作为? 几乎是无计可施,他们多数至多只能装聋作哑,做一点“软顶”的勾当。刘少奇似乎做得多一些,比如,在“文革”前夜,他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威望,似有些与毛分庭抗礼的气概;他甚至也放出了自己的老婆,仿佛是要与毛的老婆一决高低。那些

日子，两个主席及其夫人，彼此之间在搞大竞赛，直看得国人眼花缭乱，复莫名其妙。

## 二

毛是信服“诗言志”的，他还特地挥毫书写过此三个大字。毛之“志”乃政治之“志”，故而毛诗差不多全是政治诗。有时，即使是情诗，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也要捎上一句“忽报人间曾伏虎”，平添些许政治意味。只有另一首情诗《贺新郎·别友》，作于人生的恋爱季节，与政治无关，算是较为纯粹的情诗。从已经公示的毛诗看来，毛写给江青的仅有这首“题照诗”。而“题照诗”，全无男女之情可言，有的只是革命之情，政治斗争场上的战友之情。

毛泽东为李进（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诗（1961年9月9日）

惟其是政治诗，“题照诗”不欲以情动人，亦不求唐人之神韵，而是偏重革命思理之阐发，大类宋人作风。“题照诗”要在“题照”，而“照”乃人所摄之“照”，故而诗的落脚点在人不在物，亦即在摄照的主人，而不在庐山仙人洞本身。郭沫若解此诗时，曾出于考古学家的癖好，多方考证仙人洞，不仅考出其方位、形貌和景物构成，还考得“仙人”之来历。考证完了，郭氏不得不承认：“主席的诗，和所谓仙人洞本身，看来并没有多么大的直接关联。主席是在为‘庐山仙人洞照’题诗，而不是为仙人洞题诗。”（郭沫若《“无限风光在险峰”——读毛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人民日报》1964年4月11日）郭氏又找了摄照的“李进”，“李进”送了一张“仙人洞”照片，他这才读懂了“题照诗”。

“李进”的“仙人洞”照，摄得很见功力。照片名曰“仙人洞照”，却不见仙人洞，显得别具匠心。景框中部是远景，大片云海在曲折翻滚，白色的云海之中，点缀着几团黑色的稠云。上部是近景，几许苍劲的松枝雄踞空中。下部林木葱茏，险峰挺立，大约是仙人洞近处的险峰，也是近景。“李进”是一个全面政治化的激进角色，她摄制此照，在构思取景上，似早有政治化的考量。景物不是景物，是政治象征，此富于中国特色的艺术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至于屈原，业已精致化、定型化，所谓“香草美人”即是。毛的革命文艺，接上了这个传统，而且还有一番创造性的转化。像这首“题照诗”，七言四句，通篇都是政治的隐喻，革命的象征。“暮色苍茫”，“乱云飞渡”，一看即知，了无余味，不外是象征压抑革命、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势力。而“劲松”，不外是象征一种劲挺不拔的革命精神或革命者形象。革命者保持革命的气节，任反革命如何嚣张，依然从容面对，巍然挺立。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两种势力在交战，两种精神在较量。至于后两句，换成革命话语，即是说光明在前，胜利在望，革命终会战胜反革命，革命者必能不畏艰险，攀上革命的顶峰。

毛时代一如古时候，“文字狱”盛行，从学理的角度言之，许多时候便是有中国特色的象征传统在发生作用。尤其是那些写景文字，一景一象征，景景皆象征，不以作者的意图为转移，全看接受者如何解读象征。可怕的是，那象征传统，又似乎是一个接受美学的“开放结构”，可正面解读，亦可反面解读，居然都能自圆其说。反右时期，流沙河《草木篇》的遭遇，即是一个明证。按照象征传统，毛的“题照诗”，还可深入挖掘其象征意义。自然，这需要联系一下当时的政治局势。比如，“文革”中的流行解读，一般要联系1961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诸如“国际上帝、修、反势力，反共反华反人民的气焰十分嚣张”，诸如“国民经济发生暂时的困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趁机和国外的反革命势力相呼应，赤膊上阵攻击总路线”。“暮色苍茫”，“乱云飞渡”，象征的正是此种阶级斗争的严峻局势。而“劲松”的形象，“就是在内外敌人反革命围攻面前巍然屹立的伟大中国共产党，以及她所领导的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也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的形象”。还有，“劲松”也可

以象征革命领袖："不难从劲松这个亲切形象中，看到伟大舵手毛主席在惊涛骇浪中为我们掌舵的雄伟英姿，看到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和许多坚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总理、江青同志等）的高大身影。"（《毛泽东诗词笺释》，第254-258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飞雪迎春》战斗组编，1968）

"文革"流行的这种解读，固然有深文周纳之嫌，却也不能算是太过离谱，毋宁说它在尘埃落定之后，点破了此前毛只可象征未能明言的政治含义。那"暮色苍茫"和"乱云飞渡"，便解读得十分到位。只是那作为正面形象的"劲松"，解读得有些泛泛，可称作是"过度阐释"了。推测毛的本意，"劲松"可象征他的党、人民和解放军，更可象征他自己，最为要紧的，它必须象征"李进同志"。事实上，江青一直认为"题照诗"是献给她的，她就是毛笔下的"劲松"。往后的日子，江青毫不扭捏地领受了"劲松"这个革命封号，还制作了许多"仙人洞"照，广为散发。遇到重要人物，江青还要模仿"毛体字"，将毛诗抄写在照片背后。1972年，来自美国的维特克访问江青时，就收到过这样一份"珍贵礼物"。

那个时期的"革命人民"，也都认为江青就是毛的"劲松"。一本"文革"间红卫兵组织制作的小册子，收录江青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它的书名就叫作"无限风光在险峰"，插页印有毛手书的"题照诗"，也印有江青的"仙人洞"照。（《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南开大学卫东编印，1968）天津的小靳庄是江青树立的"样板"，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那里编写了话剧《红松堡》。该剧以小靳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背景，将年轻的女支部书记宋金秀塑造成"造反英雄"，而将县委书记刘达这位老干部描画成"走资派"、"还乡团"的典型。又是"红色劲松"的象征，又是女的"造反英雄"，这让人时刻联想到江青，而小靳庄作为江青的"点"，自然成了"红色劲松的堡垒"。（《红松堡》见《鼓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三个毒草作品》，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印，1977）

## 三

"题照诗"早就不声不响写好了，时在1961年9月9日，离它公开发表尚有两年有余。当时，毛正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精神，乃是延续年初中央确定的调整政策，实质即是继续纠"左"。中共历史上曾有三次庐山会议。1959年那一次，先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尔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反"左"转入"倒彭"、"反右倾"，因而成为党史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会议。第三次庐山会议，1970年举行，实际上是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林冲突，而以暂时抛出陈伯达作结，实是"文革"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亦为人所津津乐道。唯独1961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大约只是一次一般性的工作会议，不仅一般人不知晓，便是研究者也罕有深论。而细察此会，可不容小看。单看毛诗兴大发而为江青题照，就十分不简单。

那个时候，毛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大跃进已告失败，大饥荒正在蔓延开来。如刘少奇稍后所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不仅如此，从中共的历史经验看来，举凡发生重大失误，主事者是要被人赶下台的。毛自然懂得这些，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后退，从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到3月的广州会议，再到5月的北京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调整措施。现在，到了1961年8、9月间，一路退下来，毛对形势的判断是退够了，而且在后退中，一些调整措施已然发生作用，情况在逐步好转。还在上山之前，毛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所以，庐山会议时的毛，直感觉自己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看似悲观，实则是光明无限。此次会议，再次选择庐山开会，似乎暗含走出1959年庐山阴影的考量，仿佛是"从哪里跌倒，又要在哪里爬起来"。这反映了毛倔强的个性，亦表明了毛对形势的乐观态度。

会议于8月23日开幕。果然，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就经济形势发表了乐观的看法。他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同上，第1169页）常委其他几位，并非全都认同毛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像刘少奇刚从湖南老家调查回来，他看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严酷事实，此时大约不会认为已经退够了，更不会乐观起来，看一看他

稍后在“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上的讲话，就非常清楚了。

看来，这个会议开得并不如毛想象的那样“心情舒畅”。尤其是几位常委，毛明显感到他们信心不足。周恩来发言时，毛当即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支中《“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载叶匡政编《大往事》，第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9月16日，大会闭幕当天，毛挥毫疾书，写下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四句，以赠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5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文稿”中“庐山党委”作“庐山常委”，误，有毛手迹为证）李白诗境界弘阔，气象洒脱，吟诵之下，足可消愁破闷，开阔心胸。毛书诗言志，传达的正是一种“有什么了不得”的心境。

大会开了20多天，而毛在山上呆了两个月。他下榻的别墅，除了原有的“美庐”，还有专为他赶建的“芦林一号”。毛晚上住“美庐”，白天则在“芦林一号”活动。享受着庐山的湖光山色，毛读书，思考，也游泳，跳舞，还有就是写字。毛确实心情舒畅，因而书兴大发，集中写了许多字，据说字也写得尤其见功夫，“代表了毛泽东书法艺术上的一个辉煌岁月”（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第26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江青也上山了。她不得同毛住在一起，只能别住一处。她精通摄影术，喜欢摄影，尤其喜欢拍摄艺术化的寓意深刻的照片。那两个月，毛兴致好，江青便带了毛，找寻别具一格的景致，大摄其影。毛倒是特别配合，任凭江青摆弄，留下了不少仪态万方的艺术照。

## 四

可是，江青那著名的“仙人洞”照，并不是此次庐山上所摄，它摄制于1959年的首次庐山会议。众所周知，那次庐山会议，起初与会者也是心情舒畅，说是要开成一个“神仙会”。毛也是情绪好，甚至忙里偷闲，接贺子珍上庐山，进行了一次旧情重叙的秘密会见。江青此时并不在庐山，她也不是像小道所传那样，听闻贺氏上山，遂醋意大发，不顾一切上了山。江青正在北戴河，忽上庐山，据她自己透露，实是毛的旨意。风云突变，“神仙会”变作了“倒彭会”，毛给了江青一封短信，说自己正在庐山倒彭，还附了回击彭德怀的草稿。江青急忙回电，表示即刻飞赴庐山。（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第303页，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江青就这样上了庐山。其实，庐山上紧张的政治斗争并不怎么需要她，像往常一样，江青陶醉于摄影艺术的美妙里，“仙人洞”照便是此间艺术活动的代表作。

有了“仙人洞”照，还不能即刻获得毛的“题照诗”。1959年，尽管“大跃进”败象已露，毛却很不以为然，他仍然是坚守一贯之道，左右开弓，有左反左，逢右反右，根本无力省思“总路线”之“左”的实质。庐山倒彭，固然紧张，却也不过是一时的紧张，局部的紧张，远不到离开了江青无以运作的地步，更不需要江青秉承旨意而冲锋陷阵。1959年，毋宁说毛仍是比较讨厌江青的。那年3月，毛在武汉，正在观察和思考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准备4月上旬在上海举行中央全会。江青也在武汉，毛觉得她碍手碍脚，干扰了工作，不想让她同去上海，遂委托秘书林克，说服江青改去杭州。（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第99—1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960年，借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好形势，毛意气风发，“继续跃进”。败象固然暴露无遗，但毛在危机中静观事态发展，谋划走出危机的对策，只是毕竟未到反击的时候，也就不必放江青出头。

这样，江青怀揣“仙人洞”照，必须要等到1961年9月，才能等来毛的“题照诗”。此时，毛既已认定自己不能再作妥协了，也就是说退到了谷底，不能再退了，那么，他接下来的动作，便是准备反击。而江青，作为他反击的炮手，该是给她自由，放她出头的时候了。也正是此间，毛似是有心调整与江青的关系，他已是做足了姿态，和江青登庐山，望长江，流连山水之间，还甘愿做道具，让江青调来遣去。这样一幅琴瑟和谐的图景，近十余年来，确乎难得一见。

从9月的庐山下来，天气转冷，毛的心头却是愈益发热。苏联的“修正主义”正愈演愈烈，党内亦不时传来不合时宜的杂音异调，政治空气应

和着自然天气，真乃“寒气逼人”。毛惯于从深渊看见天光，饥荒尚未息止，可他看见的或愿意相信的却是这样的图景：“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这一首连同其他几首喜吟“大丰收”的诗，刊于1961年12月28日的《光明日报》副刊，毛见到后，极感振奋，认定这几首近乎“打油”的诗确真是“好诗”，并且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18-619页)压抑和忿恨锻造斗志，亦能激发诗情，毛在庐山上已然焕发的诗情，进入1961年的秋冬季节，更呈汹涌喷薄之势。其间，毛或自作诗，或题诗、引诗、谈诗，约达七次之多。(见《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毛诗中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豪情与斗志的著名篇什，诸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和《七律·答友人》，均产自这短暂的几个月。

毛诗情弥漫、斗志昂扬之际，江青也按照毛的旨意在行动。1961年11月19日，毛精选了一批材料，一一批注“江青阅”，末了，还不忘写下夹杂私情的批语，曰：“一批材料，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03页)毛此举乃是富于政治意味的大动作，不仅是因为此前毛向江青直接批示材料十分罕见，而自此以往才逐渐多起来，更重要的是，作为毛的秘书，江青所司主要在国际方面，而此次毛批示的五种材料，国际方面仅见一种，其他四种均是国内材料。如是看来，政治气候在变化，毛江关系在升温，“娜拉”不再是“玩偶”，她终于获得了大好机会，开始“破门而出”。

江青曾坦白地告诉维特克，“文革”的前奏，始于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至1966年发生的北京京剧汇演事件，多篇有关海瑞文章发表都为文革爆发做了前期铺垫和准备”(《江青同志》，第298页)。江青还说：“调查早在1961年就开始了，到1963年就采取行动开始进攻。”(同上，第299页)江青提到了四个年份：1966，1963，1962，1961。如果说1966年是总反攻，那么，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是总反攻的“前奏”。而1962年和1966年之间的1963年，则是开始转入明目张胆的反攻；不过，相对于总反攻而言，是规模较小的局部反攻。八届十中全会也并非横空出世，它也需要酝酿和准备，那么，此前的一整年，即1961年9月至1962年9月，乃是“前奏的前奏”。也就是说，从1961年9月开始，毛已着手酝酿反击。1961年9月，毛“献诗”庐山；1963年12月，“献诗”公开面世。这两个重要的时点，前者开始酝酿反击，后者开始局部反攻。诗与政治进攻之间，竟有如此奇妙的一一对应关系。江青的“夫子自道”，正吻合上文关于毛庐山“献诗”的分析。■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杜明明)

---

(上接第37页)的高速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人人是记者、评论员的时代，个人网站越来越多。像“人民监督网”这样由一个人办的网站，多年来揭露了各种腐败，甚至几天之内揭露了重庆的多名淫官、贪官，受到人民的欢迎。可是，这个网站经常被封。那么这个网站行使的是无产阶级自由还是资产阶级自由？多次封这个网站的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阶级论者可能也很难回答吧。可见，无产阶级自由论在今天显得更加捉襟见肘。抛弃阶级自由论，坚持公民自由论，同时依法治国、依法治网，合法则保护，不合法则予以相应的处置。这样，从理论到实践都很顺当，既有科学性又有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民主的形式、自由的形式，在不同的现代国家本来都是大同小异。可是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在掌握政权后，硬是要划分成不同阶级的民主、自由。这样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就占了大便宜，因为把“代表大多数人”的旗号抢到了手里，就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然后就可以把那些根本算不上民主、自由的形式和做法命名为“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自由”。这就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人民明明没享受到应有的民主、自由，在理论上却很难说清、也没地方去说清的原因。但历史证明，那种哄骗不能维持到永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原所长，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

○ 马龙闪

已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旧事重提，从2011年9月21日到2012年4月下旬，在9个月的时间内，《中华读书报》连续用4个半整版的篇幅，先后刊载了王学典与李希凡两位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的三篇长篇争论文章，后来，徐庆全先生又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对王学典的论据作了若干补充，进一步证明，被《文艺报》“置之不理”的信为乌有。笔者以为，这几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已基本廓清了事实，证明这次争论是有益的：从这次大批判运动“缘起”的一个重要细节——“被置之不理”的信之有无，做微观考察着手，把运动“缘起”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笔者作为一位苏联意识形态斗争史的研究者，没有专门深入《〈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的深层细节，原本是没有资格对这一问题发言的，但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斗争问题的关注者，置身《〈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研究之外，也处在目前《〈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争论旁观者的地位，来观察一下这一事件，遥望一下这巍巍“庐山”，或许能望见、窥破一些“此山”的真容实貌。

## 并非“题外”的题外话

提起《〈红楼梦〉研究》大批判，使我想起了1986年春夏，在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直接指示下，中宣部理论局组织了两个研究课题，一个是我国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研究；一个是苏联意识形态批判重大事件考察。这两个课题，分别由国内问题和苏联问题两个小组承担，总的精神是，分别从苏联和中国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斗争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笔者当时被推荐参加了苏联问题小组，承担的题目是，苏联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大转变”。稿子很快出来后，《光明日报》当时急于配合这一中心，被主持“理论版”的编辑马上拿了去，很快一连打出了两次清样。从当时理论版主任抓紧同笔者研究、修改，紧锣密鼓的样子，看来文章将会马上见报。但此后过了多天，就没了下文。后来传出消息：形势有变。这样，我们这个苏联问题小组就被叫停了。至于国内问题小组的进度如何，不得而知。

我本人此后就到苏联进修去了，没有再了解此事。但我将有关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这些课题带到了苏联，就此收集了不少资料，这就为我后来写成的两本专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96）、《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2004）和有关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组文章提供了资料基础，也走上了苏联意识形态斗争史的研究道路。

对于苏联和中国所进行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斗争，以及苏联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我深感胡耀邦同志高瞻远瞩，思想敏锐而深邃。新中国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思想理论批判和政治运动，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是一脉相承的。耀邦同志当时虽然不可能一一了解其中的具体细节，但以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视野和敏锐洞察力，看到了从苏联到中国这条意识形态斗争线索之不可分割、密切相关的联系。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档案材料还没有解密，鉴于我国当时的发展阶段，有些问题那时还不便展开论说，然而，从他提出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斗争课题，就说明了许许多多问题。

现在，我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苏联问题已经大白于天下。人们明白了：苏联自上世纪20年代末放弃新经济政策，实行意识形态“大转变”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从批判德波林学派起，一直到战后的文艺批判、《西欧哲学史》批判、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批判等等，包含了

从文学艺术到社会科学，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甚至技术科学，几乎无所不包地、面面俱到地进行了各种大批判运动。每次批判的结局，几乎都是对有关刊物和学术机构的改组，对被批判者的行政处理，轻者撤职，重者抓捕。批判的极端性，甚至到了连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有机化学都遭否定的地步。这造成了苏共思想理论的严重僵化和苏联学术文化的停滞不前。在思想理论僵化到登峰造极，批判斗争达到最高潮之时，恰逢战后初期，即1946—1952年期间，这正是我们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向苏联“取经”之时。在50年代，我们又全面学习苏联，包括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方面面。为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方面取得苏联援助，在斯大林的亲自推荐下，毛泽东1950年访苏时亲自邀请尤金到中国来，担任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定稿人，实际上也充任毛泽东的理论问题和意识形态顾问。尤金以此身份曾两次到中国来，第一次是1950年7月到1951年1月，第二次是1951年7月至同年10月。在这期间，毛泽东把尤金当作理论顾问和私人客人，两人互相登门拜访，“关系日益密切”，成为可信任的朋友。据有关资料介绍，主席有什么想法，甚至首先同尤金谈，两人尤其就一些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畅谈甚欢。尤金作为毛泽东私人顾问回国两年后，又以苏联驻华大使身份来到北京，一直从1953年履职到1959年期满。在此期间，毛与尤金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

人民日报

毛主席语录

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他們自己写成神圣，所謂光明和黑……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颂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众……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尤金是何许人物，其根底如何？了解这一点，对我们了解有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的缘起，可以说不无关联。尤金原是一位哲学家，40年代升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以学者身份跻身社会政治活动，不仅在苏联人文社会科学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社会政治以至外交领域滚爬数十年。他之在苏联发迹，源于1930年在批判德波林运动中首先向德波林发难，成为一夜走红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当时，他尚是在红色教授学院就读的一名学员，同刚刚从该校毕业的另一位“小人物”米丁，两人合作撰文，在《真理报》编辑部，实际是斯大林的支持下，向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最高领导人”、著名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德波林，发起批判。他们认为，德波林没有“把哲学问题‘政治化’、‘现实化’”，同“现在所面临的迫切政治问题”，即反对布哈林的斗争“脱节”（张念丰、郭燕顺：《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198页。），因而其行为具有“反党性质”（同上，第99页）。一篇文章天下知，顷刻之间，闻名全苏联。自从靠批判德波林起家成名后，在30—40年代，他与米丁立即从“两个小人物”，摇身变为了不起的大权威，利用在苏联哲学界的“斗士”地位，插手文艺批判、史学批判、语言学批判，甚至还涉足生物遗传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批判，成了苏联学界斯大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尤金以其“理论修养”，深得斯大林赏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页。），可以说得到了斯大林意识形态斗争模式的“真传”，所以，他能肩负苏联意识形态“传经人”和特派员的重大使命，被派到毛泽东身边，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顾问。

尤金来华期间，不仅把苏联30—40年代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而且把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模式，传授、介绍到了中国，应该说他出色地完成了在华的“传经”使命。这从他得到极高礼遇并被要求延长在华时间就可得到证明。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从1950年9月、11月、12月的连续报道，尤金来华期间，对其接待

规格极高。第一次来华时，刘少奇亲临晚宴欢迎；在北京举行首次讲演时，刘少奇又亲临主持并致欢迎词，还介绍了尤金“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人民日报》，1950年9月22日)。陪同他到各地讲演的，则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第一次来华原本定于三个月，即从7月至9月，后由毛泽东亲自写信斯大林，申请延至翌年1月。回国前，毛在颐年堂宴请尤金，时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前来作陪。(《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76—479页。)由此可见，他来华期间完全是被当作最高国宾对待的。尤金在北京工作期间，曾被毛泽东特意安排前往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西安、沈阳、哈尔滨和长沙等地作政治理论报告，报告主要集中在三个题目上：一是《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二是《论苏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三是《东欧和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从题目上看得出，他是从广义上，在大范围推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东欧各国接受苏联模式经验的。至于理论和意识形态深层次的问题，看来是内部私下深入交谈的题目。从毛与尤金就一些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畅谈甚欢”的情况看，苏联意识形态斗争是绕不开的题目。加上30年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常驻莫斯科期间对苏联那些年代经验的介绍，以及40年代日丹诺夫关于苏联文化艺术和哲学问题的讲话刚一发表，很快被我党前领导人翻译出版，作为重要文件介绍到解放区来。这一切，就使我们党对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政策法规，甚至具体做法，有条件做到深入具体的了解，并“照抄照搬”过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建国后，从1951年起，就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发动了《〈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从此，又开启了一连串声势浩大的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以至发展到肃反和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思想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国导向了几乎经济崩溃的边缘，按邓小平的说法，若没有改革开放，我国将会步苏联亡党亡国的后尘。

怎样看待《〈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怎样看待我们建国后其他一系列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恰恰正是应该从这一整个总的背景中，从苏联到中国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批判中，从这一连串事件和整个情势中，来了解并评判它们。

## 切入题目的实证和逻辑分析

现在，让我们切入本题。

从上面总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发展线索来看，建国后，我们是长期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经验，采取了与苏联基本相同的思想文化方针和意识形态批判模式。并且从中可以看到具体的学习途径，“传经”方式和沟通渠道。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来说，在建国后，特别是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要展开一系列政治思想批判运动，包括《〈红楼梦〉研究》大批判，可以说是经过长期酝酿，业已形成了一个既定方针，也就是说，是一定要坚持进行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的，关键是怎么选定突破口，从何处入手发起动员，制定批判的步骤等等具体问题。

毛泽东向来对《红楼梦》兴趣有加，曾细读多遍，可以说是有相当研究的；而在1953—1954年期间，俞平伯正围绕《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在各种报刊连连登载，大量转发，一霎时，引起学术界一股空前的红学热；俞平伯本人也在我国学术界声名鹊起，文学界一些刊物、作者，对他的研究又充满赞誉之声。而他的有关《〈红楼梦〉研究》，又同胡适思想一线相牵，而胡适本人又与中国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紧相联系。对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早在1949年八九月间，就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在抨击艾奇逊之流的同时，已经对它均有论及。这暗含着、也预示着日后对这个知识群体是要进行清算的，这里实际上已给建国后的运动埋下了伏笔。

这样看来，选定从《〈红楼梦〉研究》开刀，矛头首先对准俞平伯，接着牵出胡适和这个知识群体，是有一个总的战略意图和具体战术安排的；这表明，从《〈红楼梦〉研究》开刀，在当时最高峰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着眼点和突破口。选定这个突破口，应该说表现了毛泽东特定的政治洞察力。有了这个突破口，从当时学界的情况看，可以说已基本具备了发动批判的条件。但是，从战

术完美角度，似乎还欠一点点火候，尚缺乏几缕“东风”。然而，刚好在1954年秋天，突然冒出了“两个小人物”在《文史哲》刊文，向俞平伯发难。这真是天外送来的“东风”，机遇太好了！这类批判对于“小人物”的需要，毛泽东是否受到了斯大林发起批判德波林、借用“两个小人物”一事的启发，这应是有迹可循的。首先，从1950年到1954年，毛泽东与尤金已有诸多密切交往，不仅对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状况，而且对尤金本人的仕途经历，已有相当的了解。而且，就是在1954年当时，尤金就在北京，不时在与毛泽东交往中，激起对这个最早向苏联哲学权威德波林发难的“小人物”的记忆。

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并特意说明“作者是两个共青团员”；在另一处批注中还特意指出，“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又一次强调“不过是小人物”。这样在信件和批示中反反复复，特别着意于“两个小人物”，并凸显他们受到“大人物”压制一事，还特意用引号把“小人物”加以标注、突出出来，这足以表明，他早已知道“两个小人物”的故事。

看看下述紧凑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对学界批评俞平伯动向的密切关注和他急于了解“小人物”的情况：刊登李希凡、蓝翎批俞文章的那期《文史哲》，是在1954年9月1日出版发行的；看来刚一出版，江青就在这月中旬发现此文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于是，主席便立即委托江青去了解作者情况。据说江青是连夜找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紧急向他传达主席指示的。邓拓奉命立即打电话到山东大学，了解两个“小人物”的联系地址和有关情况，于9月18日夜就紧急约见了蓝翎，第二天又约谈李、蓝两人。我们无从知道江青是如何向邓拓转达最高指示，又是如何提出具体约谈要求的，但从李希凡先生回忆约谈他们的情况看，邓拓奉命找到蓝翎，首先向他提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这样提出问题本身，显然就是意味深长的，具体地说，是有启发性和诱导性的：显然是想用这个诱导性的问题启发对方，期望从其口中得到某些所需要的情况。可以推断得知，这里若没有江青向邓拓口授机宜，有具体所指、有所诱导的要求，邓拓不可能这样有目的地、马上向蓝翎提出这样一个有明显指向性的问题。由于蓝翎没能满足邓拓所需要的回答，于是，第二天又立即约见另一个作者李希凡。在我们今天看来，对两个青年初学写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匪夷所思的：对青年作者来说，文章哪里容易发表就寄到哪里，这是很自然的事；在母校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个地方性刊物发表文章，当然比在北京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容易得多；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写文章，向全国其他凡有适合刊物、易于刊登的地方，哪里不可以投稿！这样一个无需回答、十分自然的问题，从邓拓这个《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口中提出，其本身就显得有些蹊跷；况且，这样一个自不待言的问题，又被邓拓作为重点问题，首先提出来，反复再三，更显得另有一番深意。可以设想，若非江青没有具体要求，出自十分了解发表文章成规的大总编邓拓本人，是断不会如此“小儿科”，提出如此“外行”的问题。显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开始就是具有诱导性质的，就是有意要启发这两位青年作者

1980年5月20日，俞平伯与蓝翎（左）、李希凡（右）在《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成立大会上

谈出可能受压情况的。从李希凡当时的投稿经历来看，自然而然，在言谈中不可避免地就流露出了抱怨之声：这里不给发，那里又拖延，等等。自江青对邓拓有所授意，邓拓又采取这样的约谈方式开始，到作者的抱怨，再向上层层报告，最后上达天听，这一连串的环节，都起着逐渐的放大效应。在这中间，因为是抱着目的来了解“小人物”情况的，上面层层都希望得到一个合乎预想的结果，自然到最后，这个结果，果然就出来了。就是在所有这些环节上，从“小人物”回答邓拓的源头上起，最后到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出现了有“被置之不理”的信的说法，这是一个层层不断放大“小人物”被压程度的过程。事情就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小人物”即使没有说出过有被拒信函之事，在往上逐层“放大”的过程中，也能“冒”出这样的信来；如果有信的影子，那放大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里尤其不能忽视江青的作用，从她向来的做派和为人来看，在这一个个环节中，她很可能起着由蚊子变飞机，由影子到实物的放大镜、扩大器的作用。对此是不能忽视的。除此之外，在各个环节上，都避免不了这种放大效应。上有所好，下有效者，此之谓也。

按照王学典先生的考证，从李希凡1954年4月13日给山东大学老师、《文史哲》编辑葛懋春的信来看，的确，对李、蓝正在写作中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文史哲》“编委会有需要”(李希凡给葛懋春的信)之意，这里明明点出是“编委会”，指明是对刊物有最后决定权的机构的“需要”，怎么能像李希凡解释的那样，是搞历史的编辑葛懋春个人的意见呢？况且，从李先生1954年4月13日给葛的信判断，该信谈到批俞平伯的地方所及，都是关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这时还在紧张写作第一篇文章，尚不可能顾及、也轮不到谈论第二篇文章。这样联系起来思考，提到《文史哲》“编委会有需要”，显然应当就是“约稿”或非正式约稿。有了这一“约稿”，是否还有向《文艺报》写“探寻信”的必要，是值得怀疑的。况且，以前又有《水浒传》稿子被拖被压之事，这对一个初试写作者而言，选择发稿容易的路径——《文史哲》，不啻是一个合情而又自然的选择。

再者，作协传达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信》之后，在对《文艺报》编辑部翻箱倒柜的搜查中并未发现此信，而这时，离李先生所说的写“探寻信”的时间才仅仅半年左右，若有此信，那是很少有找不到的道理的。

从王学典提供的材料和徐庆全的补充来看，上峰没有继续追查此事，所有一切相关责任人的检查，无论王学典列举的公开资料，还是徐庆全提供的内部资料都再也没有涉及此事，由此得出结论：“从现在已经显示的资料看，中央已经认可了《文艺报》的调查结论，即他们未收到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所以，无论是《文艺报》、冯雪峰、陈企霞都没有因此信而受声讨。大概当年《文艺报》和作协的人都明白，所谓被‘置之不理’的那封信只是一个批判的由头，以后不必再提了。”这个论断，是以比较充分的事实为依据的。并且，直到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上，《文艺报》几位同志仍然向作者追问“信”的有无，可见直至25年之后仍然余波未平，余怒未消，被指斥方到这时仍抱着莫大的委屈情绪。

经过多方面的资料印证，“被置之不理”的信之有无，看来史实基本清楚。这里不能忘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上述所说，这场批判运动是一定要发动的，这是既定方针；而恰好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联结着胡适，而胡适又关联着一个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知识分子群体，要批胡适，批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就一定要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为突破口。

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了“小人物”的“被置之不理”，被“大人物”压制的事，这便有了发动运动的由头，有了赢得人们同情弱者、反对权势者的道义和气势，有了发起运动的强大动员力和号召力。这就意味着，在具有“小人物”批判权威的“东风”之际，最好还要具备“小人物”“被置之不理”的信这种“受压”的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就站到了思想政治的制高点上。而恰好在约谈作者这一过程中，“小人物”多有抱怨之声，有过投稿被压、被拖之事，而不管是什么稿子，是何篇文章被压，只要是来自《文艺报》这一文艺界的头面刊物；有此，就足够了。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事情的本质在于，发动运动的初衷，就是要发动一场思想政治批判，在

上面看来，这不是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斗争。在此要考虑到，毛泽东既是政治家、诗人，又带有哲人的气质。他不是像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那样，凡事都要实证；就这件事而言，非要坐实“信”之有无不行，这就太书生气了。他作为政治家，是不会这样思考问题的。徐庆全披露的实际情况是，将10月16日《信》下发、在作协传达以后，才着手调查的：作协是在传达信的当天晚上，才组建调查组，在江青派人督导下，对《文艺报》报社翻箱倒柜做检查的；对《文学遗产》编辑部，也是在这时派人连夜作了检查。《文学遗产》尽管早在10月10日已发表了李、蓝的文章，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毛泽东16日信的原件，仍然有“然后投《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一句话。可见，作为政治家，以毛的胆略和气魄，他不需要、也不必顾及落实李、蓝信之有无这等“细节”问题。况且，他不仅有政治家的气魄，还有哲学家的思辨，又有诗人的气质。哲学家的思辨，让他占有“东风”——“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就已足矣，因为有“风”，就会有“影”；而诗人的气质，又使他欣赏“风摇竹影动”的意境：这幅美妙的“有声画”，堪与“无字诗”——“月照梅花”相媲美啊。所以，对他这位政治家来说，有“风”必有影，不管竹影、树影，还是其他什么影，能不失时机地抓住“风”，就一定能扑住“影”。事实正是这样：先行发出10月16日的《信》并向下传达，尔后才去搜查《文艺报》编辑部，果然就发现了白盾的退稿信。

有的论者以为，没有“小人物”的信，怎么能发动这场运动呢？这就太书生气了。绝对不是如此，有“小人物”的批判文章，有抱怨压制之声，就已构成理由；更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李、蓝这两个“小人物”，也仍然会发动这场运动的；没有这两个“小人物”，还会出现另外两个、三个“小人物”。即便其他“小人物”也没有，也仍然会发动运动的，由头有的是。无非是有了“小人物”及其受压的信，如上所述，就可占据更有利的制高点，更有彩头、由头，更有戏剧的情节性。以上，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退一步看，就是果真如李希凡先生所说，是他在尚未完稿、在未曾同时寄出稿子情况下，给《文艺报》通讯组写了“探寻信”，对这种询问，我们做过编辑工作的，或者有过投稿经验的人都知道，编辑在尚未看到实际稿子时，是无法做实质性答复的。即使对一位有一定资历的写作者而言，也是如此，况且对一个刚刚毕业不久，即“初试”的写作者。在编务异常繁重的大报大刊，如《文艺报》者，给予回答，是敬业、周详之举；不予答复，也是寻常之事，是无可厚非的。对这一点，李希凡先生在《驳“揭秘”》一文中也是这么表示的。如果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事实，怎么上达天听以后，就变成10月16日《信》所说的：既有“小人物”“被置之不理”的信，又有“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之事呢？这就是笔者在上述所说的，从邓拓诱导性发问，到一层层加码放大，最后变形，而成了信中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原本10月10日已登载李、蓝《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而毛在10月16日写成的信中仍有“然后投《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这样一句话。这不是明显不符合事实嘛？发动这样大的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对有莫大政治气魄的毛泽东来说，“细枝末节”并不重要。这才是唯一合乎政治运动逻辑的解说。

话说回来，如果这是纯粹的学术讨论，那么，这封“小人物”的信之有无，就是需要查实的问题了；问题就在于，当时不是把这场批判作为学术讨论、学术争论，而是当作一场思想政治大批判。我们今天要正确评判的就是，作为政治大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是否应当肯定，这是问题的核心、实质所在；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研究、评判这一事件的几乎所有问题。王学典、徐庆全先生是从学术争论、学术批判的角度来要求关键细节的真实，他们从微观上，从学术上对“被置之不理”的信作了有价值的考证；但仍不要忘记，这场批判从“缘起”之时，就设定是一场政治批判、政治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细节”，哪怕是十分重要的细节，也是不重要，无关大局的。在今天看，正因为政治侵害学术，把学术问题完全混同于政治问题，才不能肯定这样的批判运动。遗憾的是，目前还有不少人不能对此加以认同，这是应该继续拨乱反正，予以纠正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杜明明）

# “灰皮书”的由来与发展

○ 张惠卿

“灰皮书”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延续到1980年为止将近二十年间出版的一批特殊的书籍，是为了配合党中央发动的针对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反修斗争，特别是中苏大论战的需要编辑出版的。当时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安排，中央编译局组织有关单位编译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指定由四家出版社，主要是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批著作都是“反面教材”，属“毒草”性质，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就称其为“灰皮书”。

“灰皮书”均为内部发行，封面扉页上都印有“供内部参考”或“供批判之用”的字样，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

“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断。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结束，先后共出版了二百多种。

“灰皮书”固然是为了配合国际反修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中冲破了我国长期以来文化禁锢政策的桎梏，为我国广大学者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不同信息的窗口，使他们可以作出比较研究，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因而受到了学术理论界的普遍重视和欢迎。对于推动理论研究、促进学术文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大家始料不及的。

## 一

要弄清“灰皮书”出版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必须结合这场国际反修斗争一起来加以说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之后开始的，核心问题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并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走和平过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我们根据列宁、斯大林的一贯学说和主张，从推进世界革命，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立场出发，认定苏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到了1958年和1959年，矛盾和分歧已经越来越尖锐，1960年初毛泽东主席决定公开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国际反修斗争从此展开了。

在1960年4月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批修文章，就有关时代特征、帝国主义性质以及和平共处、和平演变等一系列问题，用指名批判南斯拉夫铁托的方式，明显影射、指责和批判苏共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很快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击，两党关系全面恶化。

同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期间，苏共不经中共同意，就在那里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会上散发材料攻击中共。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反驳。会后苏共领导把两党关系扩大为两国关系，片面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康生为组长的反修领导小组，并由中宣部调集了理论界的许多精英人才，组成写作班子，酝酿和苏共展开大论战。

“灰皮书”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了。因为要和别人论战，不清楚对方的立论和观点，不了解他们的基本思想，也就无法深入分析和批

判。而要弄清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又必须知道他们的老祖宗,也就是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老修正主义)。可是我们过去对他们的著作讳莫如深,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样批判他们,却完全不知道这些“反面人物”的具体观点和思想。现在要和苏共展开论战,要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就必须了解新老修正主义者的主要著作,其中也包括被列宁批判的普列汉诺夫和被斯大林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托洛茨基以及宣布为人民公敌而被处决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的著作。

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同志和副处长许力以同志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用同志为该室主任,冯修蕙同志为副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由我任组长。

承担这套“灰皮书”的规划和翻译任务的是中央编译局,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兼任该局局长,王惠德同志为副局长,他们两人一直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为了拟定这些“反面人物”的书目,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的同志根据该局的现有资料,并查遍全国各大图书馆的中外目录,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施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鲍威尔、希法亭、饶勒斯、米勒兰、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人物,后来又增列了一大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著作和资料,即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著作。

书名列出以后,找到原著至关重要,但这项工作进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著作,不要说国内,国外也很难找到。中央编译局、中央联络部和相关部门想尽了一切办法,除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搜罗外,还派人到国外去搜寻购买。

当时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获得,因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根本无法找到他的原著。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只好从苏联几十年来出版的《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和有关报刊上一页一页地翻找,终于找到了托洛茨基的一些重要报告和文章,但毕竟不是他的系统著作。

有人想到我国的托派组织过去翻译和出版过许多托洛茨基的著作。1952年12月,我国公安部门曾有一次全国统一的“肃托”行动,把在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收审,上海人数最多,也最集中,他们保留在家中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这些书当时如没有销毁,应当还在什么地方放着,这是一个重要来源。

1963年初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去了上海,向上海市公安局的有关同志说明来意后,他们极为重视。但是事隔十年,这批书是否还在,放在何处,谁也记不清。后来总算找来了经手过此事的同志,几经周折,终于在他们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已积满了灰尘。我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一本一本地拣了出来,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我记得有《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论》《文学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二十多种,包括重复的共有数十本,还有几种法译本和英译本。我如获至宝。经市公安局同意,我把这些书全部拿回北京,交给中央编译局统一参考使用,总算不辱使命。后来我知道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也藏有若干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原中共“一大”代表、中国托派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曾在1929年到土耳其去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的刘仁静,当时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当他得知我们正准备出版托洛茨基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误以为党中央可能对托派问题有什么新的政策,十分高兴。他对我说,他那里藏有几部托洛茨基的原著,可以提供给我们,我当然喜出望外。他就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给他的七本《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献出来,虽然不全(托的这部文集共有十多卷),但十分珍贵,这些书后来都被用上了。

“灰皮书”的编译工作除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参加外,我们几家出版社还组织了一批懂外文又

熟悉理论的专家参加。因为许多著作内容深奥，又有好多不同的文种，所以很难翻译。当时南斯拉夫被当成一个重要靶子，为了直接从塞尔维亚文翻译他们的著作，还专门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个教授塞文的学习班，为一批懂俄文的译者（因俄文和塞文都是斯拉夫语系，很接近）培训学习，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了难得的塞文人才。

## 二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著作选录》。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十多种伯恩施坦、考茨基两人的主要著作，其中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什么是社会主义》《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等，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被列宁斥之为“叛徒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和战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从这些书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争论和对抗的内容。也就是列宁为什么把第二国际这两个领导人恨之入骨、视为死敌，称他们为修正主义的原委。上海人民出版社则组织翻译了考茨基两大卷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成六个分册（12本），作为老修正主义哲学选辑出版。

另一个重点人物是托洛茨基，除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两册）外，还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不断革命论》《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苏联的发展问题》《文学与革命》等单行本。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论述很多，“灰皮书”中则只字未收，因为这正是当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事变后）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争论和分歧的焦点，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故意回避了。商务印书馆还编印出版了一套《托派第四国际资料》，共五大册，全面介绍了托派第四国际在一些国家的活动情况。

被列宁当年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也列入了机会主义人物之中，除编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下两册）外，还出版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撰写的《论战争》《在祖国的一年》等书。人民出版社多年来出版过大量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后来均收入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都是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待的。在后期他发现列宁很多思想是错误的，和列宁产生了意见分歧，遭到列宁的批判，于是我们就把他看成是第二个考茨基了。

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各国的所谓修正主义著作，其中有：奥地利鲍威尔的《到社会主义之路》，意大利陶里亚蒂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比利时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波兰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美国白劳德的《德黑兰》，法国列斐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加罗蒂的《人的远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日本贵岛正道等的《日本“结构改革”论》等。

苏联一批知名学者的著作，如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尼基金的《政治经济学通俗教科书》，阿特拉斯基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德波林的《哲学和政治》，布尔拉茨基的《国家和共产主义》，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瓦尔加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等，都被列入“灰皮书”出版。

## 三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我们把二十二大概括为“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认定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二十二大指责了阿尔巴尼亚党，我们则坚决维护和支持这个反对“苏修”的欧洲盟友，并认为欧洲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都已变修，成了“修党”，漆黑一片，只剩下阿党这一盏“明灯”。人民出版社这两年反常地出版了许多阿党党报的反修社论，几乎是他们

每发表一篇社论，我们就出一本小册子，因为他们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致。在这场国际反修斗争中，只有他们和我们遥相呼应。因此毛泽东主席衷心地称赞他们是照亮欧洲大地的“一盏明灯”。

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极端艰难。1962年初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向中央提出了要在国际上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四面树敌，认为我们的对外方针首先应该是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正确意见在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看做是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言论，最后又上纲到“三降一灭”，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对外四面出击，中苏论战不断升级。

这场中苏大论战我们不仅是针对苏共，也针对凡和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把他们全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党。苏共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表了近一千篇文章，长篇累牍地阐明他们的观点，反驳我们的指责。中苏两党从此断绝了往来，随后我们又同全世界80个共产党中的70个党中断了关系。

为了配合中央四面出击的反修斗争，“灰皮书”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最多，超过了一百种。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带有学术理论性的“反面”著作外，很多都是有针对性的，以及时提供给反修领导班子撰写“九评”时的参考之用。如《苏联“全民党”问题文摘》《苏联“全民国家”问题文摘》《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的言论摘录》《赫鲁晓夫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谬论》《苏共领导和铁托集团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荒谬看法》《现代修正主义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言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和平过渡”问题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动言论》《关于人道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全民国家”的现代修正主义言论》等等。其中不少是以《红旗》丛刊的名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先后编译出版了五大卷《苏联报刊反华言论》。

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我们当时对南斯拉夫的社会改革措施，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大肆挞伐。这两年针对南斯拉夫的“灰皮书”集中出版了二十多种，把南共联盟视为除苏共以外的最大敌人，甚至认为赫鲁晓夫是在向铁托学习，苏共的有些修正主义货色正是从他们那里贩卖来的，把南共联盟和铁托上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见“三评”）。

以下是有关南斯拉夫的部分“灰皮书”书目：《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反动言论》《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言论》《铁托集团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言论》《铁托集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反动言论》《铁托集团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观点》《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有关人道主义的言论》《铁托言论选》《南斯拉夫的铁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南斯拉夫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工人委员会的十年》《在南斯拉夫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南斯拉夫的集体经济》《南共联盟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等等，涉及南共国际国内方方面面的问题。

从这个时期“灰皮书”的出版状况可以看出，这几年大张旗鼓的反修斗争，问题究竟在哪里。尘埃落定，应该说，这种加紧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决策和行动的严重后果，就是引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场斗争既是“文革”的预演，也是“文革”的前奏，国际反修斗争变成了国内反修斗争，我们紧握住已被苏联丢弃了的斯大林这把刀子，把苏联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后，就来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酿成一场全国性的惨祸。

## 四

1966年上半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造反浪潮很快席卷了全国。中宣部变成了“阎王殿”，出版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五界之一（另外四界是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最先遭到冲击。绝大部分图书都被当做“封、资、修”毒草而遭封杀，全国所有图书馆也被迫关闭。出版“灰皮书”更被看做是“大放毒草”，是出版社“走资派”的一大罪状，当然立即中止。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为了扭转这种文化教育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可怕局面，首先抓了出版工作，他想从恢复图书出版着手来逐步恢复我国的文化事业。

1971年3月，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有二百多人参加，这是“文革”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专业会议。

同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给狂热的“文化大革命”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接着不久，美国尼克松总统和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相继访华，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逐步趋向缓和。虽然仍有“四人帮”的干扰，但出版禁区已在缩小，工作逐渐恢复。人民出版社的“灰皮书”，从1972年开始，在反修的名义下又继续出版了。

而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已有了很大变化，赫鲁晓夫早在1964年下台，并于1971年去世，只是苏联的基本国策并无多大改变，我们称之为“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我们的国际反修任务没有结束，但热潮已经过去，“灰皮书”的出版也减缓了步伐，数量已大大减少。

后几年出版的“灰皮书”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苏联的著作和资料，主要是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如《赫鲁晓夫回忆录》和它的续集《最后的遗言》，在1973年和1976年出版后，风靡一时。还有米高扬的回忆录《斗争之路》，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戈尔什科夫的《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格列奇科的《高加索会战》，谢列斯特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等。还有是一些西方学者揭露苏联内幕的书，如《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苏联的海洋战略》《苏联的社会变革》《克格勃——苏联特务的秘密活动》等。另外还出版了苏共二十三大、二十四大、二十五大的主要文件汇编和《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苏联哲学记事》《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5年）》等书。这些书主要是提供了研究资料。

另一方面是中央编译局早已着手编译，正陆续完成的一批言论集，是从这些所谓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重要人物的许多著作中摘录他们的各种观点和思想，加以汇集的。从1972年到1980年，出版的有：《伯恩施坦言论》《考茨基言论》《拉萨尔言论》《巴枯宁言论》《鲍威尔言论》《布哈林言论》，以及重新编译的两大册《托洛茨基言论》。

《托洛茨基言论》是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种“灰皮书”，以后就不再采用“灰皮书”形式，“灰皮书”的出版工作至此宣告结束。

## 五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拨乱反正，全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解放，思想理论界也十分活跃起来。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学者都迫切要求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二战后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上发生的新情况和产生的新思想。

很多知识界人士纷纷向出版部门建议，希望有关出版社参照过去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办法，继续翻译出版一些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大家研究参考。1980年4月，在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同志的倡议下，由陈翰伯（国家出版局代局长）、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惠德（中央编译局局长）和曾彦修四人出面，在国家出版局召开了一次有关各方人士参加的专门会议。会议一致同意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此类书籍，决定在国家出版局的直接领导下，由人民出版社牵头，邀请中央编译局、社科院的马列所、情报所、苏东所、中联部七局、外交部苏欧司、北京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参加，由十几位熟悉业务的专家兼职组成一个“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目规划小组”，由他们来确定选译的书目。

同年7月，这个小组的同志在阅读了大量有关各类外文书籍后，从中选出了一百本书，每本书都写有简要的内容介绍，编出了一份《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书目（一百题）》，经主管此事的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打印成册，分送给中宣部、国家出版局有关单位审阅，同时也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位中央领导同志。

《选目》送出后的第三天，即1980年7月21日，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就收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下列批示：

我赞成翻译现代社会主义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一类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位有水平的行家再精选一下。

耀邦同志还在退还给该室的一百本书目的许多地方打上了红杠，表示关注。说明他仔细读过每一本书的介绍。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1981年1月经中宣部同意，国家出版局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有全国几十家出版社和有关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会议由陈翰伯同志主持，曾彦修、王惠德、于光远、边春光等同志都讲了话。会上确定了这套书的统一名称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明确了读者对象和发行范围（不发县级书店）。

与会的许多出版社的负责同志纷纷提出，为了及时提供国外的思想信息资料，促进学术研究，这一百本书太少了。耀邦同志批示中所说的"要精选一下"，是指人民出版社一家而言的。现在有这样一个高水平的选目小组，应该尽量多选译一些重要的著作进来，这是我们出版界同志为学术理论界服务的社会责任。就全国来说，无论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家分担一下，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选目小组根据大家的意见，又分两批补选了七十多本书，和第一批书一起分别交由全国的26家出版社负责组织翻译出版。人民出版社最多，共承担了二十多本。

该书采用黄色封面，作为一套丛书，封面上都印有这样一个总的说明："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的一种"。

这批书和"灰皮书"类同，但内容范围有所扩大，也可说是"灰皮书"的延伸和发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苏联麦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巴斯马诺夫的《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希什金的《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南斯拉夫卡德尔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日本不破哲三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上田耕一郎的《现代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美国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马拉科夫斯基的《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科恩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英国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科茨的《布哈林案件》，弗朗克的《第四国际》，德国巴罗的《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莱昂哈德的《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霍尔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法国施拉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波兰沙夫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捷克奥塔·希克的《第三条道路》，意大利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拉焦尼埃尔编的《陶里亚蒂论葛兰西》，那波利塔诺的《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比利时曼德尔的《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等等。

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了解外国政治学术动向，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入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以及弄清当代世界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很有帮助和参考价值的。其中有些书还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在对外交往中产生了作用。

## 六

到1984年初，列入选目的著作共出版了约一百种，已在翻译和排印中的还有二三十种。谁知这一受到广大知识界重视和欢迎的重要工作，却遭到了一场灭顶之灾。

1984年2月，在全国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后，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同志突然对人民出版社出版这

套著作作为自由化倾向的严重实例，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认为人民出版社出这类书对青年有害，助长了自由化思想的泛滥。他说："60年代译那些书是为了反驳，现在没有人反驳了，反而有人信仰。""我们是作宣传工作的，扩散这些东西，这不能不说是精神污染。""现在中国青年的思想本来就很混乱，人民出版社还出这样的书，更增加了思想混乱。""出版社应当为党所领导的理论界服务。但是理论界脱离了党，我们就不能为他们服务。""人民出版社随便出书，变成了自由主义出版社了。"

胡乔木同志的这些批评意见很多很重，又很随意。2月15日，中宣部专门召集人民出版社处级以上干部共26人，到中南海中宣部会议厅，听取了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的传达，并要他们回去后告知大家，认真检查。人民出版社受到的压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事在人民出版社和全国出版界传开后，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不安，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出版这套书既有上级文件的规定，又经过严格选择，怎么能说是随便出书，自由扩散，毒害青年，变成"精神污染"了呢？

3月6日，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陈茂仪、张惠卿三人谈话，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陪同。曾彦修和张惠卿据理力争，认为我们做的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不承认有什么错误，并出示了中宣部等领导部门的有关文件。许力以同志也为我们讲了话，提到了耀邦同志的上述批示。最后胡的口气有所缓和，说可以"不追究个人责任"，但仍认为人民出版社不能出版这类书籍，因为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只能出版正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而不能出版那些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书。

中宣部为此重新检查了前段的有关工作，于1984年4月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关于近几年全国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对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出版工作作了严格限制，只允许商务印书馆、新华出版社等五家出版社可以继续出版这类书籍，但每本书上都必须写有一个批判性的前言，否则不能出版。

报告下达后，各出版社将正在翻译和排印中的书稿全部收回下马。大家对这项工作已视为畏途，顾虑重重。几家仍允许继续出版的出版社也悄悄地将原有选题撤销了事，谁也不愿再承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这套"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的出版工作，无形中也就宣告结束了。

还有一个有关情况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即在1980年前后，人民出版社还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了几种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参考书，其中有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陈公博的《苦笑录》，还有德国布劳恩（李德）的《中国记事》，苏联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美国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等，作为内部研究用书，印数较少（一般只印500册），控制发行。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灰皮书"。

这几位属于"另类"的大人物撰写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侧面和反面）反映了党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提供了别人无法了解的珍贵资料。这些书填补了我国现代史研究工作的某些空白，受到了历史学界，特别是党史学界学者们的重视。

2004年时人民出版社又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的形式，用东方出版社的名义把这批书重印了一次，内部发行，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 也说《顾准文集》的出版

○ 唐继无

日前读到贵刊2013年第1期“《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卢惠龙文)”,提到“文集在上海学林等一些出版社飘移过,未果”,不禁勾起我一段清晰的记忆。

1988年的一天(具体日子记不得了),黄安国介绍我认识陈申申,并说有一部很好但可能有风险的书稿想推荐给我。我说好啊,我愿意看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稿。于是,约定了一个日子,陈申申陪同我前往陈敏之家,谈书稿之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顾准著作的原稿。

顾准全家福(1958年)

陈敏之是顾准的五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一位参加过新四军的中共老干部。陈的寓所就在衡山路上衡山宾馆对面新建的局级公寓楼内(王元化、潘维明等当时都住在这里)。陈敏之简单介绍了他五哥顾准的身世、遭际及文稿的来龙去脉,询问我有无可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虽然此前不了解顾准,但他的遭遇及风骨却深深打动了我,何况还有申申兄专门向我出版社写的情理兼备推荐信。我当即表示,愿意将书稿带回去认真拜读,只要没有太大问题,一定尽力争取出版。

回来之后,我将书稿先浏览一遍,感觉就像发现了一个未被发掘的金矿,我意识到这部书稿的价值非同一般,如能出版,或将成为我国思想史和出版史上一件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我想引用王元化先生后来在香港出版此书时所作的序来说明,是对此书再合适不过的精辟介绍了——

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其实夏绍裘最初所写的审稿意见就有类似评价)

当时由于工作繁忙,恐怕自己没有时间来精心编辑处理这部书稿,便有意物色一位同事来当此书的责任编辑。让谁来承担这个工作呢?我想到了哲学编辑室的老夏——夏绍裘。

老夏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老编辑,学识、文笔均属一流,秉性耿直,磊落坦荡,为此还曾吃过

大亏——反右时被评定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右派，全家发配青海改造，在死亡边缘挣扎多年后，终于熬到改革开放，才得以回到出版社工作。我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工作，便与老夏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初识老夏，除了暗暗佩服他的才情，还真对他决不圆滑的性格有些不以为然。后来时间长了，才慢慢觉得他的可爱可敬之处。

我找老夏商量此事，询问他愿不愿意接这个可能烫手的活，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于是把书稿给了他。几天之后，老夏非常激动地跑来对我说：顾准的书稿太好了，从未见过这么有思想的好书稿，我一定要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详述了对顾准书稿的评价，并十分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书稿中有些内容可能会引起麻烦，这样会对你不利，你就不要出面了，将来万一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责任。特别是其中有两封信（该书稿都是顾准写给陈敏之的信），将来万一上面追问，你就说：是被老夏压下了，没让我看到。

一个罹难二十年的老编辑，如此勇于承担风险，保护我这样的青年干部，其精神着实令我感动，并更对他产生敬佩之情。可我也不是推诿责任之人，如果真有什么事，岂能忍心让老夏独自承担，而我却做个缩头乌龟？我当即表示，我是此书的终审，将来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共同承担责任。

这是顾准在1973年至1974年间与陈敏之通信讨论问题时写下的笔记，陈敏之将整理后的文稿交我时并没有书名。既然要出版，就该取个书名，而且还要取得好。我与老夏商量书名之事，老夏经过反复思考斟酌后，提议就用文稿中一篇文章的标题"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做本书的书名。经老夏这么一说，顿觉心中一亮——好一个点睛之笔，这一句话就把顾准文集的精髓给提炼出来了。我表示同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本后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不朽名著的书名就是这样确定的。

当时要出版顾准的这本书还真是有些风险的。就在我接下书稿不久，出版局领导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消息，关心地跟我打招呼，转达市委宣传部的意思，说是顾准的书内容敏感，不宜出版，提醒我谨慎从事。我明确表示，我认为此书值得出版，如果上面真觉得不能出版，请下文正式通知。看我如此坚持，局领导便不再吱声。当时正值建国以来思想最解放的时期，上面大概也不愿过多干涉，但对我不听招呼的态度肯定是心有不爽。

书稿经过三审，送印刷厂排字时，已是1989年春天了。当时还是铅字排版工艺，要靠排字工人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码起来的，不像后来的电脑照排那么迅捷。正当排版完成，即将付梓之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北京风波，形势急转直下，很快这书能不能出版已经完全由不得我们说了算了。

就这样，顾准书稿出版之事被搁置了下来。后来，中华印刷厂有意见了：排好的铅版占了车间偌大的场地和空间，影响工厂生产，因此提出，要么赶紧印书，要么就撤版。此事后来惊动了王元化先生，大概是陈敏之向他诉说了顾准遗稿的遭际，王元化先生便牵线搭桥，让我们将此书稿转交给香港三联书店，让香港来出版此书（后来此书校样连同老夏所写的详细审稿意见和陈申申的推荐信一起交给了陈敏之先生）。这在当时大概就是顾准书稿可以出版的最佳途径了。终于，在元化先生的斡旋下，日后便由香港三联书店出了此书，书名便是我们当初确定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不知通过何种途径，让这本顾准的不朽名著在内地正式面世，书名是《顾准文集》。此书在内地甫一出版，便立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滋养。不过，它还是触犯了意识形态管制的天条，不久之后《顾准文集》就莫名其妙地遭禁——不准发行了。■

（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杜明明）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关于牟宜之

○　李　锐

五年前我写过《读牟宜之诗——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文，听说诗集很快售完。文中关于作者未能作详细介绍。现在清秋子为牟宜之作了传记，传名《国士》。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又让我作序，虽然传记只是匆匆一读，但由于传记主人同自己有许多相似的经历，仍乐意为之。

何为“国士”？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说：乃“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牟宜之长我八岁，但1925年读中学时就加入共青团。在上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人群中，他有一种特殊的代表性，这同他的姨夫丁惟汾有很大关系。

丁惟汾与我的父亲同时代，同于1905年到日本留学时即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同时当选国会众议员。丁惟汾很受孙中山器重，曾多次委以重任，同盟会创建之初，便被推为山东省主盟人；民国初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山东省党部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在山东起兵反袁；共谋北伐时，与廖仲恺并称为孙中山的“左右之臂”；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忠实执行孙中山发起的国共合作，与李大钊等密切往来；李大钊等不幸遇难时，丁因外出办事幸免于难；国民党执政时期，丁历任要职，但始终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

牟宜之很幸运，有丁惟汾这样的一个好姨夫，才使他很年青时即沐浴大革命的雨露，转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24年，为工作方便计，丁惟汾举家迁徙济南，牟宜之也就跟随到济南读书，与他同住一室的是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曾任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君羊早年丧父，被丁惟汾收养，视如己出，从小就受辛亥革命影响，思想激进，喜读进步书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牟宜之就是在这位表兄的影响下，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从而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且和党内的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共产党后，山东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牟宜之由此失去组织关系。1932年，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共日照中心县委组织日照暴动。为了搞到枪支弹药，牟宜之卖掉母亲陪嫁的三十亩地，购得枪弹，暴动失败后，牟宜之被通缉，只身逃到上海，躲进姨夫家中，转而留学日本。1935年回国后，经丁惟汾和邵力子的推荐，在南京的中央政治会议任外事组专门委员。据他生前的自述：“西安事变后我到南京游说各要人，力倡不要进攻西安，要和平解决，联共抗日。当蒙一班国民党元老所称许，对西安事变解决或有帮助。”不论作用大小，由于丁惟汾的关系，他在国民党中也有了不少人脉因缘，为他日后做敌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牟宜之利用在南京的关系，筹款筹枪，在山东组织抗日武装。期间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过董必武，要求解决入党问题，被告知留在党外工作更有利。山东的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枪毙后，牟宜之利用姨夫的关系获得乐陵县县长一职。在这个土匪武装林立的“三不管”县，他大显身手，一方面想方设法为中共的抗日部队提供帮助，另外一方面斡旋反共的土匪武装（打着抗日旗帜）共同抗日；同时组建了县公安大队维持治安，并同中共联手剿灭为祸百姓的土匪武装，其艰难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至今被乐陵老一辈人称之为“乐陵版的《三国演义》”、“乐陵版的《七侠五义》”。1938年，牟宜之终被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约刊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400-653-6199

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调任八路军挺进纵队秘书长，负责日常统战工作。后部队改编，出任泰山支队司令。他还化妆商人，不远万里，辗转敌后，到当时陪都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还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作过长谈。然后再经西安、太行回冀鲁豫，曾同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会谈过，并用自己积蓄的几万元，解决八路军的衣物困难。回到山东后，担任过滨海区副参议长、沂蒙专区专员、115师参事室主任、山东军区新编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曾策反多股敌伪军起义。抗战胜利后，在军调部执行处参与国共谈判。解放战争时期，调辽东军区，先后任秘书长、联络部长、敌工部长等职，曾策反国民党军184师起义，创建功勋。

1949年党执政之后，牟宜之先后在林业部、建设部任职，“职务越来越低”，逐渐被边缘化。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双跨”，同国民党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丁惟汾已辗转去了台湾，被划入国民党右派阵营；牟宜之的胞弟牟乃纮是蒋经国的下属，在台湾任国防部少将专员。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在城市建设方面超前性规划，揭露政治骗子李万铭等，在当年是颇具影响的事件。

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牟宜之再也躲不过去了。以他的身世，他的秉性，不让他秉直劝谏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被“阳谋”圈住，应声倒地，从此打入另册。“文革”开始后，又被发配到黑龙江劳动改造，饱尝种种苦难，直到去世不得还乡。但“国家不幸诗家幸”，牟宜之后期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文革”以后，直逼李杜，进入化境。我在为牟诗所作的序言中已加论述。牟宜之是东林后人，幼年由祖父教导，从《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开蒙，入私塾后，始读《四书》，读过的书，他全能背诵。据说，他识字之多，更是罕有人比，只要是《康熙字典》上有的字，全能认识，被人称为“活字典”。丁惟汾是著名的训诂学家，对这位外侄的才学很是欣赏，曾有心让其承继自己的衣钵，专心国学。由于自幼的修养，牟宜之的才学特别显现在他的诗人气质中，我写过这样的评语：“其艺术性、人民性、正义性品位极高”，很欣赏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壮志豪情、乐观豁达，特别是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式宣判。这本传记的作者对牟诗的品评，主要是就其“同步批判”的勇气和预见性加以论述，我很是赞同。可以举几个例证：

青少年时期的感时愤世：“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战乱年代对军阀的控诉：“兵连祸结灾不单，去年潼关又大战。”抗战时对侵略的谴责和对未来的向往：“夜宿荒郊闻鬼哭，阳光大道少人行。何年涤荡平胡虏，裁戢干戈不用兵。”“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舟遭踏践”，这是他早年的立志。沦为“贱民”后，他意念坚定，不改初衷：“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文革”期间，发配到边陲绝域，身心倍受摧残的同时，在坚强意志的支撑下，精神更得升华，思想更加深刻，人不堪其消瘦，诗陡增其壮美，其“同步批判”的力度日益增大，彰显出超常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如他在“冬日”所言：

索居白日且晦　，瀚海阑干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得知彭老总二次受辱，他感同身受，写下“闻彭大将军被辱有感”：

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
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
夙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
苍狗白云任变幻，不愧东西南北人。

他对文革乱局的是非颠倒，豺狼当道，人心不古，世风险恶，抨击无已，诗句极多，如“新贵多显赫，贪佞塞庙堂。傍行狐与兔，共事豺与狼。常怀临渊意，小心辟祸殃”。“雪中送炭世罕有，井下投石所见频”。1971年林彪事发，特写下咏史诗三首，被学者赞为当年评议此事旧诗词中的“翘楚”。不仅道出“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的社会真情，还指出“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的历史宣判。传记作者为此评价传主的诗篇：“当年发出这种‘历史的先声’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学者教授，不是作家艺术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牟宜之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他的传记是值得传播的。■

（责任编辑　杜明明）

# 毛泽东与胡风事件

○ 钱理群

## 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毛泽东对胡风事件的直接介入，是从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的。1953年，毛泽东在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错误观点"。由此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由发展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的轨道。在思想、文化、文艺领域的任务，也由《共同纲领》规定的"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明他看准了批判目标，并且找到了突破口。毛泽东在信里说得很清楚："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或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擒贼先擒王"，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胡适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的总代表，批胡适，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最大，算是抓住了根子，如后来中宣部的一个报告里所说："这是我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斗争。"而这样一场大斗争，毛泽东却选择古典文学领域里的《〈红楼梦〉研究》作为突破口，而且利用"小人物"（年轻人）来冲击"大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都是毛泽东最喜欢，也最擅长的策略手段。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毛式"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但毛泽东的部署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文艺报》《人民日报》拒绝刊载"两个青年团员"的批判文章。于是就有了对《文艺报》的批判，其发难文章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并修改的。这时，毛泽东对周扬还是信任的，实际是把批判胡适与《文艺报》的领导权交给他的。

但这一切——无论是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对他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大清算，还是毛泽东对周扬的信任和重用，胡风都完全不清楚，可以说是蒙在鼓里，却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认为这是从根本上瓦解"周扬宗派统治"的绝好时机，因而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时，有意"扩大缺口"，全面攻击周扬所执行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这不仅是干扰他批判胡适的部署，而且是自己跳出来向党进攻。于是，就自然把批判的战线扩大到了胡风。周扬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的三个部分："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文艺报》的错误"，"胡风的观点和我们之间的分歧"，正是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三条战线同时作战的新的战略部署：依然以批判胡适（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同时批《文艺报》（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胡风（打着"左翼"旗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是排除干扰，也是毛泽东最为在意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迅速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作了补充。

毛泽东肯定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时间是1954年12月。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终于打破了深不可测的沉默，公开了周扬"后台"的真实身份，胡风和周扬的博弈，就成了胡风和党与毛泽东本人的对抗。毛泽东自己也从此走到前台，直接指挥批判胡风的斗争。而在毛泽东走到前台以后，一直关心胡风问题的周恩来，就不再参与，在《周恩来年谱》里，仅有一条"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的记录，这也是颇耐寻味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决定将胡风1954年7月提交中共中央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有关“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的两部分公开发表，“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这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他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欢把论敌的文章、观点公之于众，不怕群众接触“反面教材”，他深信群众是会跟着自己走的。直到这时，胡风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与毛泽东本人对抗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年轻朋友，他选择了屈从检讨，开始写《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见周扬，据周扬对毛泽东的报告所说，他“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当年周扬们批判胡风就是希望他承认这些错误。但在毛泽东看来，胡风是避重就轻，于是，就有了严厉的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是对胡风问题的一个全新定性。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坚持、鼓吹资产阶级思想本身，就是“反党反人民”。这样的严重定性，自然是胡风们所绝对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但后面还有更严重的罪名在等着他们。

1955年3月，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问题。毛泽东在3月21日所作的《开幕词》里如此给高、饶定性：“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对以后胡风事件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由高饶事件引出的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与对策。毛泽东明确提出：高饶事件“它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由此而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动向作出新的分析。他认为，新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外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进行突然袭击；二是“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有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可能；三是党内类似高饶这样的反党集团随时可能出现。这样，毛泽东就确定了今后阶级斗争的三大目标：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对打击国内反革命分子，还作了具体的部署：“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粉碎了他所说的党内反党集团之后，所作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就是要在军事上作好应对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同时，要有计划地给国内“暗藏的反革命”以“几个打击”。他说，“如果我们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 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

毛泽东的决策既定，就开始具体部署起来。我们可以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提供的材料和相关材料，对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按时间作一个排列：

3月21日，在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里，宣布决定对“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几个打击”。

3月31日，在代表大会的《结论》里，重申“三个准备”：“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正在毛泽东谋划对“反革命残余”进行新的打击时，5月9日晚，周扬把胡风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材料》清样一起呈送毛泽东。

5月11日，毛泽东将舒芜编撰的材料，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亲自撰写《编者按》。——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三个要点。《按语》首先指明：“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这里所说“反党反人民的文艺团体”应该是对胡风集团的新定性，也是毛泽东把舒芜说的“小集团”改为“反党集团”的原因；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把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现在则

将胡风一人扩展到整个集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下面这句话:“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这也应该是毛泽东读到这些信件的第一反应。毛泽东早已判定全国有许多“活动猖獗”的“暗藏的反革命”,面对胡风们用密语方式写作的信件,就必然激发出他的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他用自己既定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去解读,就臆想、炮制出了一个后来他所描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如果至少在3月21日毛泽东就计划要对“暗藏的反革命”给予几次打击;那么,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5月9日或10日就找到了实现他预定计划的突破口。这时候,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信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武器,对它的解读是否符合原意,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家毛泽东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去发动群众,打一场他预设的在全国范围内打击暗藏的反革命的“人民战争”。当然,毛泽东也还有讲究政治策略的一面: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断定胡风和他的小集团都是“反革命”,但为了使群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就仍然先定性为“反党集团”,同时在《按语》里又发出了“剥去假面,揭露真相”的动员令,并点名要求路翎等交出信件,以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一个基础。

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是要开展“肃反运动”的第一个信息。毛泽东已经考虑要扩大战果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只是一个突破口。

5月13日,毛泽东写有《按语》的舒芜署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及加有《编者按》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该文《附记》发表于《人民日报》。当天下午,周扬带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胡风)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

5月15日,毛泽东将《人民日报》拟发的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重拟总标题:“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并对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补充,强调“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事业以严重损害。”这一组文章后发表于5月18日《人民日报》。

5月16日晚,公安部派员拘捕胡风。

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逮捕胡风。在此前后,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如牛汉、贾植芳、耿庸、何满子、谢韬、徐放、路翎、绿原等纷纷被捕。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尽管仍称“反党集团”,但毛泽东为编者按语加写的文字里,却点明胡风分子为“反革命”:“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革命政权的倒台的。”

5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指示下,决定成立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由中宣部长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负责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中央机构和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相应组织。

6月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据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6月3日,毛泽东再次发出指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这可以视为一次交底,可注意者有二:其一,主要目的是“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泽东早已预定的计划;揭露胡风只是一种“借”助,也就

是先有计划，再找突破口的。其二，另一个目的，是要“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实际就是要“敲山震虎”，借批判、严惩胡风分子，来警示知识分子和干部（主要是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进一步归顺就范，接受改造。

于是，就有了下一步的部署：“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大概就标志着肃反运动的开始。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其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都和当年延安的“抢救运动”同出一辙，这当然绝非偶然。不要中小学生坦白，其实也是接受了抢救运动的教训。当然也有发展，比如在运动一开始就规定要打击的“暗藏反革命”的数字：“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这样的预定指标，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在此之前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的“反右”运动都是这么做的：先主观定目标，定数目，再去抓敌人：这大概就是毛泽东的“主观战斗精神”，而且发挥到了极致。

6月6日—8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按语》，有十七条之多（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可注意者有四。其一，第一次公开将胡风集团定性为“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的政治集团”。其二，对胡风和周扬等的长期论争作出结论：否认和批驳“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的说法，强调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一衣钵”。在毛泽东看来，胡风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攻击周扬等只是一种策略。其三，强化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观念：“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太简单了”；“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党内取得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要“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其四，再一次强调“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时，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6月10日发表）所加的文字，作出了“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判断。这样的由胡风事件引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论，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治国，以后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显然具有超越胡风事件的严重意义。

6月12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写《序言》和《按语》、《注文》，进一步指明“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并对胡风问题的争论，进一步作出总结：“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

## “舆论一律论”下的裁决

最值得重视，应该认真研究的，是毛泽东在《按语》中提出的他的“舆论一律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地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日”。在人民内部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而对于敌人，“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雏形。从表面上看，似乎振振有词；但其关键和实质，却是如何划分“敌人”和“人民”，由谁掌握划分敌、我的权力？在毛泽东这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切

由党，由党的领袖与领导个人决定，也就是说，只要党和领袖、领导认定是“敌人”，就可以剥夺自由，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在这方面，胡风案就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个样板：毛泽东仅仅根据胡风们的私人信件，妄加推测，就指鹿为马，宣布胡风和他的朋友为“反革命集团”，并立即逮捕入狱。从此，在毛泽东的中国，动用专政机关来解决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实行文字狱，就成为合法与常态。随着党认定的“敌人”的范围越来越大，主观性与随意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就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时刻“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但毛泽东说，他（当然是以“人民大众”的名义）因此“开心”了，这正是他的目的和追求。经过整肃胡风的运动，毛泽东就终于建立了一个不断制造文字狱的，剥夺知识分子，特别是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以至人身自由，实行“舆论一律”的思想、文化、文艺体制和秩序。胡风是这一体制和秩序的第一位殉难者，他的被捕入狱，是标志着一个知识分子受难时代的开始的。

以后，毛泽东要做的，就是如何扩大战果。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指示，由中央到底层，由地方到军队，等等。后来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全国肃反运动中被审查的干部达1800余万人，查出16万反革命，9000余嫌疑分子。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冤案，可谓后患无穷。

就这样，胡风事件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掌控下，由思想、文化、文艺的论争，演变成一个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思想批判为起端，以逮捕入狱为结束。这其实也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整顿思想作风，发展为到处抓特务的抢救运动，毛泽东不过是将他的“延安经验”推广到了全国。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发表时，由于受到抢救运动的影响，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胡乔木说：“这些原来讲话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但是，现在，我们在毛泽东关于胡风集团的《按语》中又看到了这样的判断：“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依然是“不实之词”，思路前后一贯，就是视知识分子为敌对力量，不仅思想上是异端，而且总是怀疑他们在组织上也是异己，这样的骨子里的敌意，正是《讲话》的基本精神，并没有什么不协调。

胡风们，周扬们，以及舒芜，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派别，他们在相互博弈中，都指责对方“反党”，而把最后的裁决权交给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终于作出了裁决，使事情有了最后的结局，却完全出乎他们所有的人的预料。胡风们觉得这是飞来横祸自不消说。舒芜在他晚年的回忆中说，5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他整理的第一批材料时，曾要他去看清样，一看自己原来写的“小集团”现在改成“反党集团”，还加了那样严重的《按语》，就“捏了一把冷汗”。后来在三批材料合印成一册时，又把题目再次追改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舒芜就难以接受了，“胡风成了反革命，我实在无法相信”，而且，这也牵涉到了自己：“这样一来，我不是一个革命内部文艺思想上有错误而能检讨的人，成了一个从伪装‘革命’的反革命集团中‘起义’过来的人，比‘军统’、‘中统’的起义人员还要臭了。”舒芜的这些追忆应该是真实的。得到毛泽东公开支持，因而应该是“胜利者”的周扬，据说也“吃了一惊”，接近他的人则有这样的观察：“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乱，不像平常那么镇定。”还有人回忆，周扬和林默涵都多次表示：自己缺乏政治敏感，跟不上毛主席。有这样的反应大概也符合周扬和林默涵的思想实际，毛泽东的政治想象力之丰富与出格，是任何人都赶不上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蒋荫恩其人其事

○ 王 鹏

蒋荫恩，1910年8月14日出生，浙江慈溪人。他曾在《大公报》工作六年，分别在津馆、沪馆、港馆、桂馆任编辑主任；他还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家。

## 成为"大公报人"

1935年年夏，蒋荫恩因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36年初，经人介绍，到天津《大公报》任编辑。报到上班的第一天，《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就把蒋荫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做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果报人自身对事业没有信仰和热情，是不会成功的，报也绝对做不好。"这些话，意味深长，他牢记在心。不由得他又回忆起在大学时期第一次见到张季鸾时的情形："百十个青年围坐在燕京大学临湖轩的大厅上，除掉阳光透过树叶射到地板上的一点闪烁外，空气静肃得几乎听到各人的呼吸，大家似乎在等待什么。忽然，门呀的一声，走进一个人，矮小、瘦弱，不使人感觉什么。坐下了，开口了，可不同哪，健谈、渊博、诚恳，而且精神焕发，态度闲逸。五十几分钟的话，大家听完了还想听。可是，门呀的一声，这位矮小、瘦弱的人，又走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季鸾先生。从此，他的神逸、潇洒的风度，精邃风趣的谈话，就深深地刻画在我印象上了。"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创办上海版，蒋荫恩由津到沪，参加沪版的工作，负责采访和编辑本市新闻。1937年4月16日，他与梁绮梅女士结婚。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荫恩于8月12日晨得悉吴淞口新到了20多艘日本军舰来上海增兵，就和同事一起找了一辆汽车去现场采访。一到外白渡桥，就见人潮从北四川路拥过来，四川路两边的商店都关了门，到处人心惶惶。他们转到了虬江路，路口已堆起沙袋，戴钢盔、穿黄军装的保安队全副武装占领了阵地，原先竖着许多广告牌的宝山路拐弯处，露出了钢筋水泥的机关枪工事。第二天上午9点多，闸北打响了第一枪，"八一三"的序幕在这里拉开。蒋荫恩撰写了消息和通讯，及时报道战地消息。是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为争"不受辱"的报格，自动停刊，部分编辑记者被安排到其它报社暂时储存起来。徐铸成、王文彬等到《文汇报》，蒋荫恩到了《大美晚报》。

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创办香港版，《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要蒋荫恩迅速由沪到港，继续为《大公报》工作。在港馆期间，他负责编辑要闻版。1940年春，欧洲战场烽火弥漫，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疯狂推进南进政策，企图向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扩张，胡政之断定，日寇南侵，香港必定不保，他考虑要给港馆准备退路，决定创办《大公报》桂林版。1941年1月，胡政之从港馆抽调部分人员（蒋荫恩、李侠文、李树藩、何毓昌、张蓬舟等）先期赴桂筹备，3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创刊，蒋荫恩任编辑主任，全权负责把握桂林版言论和版面。桂馆创办之初，真够得上"筚路蓝缕"四字。编辑部只有4个人，相当精干。编辑主任蒋荫恩，国内要闻版编辑何毓昌，国际要闻版编辑李侠文，地方版编辑兼外勤主任张蓬舟（后又兼编文艺副刊）；王文彬为发行人。王文彬在谈到这一段工作时，有这样的回忆：《大公报》桂林版的言论，主要采用渝版和港版的社评，"需要补充的社评，每周只有一两篇。蒋荫恩写得多些，我写得少些"。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蒋荫恩于9月8日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题为《一颗报界巨星的陨落——悼念季鸾先生的长辞》的悼念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提出："由大公报渝、港、桂三版同人即日发起，为季鸾

先生募集一个奖学基金，同时联合季鸾先生的生前亲友，共同出力，一俟募集成数，再由各方面推举代表组成‘纪念张季鸾先生奖学基金委员会’，以负保管之责，并决定在国内著名大学新闻系中，设立一个或两个奖学金名额，使季鸾先生在报界奋斗三十余年的精神，得以永垂不朽！”这一建议，得到社会积极响应。9月17日张季鸾生前友好于右任发起设立“季鸾新闻学奖金”，9月30日“季鸾新闻学奖学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央日报》社社长陈博生任主任，金融实业家康心之任会计。截至1942年6月4日，捐款已有10多万元，蒋荫恩和胡政之、曹谷冰、王芸生、徐铸成、王文彬、马廷栋、李侠文、李清芳、何毓昌、戚家祥、李天炽等《大公报》人也捐了款。

## 新闻教育的中坚

1942年8月，北平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一切都在草创之中。燕大代理校长梅贻琦找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王芸生要求借调蒋荫恩回母校担任新闻系主任，胡政之、王芸生出于对新闻教育事业的支持，欣然允诺。蒋荫恩在桂馆的工作，由1938年进入港馆的马廷栋接任。在成都燕大，蒋荫恩为恢复新闻教学，付出了心血。当他闻知“季鸾新闻学奖学金”募集了一笔基金，他多次到重庆争取基金对成都燕大新闻系建设的支持，结果“季鸾新闻学奖学金管理委员会”拨付10万元，支持燕大新闻系教学。在蒋荫恩的主持下，燕大新闻系注重英语教学，其实习报纸《燕京新闻》有中文版和英文版。其毕业生多数负责外事报道工作或派驻境外记者。燕大成都校友会在《抗战期间迁蜀的燕京大学》一文高度评价了大公报人对燕大新闻系的贡献：“燕大成都时期，新闻系能够做出出色成绩，是和蒋荫恩先生的民主思想，以及他待人接物平易谦和的作风分不开的。蒋荫恩先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与才能。他始终不渝地强调新闻真实，要尊重事实，要客观公正，竭力培养学生独力思考、独立工作、千方百计采写独家新闻的坚强活动能力。”

抗战胜利后，蒋荫恩随燕大复员北平，继续在北平燕大从事新闻教学工作。1948年9月，他应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邀请，赴美研修新闻理论和新闻广告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他闻讯后异常兴奋，急切寻找回国的途径，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是年10月间经香港回到北京，继续在燕大任教。1951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宣传部长。

1952年，政务院决定高校院系调整，蒋荫恩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他曾一度担任北大总务长，校办主任，并兼任新闻专业教授。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继续担任教授，并任系副主任，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

1966年爆发“文革”，蒋荫恩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残。1968年4月6日，他不幸逝世，终年58岁，死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他的遗物全被抄走，片纸未留。据蒋的老同事徐铸成回忆说：“有一位身历其境的朋友告诉我，他最后一次遭到‘批判’时，不容分说，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毒打，几乎体无完肤。思想上真也是不容易想得通的，他悬梁自尽了。第二天被造反派发觉后，绳子都解不下来，尸身被一个‘司令’之类的人物，从楼上拖到楼下转了一大圈，再从楼下拖上楼，作为是对‘畏罪自杀’、‘死不改悔’者的‘示众’。”真是惨不忍睹！

最近，笔者为寻找有关蒋荫恩的资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找到1947年7月14日的北平《益世报》，该报用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他的新闻教学讲稿《新闻的产生与衡量》一文。这是一篇极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观点浅显而独到。蒋荫恩在这篇讲稿中，重点讲的是采访的方法。讲稿的前一部分说明了新闻如何产生，后一部分是说怎样去衡量新闻的价值。他说道：“一个新闻记者从业员采访的范围很广，但是实际上在报纸上登载的也不过采访来的一部分消息，所以总感觉到新闻量少。在战前，每日报纸上所发表之新闻，也不过是采访消息的三分之一。以目前北平各报情形来说，每天所登的成分也不到二分之一，主要是篇幅少。如果篇幅多，通讯社多，新闻量增加了，就要有选择。提到选择问题，记者与编辑常有对新闻价值的看法不同，或者是判断标准不同，以至发生摩擦。”为了更进一步在理论上探讨

# 1942年《大公报》怎样披露河南大灾

○ 张高峰 （遗稿）

**编者按**：根据作家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公映，使人们对70年前那场饿死几百万人，殃及3000万人的灾难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那么，在当年，这场灾难是怎样被披露的呢？正如刘震云在小说中写到的，是年轻的《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率先报道，公诸全国，并且引发了《大公报》停刊、他自己被捕，以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后续报道等一系列事件。

本文是张高峰生前回忆的一部分，使用了第一手原始资料，由其子张刃整理而成，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

## 《豫灾实录》

1942年冬，我奉派中原做战地报道，从重庆经陕西到河南，路过西安时，发现大批河南灾民蜂拥入陕，一个个鸠形鹄面，流落街头，衣食无着。到了洛阳，更见一幅灾民图，但闻一片呼救声。

战时的河南，只剩下洛阳到西安一段铁路通车。因此，河南各地灾民扶老携幼纷纷奔向洛阳，准备乘火车逃往陕西活命，洛阳车站里外挤满了灾民。一路走到豫西，到处都有饿倒的灾民和弃婴。这很令我震惊，决定抓住这个线索，深入采访，作为自己到中原后的首要报道活动。

从洛阳开始，我先后到豫西、豫东和黄泛区的临汝、宝丰、叶县、鲁山、许昌、西华、淮阳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年从春到秋，河南全省旱灾、蝗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等接踵而至，加之1938年花园口决口造成的水灾遗患，河南已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狗吃人、人吃人的惨剧，真成了“人间地狱”。而政府当局却不顾灾民死活，依旧征粮、征兵、征税，并且封锁灾情，逼得河南百姓走投无路，不少灾民把妻子女儿卖到“人肉市场”，换取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记者的良心和职责，使我下决心把河南灾情如实报道出去，为3000万河南百姓请命。

1943年1月17日，我向重庆寄出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大公报》改题为《豫灾实录》，在要闻版全文刊出：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著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

---

新闻的产生与对新闻价值的衡量，蒋荫恩特别在“新闻如何产生”中提出：为什么叫新闻？他作了言简意赅的解说：“一定要打破现状。”“所谓打破现状，一般说，就是人与人，人与环境，物与物的改变。所谓改变，就是要看社会上有无改变，一定要看有无变动，如无变动，就没构成新闻发生的条件，改变现状愈大，新闻价值也愈大。”他举例说：“如某报馆采访主任让一个新到任的访员去访问一对夫妇结婚的消息，结果这位访员回来垂头丧气，对采访主任说：新娘跑了，没有结婚，故一无所获。后来采访主任告诉他，殊不知中途逃婚就是一个新闻。而且其中一定有比较复杂的因素。所以，越是现状改变的厉害，越有新闻价值。”那么，如何去衡量新闻？他说：“首先是新闻外表与内容，外表要看内容对现状改变的大小或多少而决定新闻的价值。其次，看结果与影响。一件新闻本身不大，但影响大，特别是新闻本身逐渐进展与内容变化。如谋杀案，开始不知究竟，不被人注意，如果继续追下去，发现案情复杂，又有政治背景，其影响就大。因此，新闻进展与内容变化很有关系，也许开始时很重要，继续追下去，也许就不重要了。所以，新闻本身不消灭，就要继续追下去，才能知其究竟。”■

（作者为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再生的意思)”，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

河南今年(指阴历)大旱，已用不著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记者在此报道一些灾情事实。先说灾区：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有人说，据河南省政府的调查有八十余县。如果真的话，我敢大胆的说，是省政府没有负起详细调查的责任。纵然沦陷的县份不算，也有一百县。况且豫北早有吃树皮甚至变卖女子的惨剧。这已经由私人通信传出，省府何能未闻？专署为何不报？不过灾情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河洛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到天灾。今春(指阴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泛各县黄河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记者去岁十二月由陕西入河南，见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上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时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车到洛阳车站，“难民登记”布告写着麻烦的登记手续，对那些不识字的农民等于无有。没有人用口头讲述，他们始终露天睡在车站上，领不到那里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则永远上不了西行的火车。况且，“难民登记站”始终没有人告诉过难民搭哪次车，他们都是偷偷地钻进月台，不论是什么车爬上去再讲，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他们就苦笑着脸退出来，因之他们父子姑媳经常被截成两伙，又遭到骨肉离散之苦。

记者在洛阳车站曾遇到一位年轻人哭泣着说：“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他们要饭哪！老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我当然同情他，于是我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想给他盖上一个赈委会的图章。谁知我的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甚至有人拿出十元钞票来贿赂我，请我领着他们登车。人太多了，我阻止了他们，更谢绝了他们那种诚心的贿赂。使一人到“难民登记站”去询问详情。那里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人群，我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洛阳街头的景色与往年不同，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的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记者离开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丰是灾情比较重的地方，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里掘青草挖野菜拾干柴，这幅凄惨的逃荒图，这饥饿的路程，使我真无胆量再向豫中深入了。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到叶县我停下来，住在城内的一个寺庙，这里我能更详细的观察灾情与民间痛苦。听说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两氏曾到过叶县，那还是十月间的事。至于救济，老百姓说只是前些日子由某某集团军官兵缩食剩下来一点粮、每人可以分上一升麦。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著吃。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月内就

1942河南大饥荒

底救济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前方的治安。

不是早就看到报纸上说，政府对河南今年从减征购吗？由五百万石减至三百八十万石，可是我们的几个勤务却整天要请假回家，说什么县政府向他家要人，因为缴不上粮的缘故。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吃，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放”，我只可用谎话来安慰他。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

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今天小四饿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哪，这些正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部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一百十二斤要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元，玉米七百元，小米十二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彻

地方救灾情形怎样？省府去年八月间曾派人赴各县勘察灾情，作为请赈或救济之根据。九月初民政厅召集五六七八九各区县长，举行征购兵役粮食运输会议，规定了各县地方救灾办法十二条，条条是道，各机构公务员每人每日节余面粉二两，全月折缴小麦五市斤，或纳代金五元，但迄今灾民未得到半两。九月中旬，民政厅又公布禁止酿酒，以节省食粮，可惜了这庄严的命令，没有收到半点效果。各县救灾会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省府见灾情日重，将原定为以工代赈之三百万元，全盘拿出，分配给各县，有的分到四万元，有的分到一万五千元，这真是车薪杯水，而且在我住的叶县寺庄，灾民还没有分到一分钱。

由现在到明年五月间，所谓“麦口”的时候，还有五个多月，这么长的饥饿时间，怎样叫灾胞挨过？且亦非河南自己力量所能解决。捐钱来救灾，不如直截了当运粮来，给灾民一点米汤水喝。

顷闻政府拟拨平粮贷款一万万元，救济豫灾，这的确是可喜的消息。有人说河南现在已见透雨，遍地绿苗，似乎说明年（指旧历）麦子丰收无问题。这种骗人自骗的说法，我们要揭破。其实明年麦收问题最大，纵然目前不落透雨，遍地麦苗也会绿色，现在尚难得看出来收成。问题是谁来春耕，逃荒的逃走了，耕牛杀绝了，耕具当柴烧了。更聪明一点的人，应该往这些问题上想想。如何救济目前的灾民，当然是急待解决的问

题。如何使逃走的灾民回来春耕，如何防止宰杀耕牛，也应该同时注意。明春的河南国防问题也不容许忽略！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饿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著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元月十七日于豫西叶县）

文末注明的“叶县”，是当时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就是说，我揭露河南灾情，并没有想到会触怒政府和驻军，更不知道自己“闯祸”了。

对于通讯标题的改动，我不太满意，觉得太客观了——“实录”就是照实记录，显得比较平淡。原题观点明确，读者一看便知道河南人民没有饭吃了，而这正是我写报道的目的。总编辑王芸生则说，改题是为了通过新闻检查，“题目不可过于刺激”。

不过，让我感动的是，《大公报》敢于把一个24岁年轻记者如此尖锐地披露灾情、批评政府的报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不仅冒了相当的风险，更表明它作为一张有社会责任感和广泛影响力的大报的用人之道和独特风格。

2月2日，《大公报》又刊出王芸生所撰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评论说：

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乾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百姓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 停刊与逮捕

《大公报》的报道与社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河南省籍的参议员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为灾民呼救，人民咒骂“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马瘦，后方猪肥”，表达了对重庆花天酒地、河南民不聊生怪现状的不满。

不料，这一切都触怒了当局，2月2日当晚，军委会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造成了轰动后方的一段新闻公案。王芸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蒋的秘书陈布雷则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蒋的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停刊事件也给《大公报》带来了“意外收获”。当时《大公报》日销6万份，而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三日“节省”了18万对开张；报社员工还得到三天休息。那年2月3、4、5日适逢农历腊月廿九、除夕和正月初一，平时难得进城的报社职工正好利用来采买年货。而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被处罚，都想看看报道与社评，于是到处去找报纸。又怕下次有重大新闻看不到，就赶去报馆营业部订阅，结果销路大增，复刊后《大公报》发行量增至10万份。以致重庆同业见到《大公报》**（下转第90页）**

# 假如郭小川活到今天

## ——为郭晓蕙《大惑：郭小川的一九五九》作序

○　邵燕祥

在郭小川研究方面，郭晓惠是兼有亲属（女儿）身份的研究者。小川亲属们在编选文集时坚持保持原件原貌，并且公开小川私人档案（如1957年日记），不为贤者讳，这一开明求实的态度，大有助于我们和将来的人不仅从已发表文本，而且从草稿改稿日记书信，不仅从表层，而且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小川其人：他的天性，他的教养，他的品格，他的价值观，他内心世界中的矛盾……

曾有人写过“假如郭小川活到今天”的文字，寄托对诗人早逝的叹惋。晓惠这本书把握住小川四五十年有据可考的心路历程，细数他从青少年苦读到投身革命，从惟党之命是从到大惑不解，又屡经颠踬以求解惑的步履维艰，最后实际指出了他如果不死终将走上的路向。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然而，设想小川一直活到今天，不失为一种温故知新的思路。

所谓今天，距小川之死已经36年。活到今天，意谓要把既往的36年时光，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过来。

起步是容易的。遥想1976年10月，小川即从安阳进京，马上加入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队伍当中，还会连夜写出热情澎湃的新诗，准备拿去同在团泊洼写的《秋歌》一起发表，一起朗诵。小川有其软弱的一面，由于他“吃党的奶汁长大”，一当迫害者以党的名义出现，他只能束手就缚，而他宏图远志，是要做“伟大的战士”的，他的性格的底色是坚毅，他不会认输服软，而总要参与。可以想见在全民声讨“四人帮”的大气候下，他如闻将令，必定又要“走向生活的中心”，“迎向生活的狂澜”，矛头自然指向当时斗争所限的“四人帮”。

与众不同，即与一般的作家、干部不同的，是此刻他可能真的接到了将令。他与党的高层如王震将军因历史渊源一直有私人过从，1975年秋，邓小平一度主持工作时，在王震、纪登奎干预下，专案组宣布了郭小川“没有问题”。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还接见了他，委派他考虑文艺界的事情，后因情势有变，让他到外地暂避风头，他才去了河南林县的。

现在风向大转，这些领导人是不是又要叫郭小川抓一下文艺界的动向？小川虽然十分头疼文艺界（首先是此界的许多头面人物），但他从来是按党的教育“以大局为重”的，他能不“勇于担担子”吗？作为可以信赖的老同志，又正当年富力强，郭小川出任文艺官或宣传官的提名，想来不会排在贺敬之之后。

这就使我们在假设后来文艺界以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郭小川以首先是领导干部其次是诗人的身份定位，如何进退周旋，呈现多种可能，不好简单判定。

但在大方向上是肯定的，他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之所谓“右派反党集团”的平反，不会像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那样有所保留，因为对他“右倾投降”的指责，就缘于他1957年初起草的文件要求作协党组向丁陈道歉；他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也不会像某些人那样作梗，更不用说对作协被划右派的人，他本来就多有同情，据说当年在他努力下曾使作协少划了30%的右派。这些都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流势所必至，他有从延安“抢救”到十年文革的亲尝体验，对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实质了然于心，对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以及再也不搞政治运动的承诺，自然会是衷心认同的。

胡耀邦主持的另一件大事，即掀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曾经做理论宣传工

作的郭小川看来，这正是从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他自然也会无条件地赞同。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小川会自然而然地响应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拥护党中央确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走向改革开放的路线。

随后，郭小川理当应召参加理论务虚会，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是惯于思考也勤于思考的人，有了文革后期再度挨整之痛，在毛泽东去世后虽然本能地想写悼诗，却不像追悼周恩来时那样发自肺腑，得心应手，一气呵成，竟不得不半途辍笔。毛的造神偶像，在小川潜意识中已经崩塌。三中全会前为彭德怀（还有陶铸）平反的大会，必定触及他关于1959年的沉重的记忆。晓惠以为1959是小川的“大惑之年”，盖因流年至此，惨遭“帮助”。其实，他这次被围剿时的诸多罪名早在此前两年的1957年已经凑足，换一个人，有其中一条两条，就够打成右派了。只是作协落网的人已多，丁陈一案占了文艺界大半边天，加上周扬实际上放小川一马（我以为周扬是有意把小川送他审阅的《一个和八个》积压下来，没有让它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就成为“毒草”典型），小川于是等于缓刑二年，从反右派斗争漏网。这样，小川在1959年正满40周岁的“不惑”之年才遭遇“大惑”，并且要到1976年才接近解惑的。

郭小川（1919—1976）

小川在理论务虚会上是否发言，表态，这该是一个重大的选择。按照他在团泊洼后期的激烈情绪和他一贯“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如他当年说的，“我这条命，打仗的时候没丢，现在就得干”，那么，他也许会就文革作一个带有他的风格的批判性发言。这将在他未来一段仕途上引起争议，甚至成为某一派攻讦他的“把柄”。然而，在接着下达“四项基本原则”时，他又多半会投赞成票，就像在1956年他不反感而且认同所谓双百方针引发的有限度的宽松，而到了1957年初，他却又会面对“闹事”“反官僚主义”“干预生活”等一系列纷至沓来的社会动向忧心忡忡，而向青年读者发出要“警惕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的预警。这是他重温延安整风批判王实味等时人人自危的经验，同时也是维护党的领导、维护体制的思维定势。他虽然认识到个人迷信导致独断专行的错误决策，然而他会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党的领导切割开来。这也将会是他竭诚拥护不久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思想条件。他在文革中检讨强加于自己的罪名时，依照流行的公式归之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卸下了个人头上那顶帽子，但他还会视“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危害党的领导的政治倾向。多少年来，小川把主流意识形态当作不可逾越的真理，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观念和实践，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干部的骄傲，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石，绝不会轻易动摇。然而，这也是小川在粉碎“四人帮”后历史反思的出发点。

设想他参与或听说了胡耀邦主持关于有争议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的座谈会，他会认同对待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取这样一种温和的方式，比起1959年对他的《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的围剿来，真是文明多了，“与人为善”，且讲道理多了。对根据小说《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的批判，经过政治博弈最后仍按照文艺问题结案，比起1959年或上溯整个50年代动辄大批判，小川也还会感到领导方式上的“新意”。

设身处地揣想，当郭小川把50至70年代作为参照时，他的理性必将认定80年代的当下，是较前大大进步了。他会肯定这一进步，不会跟着反对改革开放的某些政治大佬跑，这符合他的认识和天性。以他的智商和品格，他不会出于个人目的，无理取闹甚至无中生有地夸大其词，乱扣“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的政治帽子。但

在1983年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受挫又在其后折腾“反自由化”的年月，政治风浪起伏不断。这是小川从50年代就表示从心眼里厌倦了的“必修课”，但若是由于他的资格、名望和能力乃至职位又不允许逃学，他就势必再一次面临真心和违心、道义和利害、良知和纪律之间的重大抉择，他内心的矛盾，绝不会弱于他生前的50至70年代。特别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经常出现“站队”的考验，他与若干高层领导的关系对他的进退出处会有很大的影响或干扰，这在我们虚拟郭小川假如活到今天时，便出现许多未知数。

特别是一入官场，就难摆脱现行模式运作的惯性，历史的政治的人情的关系的藤牵蔓扯，让被动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谓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以此。除非极有人格独立的自觉，壮士断腕的狠劲，很难不为人事关系左右。这是令人担忧的。

不过最终时间解决问题。人总是要老的，取消了终身制后，干部总是要离职要退休的。我们一定能够看到郭小川同志高高兴兴毫不恋栈地离休，赢得他远在中年就无限向往的充分的个人写作时间。他既告别了不得不虚与委蛇的令他厌烦的官场，也不再有怀着各样打算的人蝇营于他身边。他在构思自己计划中的史诗型作品同时，可以有更清醒更冷静的心情来回首平生，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人对事的看法。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什么僵硬的教条，而是刻骨铭心的鲜活的感性经验。

举例来说，小川在文革中的检查里说到他在1957年后“复杂的思想感情”：他“对周围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批人勾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恶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们从小川当时日记中的具体叙述，就可知这样说绝不是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贬义的“清高”心理，而正表现了他对人对己统一的是非观，善恶观，美丑观。郭小川是正派人，不论从家传父教的传统道德角度，还是从后来接受党所宣扬的应有作风看，都是如他自律的“守住原则，注意团结”，他所看不惯的，不是出于成见或偏见，而是事实如此。虚伪是恶行的温床，而在某种邪恶的蛊惑下，恶行可以抛掉伪装公然为之，那不就与“土匪窝”没有什么两样了吗？而郭小川当时“周围许多人”还都主要是文艺圈子的干部以至领导干部。这还不叫他从失望到绝望吗？

以上所说我对“假如郭小川活到今天”的大致设想，都可以在晓惠这本书里找到依据，至今值得肯定和应予否定的言行表现，都可以从而找到认知的根源，气质的根源，体制的根源和特定时空人事的影响。这是应该感谢作者的。

从现有的材料，看不出小川曾在文革以前读过南共原领导成员吉拉斯（旧译德热拉斯）著的《新阶级》（内部发行）一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能不用依靠书本，而从实际生活中读到了特权集团形成的“新阶级”及其在各方面的具体表征，这成为我们置身的社会中日益扩大的阴暗面的主导。文革印证并加深了他的这一感知。他临终前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以一霎时的闪光燃起他的希望，他是在希望的陶醉中离去的。假如他活下来，他将会在嗣后至今36年中，在这一感知上叠加新的感觉材料，形成他对结构性腐败和特权利益集团的理性判断。这在小川是难以避免的，你让他满足于“含饴弄孙”，抱着“国家事管他娘”的态度等死，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符合他的人生理念的。于是，“假如郭小川活到今天”，我们将对他的不加掩饰的爱憎，一仍其旧的忧郁、苦思甚至悲愤，持理解的同情、同情的理解吧。

别的不说，我相信小川在文革后，一定时段内会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而单是一旦在对待最近十年（1966-1976）间的历史有所谓淡化或模糊处理的“领导要求”时，必然同他渴望真实地抒写时代史诗的宏大志愿相抵触，他还能长期保持虚假的一致，而不是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吗！？

重复一句，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假设也没有实际意义。但我们所知的郭小川，毕其一生是真理的追求者，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如果置身在晚近的36年里，在历史的曲折反复中，必定会秉持良知，摆脱谎言和迷惘，回归常情常识常理，郭晓惠所达到的认知水平，郭小川难道不能达到吗？那是不可想象的。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的历史眼光，使我们引为欣慰，在这种眼光烛照下对小川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解析和诠释，让我们也替小川感到慰藉。■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鲁迅嘉言录》献词

○ 曾彦修

## 一 鲁迅是全民族的鲁迅

鲁迅的作品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大学课程及其他一些读者中,渐渐出现了一些困难局面,因而不得不在某些语文课程中减少一些或更换一些。这一现象迟早是会出现的。原因是,解放以来什么都要拉到“阶级斗争”上,甚至说在学校里,阶级斗争必须是一门主课。数学、化学等是很难扯上阶级斗争的,于是,鲁迅的作品,自然就被拉来充了数。教师不得不为此勉强陈说,学生则弄不通是怎么回事,积久至今,问题终于爆发:一些教师敢于公开提出这个问题来质疑了。

如果你坚持那样做,那么可以肯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叫名为尊敬鲁迅,实则是孤立鲁迅。

鲁迅根本上是一个激进的思想启蒙家,他的思想像“惊蛰”的春雷,他是第一个在黑夜沉沉的旧中国,震动了一些神经敏感的知识分子的灵魂;然后又经过这些知识分子,起而唤醒全民从专制、愚昧、残暴、封闭、落后、保守,特别是“麻木”等等传统包围中的灵魂觉醒过来。正是有了鲁迅的这第一声“呐喊”,中国才开始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人”字——更出现了一个女人也是“人”的观念。

研究鲁迅的思想,究竟是前期(1927年以前)重要、还是后期更重要呢?这就是说,是把鲁迅究竟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的发现者、勇猛的“启蒙”思想家重要呢?还是把后期(1927年以后)的“革命”作家领袖、左翼文学家的精神领袖更重要?两者似难分伯仲似的。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从三千年历史发展的大局出发,从已过去的八九十年的历史看,对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华民族民族素质的改善来讲,那就恐怕还是前期的鲁迅即“启蒙思想家”的鲁迅,比后期重要得太多了。解放后几十年,我们是只把鲁迅作为一个服从“阶级斗争”需要的革命工具来使用,这就越来越降低了鲁迅的历史作用。但从根本上说,鲁迅应该是一个与广大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如果过分坚持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去评价鲁迅,那就会把鲁迅弄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片面,越来越成为整人的工具。

从根本上讲,鲁迅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旗帜,共同骄傲的。我们国家今后的处境,是外部压力不断加大,这更迫使我们不能不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去多寻求一些全民族的共同之处。而鲁迅恰恰就是可以成为全民族的鲁迅的。一个民族,只有在文化上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文化上有了强烈的认同感,这个民族才可能历久不衰,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中华民族恰恰具有这个三千年,以至更长若干千年的夹有传说时代的共同历史,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把历史人物统统打倒了,只剩下武有秦皇,文有鲁迅,这是置鲁迅于何地呢?鲁迅会要这个恩宠吗?会不大骂吗?我们今天应当十分理智而又理直气壮地大呼:鲁迅是属于我们全中华民族的,他是为我们全民族的利益奋斗终身的。

## 二 鲁迅是一个空前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根本的历史功勋是在中国发现了一个“人”字

鲁迅着重传播的正是欧美15世纪的五个世纪以来,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以来,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种种反蒙昧、反专制、争人权、争自由、争平等的思想。鲁迅的伟大之处,特别是在他不是简单地介绍上述这些进步思想、而主要在他是结合批判中国的腐败思想、制度一起来勇猛地进行的。这一巨大特点,确实是其他成千上万的欧美留学生所远未能办

到的。说得确切一点，是鲁迅一人在中国有点近乎独立和力竭声嘶高声呐喊，中国才有了“人”的发现的。如果离开了这件根本重要的事情，还有什么鲁迅的伟大历史贡献可言呢？鲁迅的伟大是在中国宣扬了“人”，而不是“阶级斗争”。这才是历史真相。鲁迅对自己的战斗往往感到十分孤立，以至于他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说出了这样的话：“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像唐·吉坷德一样日日夜夜地战斗，不知疲乏。但鲁迅战斗是为了推动历史向比较合理、比较光明的前途发展，而不是为了倒退。1949年后，把鲁迅一生的历史价值，几乎完全甚至仅仅着重在他晚年反对国民党专制这一功绩上了。其实，这只是鲁迅思想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部分，那样说其实是从根本上大大降低了鲁迅在全民族的伟大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

我以为，研究鲁迅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首先把鲁迅请下神坛，实事求是地来研究鲁迅一生的著作才有可能。几十年硬把鲁迅定为某个阶级、政党的代言人的做法，其实恰恰是孤立鲁迅最有效的做法，结果正好是把鲁迅的全民族伟大代表的资格取消了，至少是大为降低了。真是可惜！

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一些文章中都多次自称自己和其他战友们所从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工作等。但这不等于鲁迅的一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更不等于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者了。鲁迅说，他为了同创造社进行理论斗争，才迫使他这个“封建余孽”不得不赶快学一点马克思主义。他说，他看出对方的马克思主义不像是真的。所以他自己要去看看真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具体地说，他最主要的师从或参考对象是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而并不是一个在各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者。须知，鲁迅最最坚持的是“理性”，而不是“信仰”。要服从“理性”，就必须要有批判精神，而“信仰”却是绝对的、不能怀疑的。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绝不做任何人、任何理论的“信仰者”。因为一涉及“信仰”，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就意味着你必须放弃思想自由。这一点，对鲁迅是绝对办不到的。千万不要以为把鲁迅往马克思主义方面一拉，就是提高了鲁迅的地位。世界上何止千千万万个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成为杰出思想家的有几位？而鲁迅恰恰是个伟大的思想家。

## 三　鲁迅一生最根本的目的，是在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鲁迅这个思想家伟大在什么地方呢？根本上在于他梦想要改造中国人民的灵魂（国民性、国民精神、民族素质等，含义均相同）。这点，鲁迅自述的很清楚。在日本学医的时候，他在课堂上看见一种小电影，是1905年日俄两国在我国东北土地上进行战争时，日本杀戮被沙俄军队强拉去服务过的中国人（同样，日本更强拉中国人去为他们服务），当众斩首示众：被屠杀的是中国人，一大群看客也是中国人，可是一个个都木然地等待着，没有表情。因此，鲁迅痛苦极了，立刻放弃医学，他说多治好几个这样的国人，不过多增加几个这样麻木的看客；因此，他首要的任务，是先治好民族的灵魂。于是，鲁迅立即放弃医学，改宗文学。他要先医灵魂。于是，《狂人日记》出来了，《阿Q正传》出来了，《灯下漫笔》出来了，于是，鲁迅的文章像一座座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一个民族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层是被鲁迅惊醒了！这些，才真正是鲁迅最重要的伟绩，对全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最伟大的贡献。

从近代的历史全局来说，鲁迅所集中追求的是国民性即民族灵魂、即现在说的“民族素质”的改造、提高，这才是鲁迅思想的真正精华所在。这是千古也不能改变的。改变了这点，鲁迅就被彻底改变，降低，而根本不是鲁迅的真面目了。因此，好几十年被抬上了神坛的鲁迅，是被化了妆的鲁迅；表面上似乎提高了，实际上却正是大大被降低了历史地位的鲁迅。

强调改善和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好像有点“唯心”似的。但二战后有两个国家是现实例子。（西）德、日两国被打成一片焦土了，什么东西也不大有了。但在它们被剥去侵略其他民族的可能性后，就全民苦干，拼命治疗焦土，恢复疮痍，国民往往不要任何报酬，一天可以劳动12小时，还没有多少好吃的（这些是1980年我去过一次日本，是从中国回去的年轻翻译们对我讲的，中年以上的人从不讲这些，大概是出于某种顾

虑)。二战后,全世界恢复最快的是哪两个国家?是战败国西德和日本。

近十几二十年来,有一位本行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女学者资中筠女士,看来已是全心全意地转注意力于倡导提高“民族素质”(即鲁迅文中的“国民性”)这方面去了。我以为,她是一位全心全意的鲁迅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她现在的形势还是在孤军作战,国家的真正危险也就在这里。

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充满了唯官、唯金、唯名的三唯主义一类东西,越来越猛、大有气吞山河之慨,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深入到普通人群的骨髓中去了。这对改善一个民族的质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大逆流、可怕的很。而现在大势所趋,又正是在全力地催肥着这类东西。其中尤其是“唯官主义”,它的害民程度,是远比“非典”要可怕得多的,它是确确实实的亡国之根。唯官主义是利之所在,全民追求的,能怪愚氓吗?要改变唯官主义的趋势,关键不在唯官主义的信奉者,而在唯官主义的制造者——有了官,就有权;有了权就有一切。

国民生产总值上去了,国民素质呢?前途是什么呢?敢想象吗?

## 四　上海进步文化界对鲁迅是中国的“民族魂”的推崇永远有效

须知,1936年10月在鲁迅去世后,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着的书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幅(沈钧儒老人题字)的评价,在中国是应该永远有效的。今后我们还得回到这个认识上来,而绝不能把鲁迅简单地当成一个鼓吹无产阶级艺术或打倒国民党政权的旗手。因为,不管革命也好,无产阶级艺术也好,打倒独裁政府也好,鼓吹并坚持为奋斗终生的革命志士实在是不少的,但看出并坚持要改造民族灵魂的思想家,却至今只有鲁迅一个人。(注:刚写到此,得读上海《文汇读者周报》2013-3-12),有一短文名《〈贺黎烈文全集〉问世》,作者陈子善。文末有如下几句:“今天的青年不读点鲁迅,对鲁迅敬而远之,不是鲁迅的损失,而是他们自己的损失。”这真是一字千金,特转介于此。

另外,还要特别指出一点,鲁迅有一些论点往往是泛指全民的,他不会说漂亮话骗人。例如,他说暴君的臣民往往比暴君更暴。这只有鲁迅才敢这样坦然,这样说真话。他不会说“劳动人民”不在此限之类的套话。鲁迅是为了改造全民族的“国民性”,他不得不如此痛下针砭。不对吗?一个“文革”,难道不是把鲁迅的话加倍地证明了吗?

## 五　本嘉言录编选的一些说明

嘉言录就是语录,在中国本来就是一种书籍形式。今用“嘉言录”,自然是因为“语录”二字在十年“文革”中太使人恐怖了的缘故。

本书是为了继承鲁迅的人道的、批判的、改革的、开放的、科学的、民主的、建设的、富强的这些精神而编选的,简称为科学、民主、富强也可。希望读者从此书能够较集中而又多少得一点鲁迅思想的真面貌,并择其所能学者而学之,那就是编者的无上快乐了。

但,摘录工作,困难颇大。例如,鲁迅早期有不少长篇文章,是杂文似的论文,也是论文式的杂文,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等,很长,它们是鲁迅早期的名著,内容甚深刻,但行文如剥笋,是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的,节选起来很难。因其时代意义、历史意义非常重要,现在节录虽少,仍必须费力去选,类此者颇多。

鲁迅的诗作均甚凝练,不拘一格,本书选录时,艺术政治兼顾。文学散文与小说,一般不选,因为那确实很难节选。但如果实际上是鲁迅自己在发言的,如《狂人日记》之类,则作个别例外。

此处要郑重声明一点:鲁迅在已经公开的文章中,曾明确声明过,他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前,长期是“进化论”者,之后即转为明确的“阶级论”者了。这一点,在“嘉言录”中是无法作出区别的。特此声明。此外,鲁迅有的短文,非常好,但今日使用,注释往往要长于正文多倍,也不得不放弃。

编完这本小书后,编者有一个重要感想:鲁迅研究恐怕是要较大地放开手足,任人研究才行了。事实在前,结论在后的方针,永远是正确的。这首先要跳出几个框框:最首要的是不要再把鲁迅供奉在神坛上,再不要以拜神式的方式来代替研究了;

第二，不要把鲁迅在1927年以前与1927年以后，即把“进化论”的鲁迅与“阶级论”的鲁迅划的那么一刀两断，对鲁迅在历史上的客观价值或客观历史地位，绝对只能依据客观历史实际来论述，而不能简单地定他为“前贤后圣”（即进化论时期是贤，阶级论后是圣）了。事实上，这在鲁迅的身上是并不矛盾的，他的“进化论”观点明显的是坚持终身的；第三，对鲁迅采取完全否定和辱骂态度的，这二三十年就不少；今后当然会继续有，或者会更多、更厉害了。这不可怕。关键仍然在一些专家身上：写出新的作品来。

我早有编此嘉言录之心，具体动手，是在2011年我满了92周岁之后。根本的推动力是由于责任感：在我接受遗体解剖之前，还能不能干成这件事情呢？编成后，我或自费印出送人（如果能出版自然更好），这也可算我对这位伟大的“民族魂”的最后一瓣心香了。

鲁迅曾经叫过一个口号，叫“救救孩子！”我觉得我们也未必不可以狂妄地叫一声：“救救鲁迅！”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鲁迅从神坛与框框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比较自由地去研究他。鲁迅是骂不倒的；但却可能会被一味地、片面地、不当地歌颂所孤立、所淹没。天下事没有例外：凡不能批判的人，都不可能是伟大的，因为这说明他经不起批判。

鲁迅一生梦寐以求的，是中国的富强，现代化与民主化，这同全国人民现在奋斗的目标完全一致。如果一个中国人而对鲁迅思想毫无所知，那实在是很遗憾的，这比英国人不知莎士比亚、中国旧时读书人不知道李白、杜甫，还要不如的。

又，此册虽小，但工作量不算太小，因为反复增删次数太多。其中疏漏之处自还有一些，对此，我就只能告罪了。（又：我编选此书，全部摘印及先后更换引文的繁复工作，均由我的儿子小凉承担，我也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没有他反复的、无穷无尽的修改打印，这本小册就根本无法编出）■

（责任编辑　吴　思）

---

（上接第83页）的人，都说“恭喜发财！”这个结果恐怕是当局没有想到的。

1943年前后，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地处中原的河南不仅是对敌前线，而且遭受着人称“水、旱、蝗、汤”四灾之害。前者是天灾，而“汤”灾却是人祸，指的就是汤恩伯。

重庆《大公报》停刊，河南当局抓人。1943年3月的一天，我在河南突然被漯河警备司令部逮捕，当夜被提审，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共党嫌疑”，据说我的“同党”已在叶县被捕，我还是他们的“领导”，并且从我的住处搜出了《资本论》等“违禁”文字。我拒不承认。而后，又被解送叶县。途中，押解特务连夜把我绑起吊打，企图逼出我的口供去邀功，我坚不吐口。在豫西警备司令部，其参谋长、军法官又先后提审了我，最后押至叶县，由第一战区副司令、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亲自过堂。

汤恩伯明确提出了我写豫灾报道和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发稿的问题，我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因为我确实不是共产党。汤碍于查无实据，无法给我定罪，遂要求我留在河南继续采访，实际上是“以观后效”。我说：“我在河南已很难工作。如果总司令放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地界。以中国之大，哪里都可以给国家做事。”汤恩伯闻言，竟勃然拍案道：“你要是离开河南，你就是共产党!”此后，便把我先后羁押于漯河警备司令部、驻方城七十八军军部，最后又遣送至皖西北临泉县的鲁苏豫皖边区总部，实际上被监管起来。虽然没有限制人身自由，但不准离开汤部辖区。直到1944年4月，中原会战爆发，汤恩伯所部大败，我才于混乱中脱离监管，回到重庆。

【《大公报》停刊事件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关注。随即于1943年2月亲赴河南调查、采访，证实了张高峰的报道无误。白修德的报道于同年3月在美国刊出，欧美舆论哗然。与此同时，他向美国驻华使馆、史迪威将军和国民党政府都作了通报，甚至亲自向蒋介石面陈。事情闹大了，当局不敢得罪美国人，便拿中国人“开刀”。有资料载，白修德在洛阳发稿时经手的邮局发报员即以“泄露机密”的罪名被杀了。如此说来，张高峰被捕，与河南大灾被美国记者“捅”到全世界去恐怕不无关联，他没有被问死罪，还算是“幸运”的了。——张刃附注并整理】■

（责任编辑　杜明明）

# 同一个诺奖，不同的命运

○　陈为人

每逢年底，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吸引着全球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人们的眼球。能获此殊荣的作家，十年寒窗一朝金榜。有人摘取诺奖，名利接踵双喜临门；有人获得诺奖，却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前苏联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与1965年得主肖洛霍夫，获奖后的遭遇和命运，就有霄壤之别。

##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

早在二战后的1946年，英国几位作家就建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此后，每年都把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候选人，年复一年讨论达五次之多，但一直未最后决定。尽管诺奖评委会对评选严格保密，“不到火候不揭锅”，但仍有风言风语传出。国外有文友求证于帕斯捷尔纳克，他回答说：“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传闻，我知道的比大家都要晚……与其说我期望，还不如说我担心这一流言会成为事实。”帕斯捷尔纳克还说：“比利时、法国和西德的报刊上都曾谈及此事。人们看到、读到那些消息，也就谈论开来，后来人们从‘BBC’电台听说，似乎本来是我被提名，但有人考虑到当时的世情，便请求提名机构同意让肖洛霍夫替换我作候选人。委员会否决了该项请求后，提名海明威为候选人，也许奖金会授给他……”

向来公允的诺贝尔奖评委会毕竟也是“地球人”，也受到当年两个超级大国“冷战”思维的制约和牵累，作为非艺术的考量和政治上的权衡，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传言成真”，授予了美国作家海明威。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书在苏联境外出版后，立即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瑞典皇家科学院重新考虑把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当时苏联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话中有话地说：“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明确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肖洛霍夫更为合适。

几经戏剧性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还是授予了帕斯捷尔纳克。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蜂涌而起予以热捧，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日瓦戈医生》一书的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日瓦戈医生》是一本“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但冷战时期这种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思维模式，硬是把帕斯捷尔纳克强行推上了政治舞台。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的作品辩解说：“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就武断地认为是“揭露出专制王国铁幕”的“杰作”，这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

西方的热捧实际上是给帕斯捷尔纳克帮了倒忙，使苏联当局大为恼火。1958年10月25日的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10月25日的苏联《文学报》上，也发表了《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一文，光从题目看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火药味。

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

1958年11月4日，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决不追究，实际上是发出了“驱逐令”的威胁。迫于这种形势，帕斯捷尔纳克于12月29日宣布拒绝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致电瑞典科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

帕斯捷尔纳克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开的,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对我是不可能的。”他在信中检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制度的基础。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都历史地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正宗知识分子遭到毁灭。”帕斯捷尔纳克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不要把他驱逐出境。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反而使帕斯捷尔纳克因福获祸,在随后的日子里,是一个接踵一个的灾难。他此时写的《诺贝尔奖》一诗,颇能反映他的心境:“我算完了,就象被围猎的野兽……我可倒底做了些什么坏事,我是杀人犯,还是无赖、泼皮?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的人,为我美好的家乡俄罗斯哭泣。”

1959年3月14日,帕斯捷尔纳克在散步时,被从住地别列捷尔金诺传唤到莫斯科接受审问,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威胁道,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再不停止与外国人交往,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就在痛苦和压抑中死去。

## 肖洛霍夫获奖后

与帕斯捷尔纳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肖洛霍夫的获奖。

1965年,肖洛霍夫终于如苏维埃政权所愿,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仅仅事隔七年后的这次获奖,却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和热捧。报纸刊物上几乎一个口径地说:“这是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事件。”并且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七年前因把诺贝尔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时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攻击,改口说:“肖洛霍夫那有力的心灵已经照亮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得了世界的公认。……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等等。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出版后,曾遭遇过与他的同伴帕斯捷尔纳克相似的命运。马上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当年许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抨击小说歪曲了国内战争,偏离了苏联的革命文艺路线,是“为白卫军说话”。只是由于得到了高尔基的鼎力支持,小说才得以出版。但到第四部出版时,苏联评论界再次产生激烈的争论,有许多“上纲上线”的批判意见,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说有“非苏维埃倾向”,“肖洛霍夫犯了严重的错误”。

面对当年所有苏维埃作家的共同生存境遇,肖洛霍夫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和智慧”:肖洛霍夫笔下的作品,既有属于主流文学的颂扬倾向,又有反映边缘文学的批判特征,处于主流文学和边缘文学的模糊地带。肖洛霍夫采用了“打擦边球”“见了红灯绕着走”的生存策略和写作策略。他极善于对领袖察言观色,得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代领导人对他的青睐,成为“三朝红”;他极善于对现状审时度势,在一个接一个针对文化领域的运动中,能有惊无险地“安全着陆”;他很能把握分寸,清楚什么时候该冒尖,什么时候该缩头;他很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什么时候该激昂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不语,什么时候说话可表现作家的个性棱角,什么时候说话必须罔顾左右而言他;他深谙“石油换大米”的交换原则,以某种妥协得到出版的机会,以局部的牺牲获取关键的成功;肖洛霍夫以自己惊人的聪明才智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肖洛霍夫是苏俄文学史上唯一一个既获列宁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又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既能为对苏联持批判观点的西方知识界所称许,又能被本国统治阶层所接纳,什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肖洛霍夫真可谓左右逢源。

苏俄文史学家提出有“两个肖洛霍夫”的观点。一个是作品中所显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苏联文坛上所表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事业摇旗呐喊,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

肖洛霍夫；一个是进入自己文学世界，作为民众疾苦的呼吁者，求真求善的寻道者的肖洛霍夫。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这样高度赞扬肖洛霍夫："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心灵深处对人性的崇高敬意。"然而，肖洛霍夫并未"文如其人"，与作品中展现的形象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坛的口碑很不好，留下了许多劣迹：

肖洛霍夫嘲讽地称帕斯捷尔纳克是"寄居蟹"，不言而喻就是诽谤帕斯捷尔纳克是寄居在苏维埃红色政权内的异端分子。肖洛霍夫还攻击苏维埃另一个诺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当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国外发表，肖洛霍夫在一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上，公然指责索尔仁尼琴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并且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他指出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政者要对两位作家达尼哀尔和辛雅夫斯基（笔名阿尔夏克、杰尔茨）进行公开审判，理由是他们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了作品。这次公开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62位作家联名发表抗议信。许多人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而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并且直言不讳地干脆要求"枪毙这两个败类"。肖洛霍夫扮演了一个为虎作伥的角色。

对肖洛霍夫如此公开的卖身投靠，以至84岁的著名老作家茹可夫斯基的女儿，诗人利季娅愤然写信给肖洛霍夫说："您和我们大家都同样清楚地知道，俄国诗人始终是站在被压迫的人民一边的。您的发言把您置身于俄国传统之外。可惜我们不能惩罚您；不过您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了，罚您多年来创作力枯竭。"

国外的媒体甚至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出：对于这种违背诺贝尔设奖本意，迎合专制独裁政权的主流话语，丧失一个作家人格的获奖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诺贝尔奖金。

但是，从斯大林时代血雨腥风中的过来人，对肖洛霍夫给予一定的同情和理解。

杜勃罗留波夫曾为俄罗斯作家笔下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定义为"一群退出战斗的妥协者"。并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他们"否定了跟压迫着他们的环境做残酷斗争的必要"，"走进了一座郁苍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里"，他们攀援上树原本是想寻找一条新路，但上树之后，"不再去探索道路，只顾贪吃果子"。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生命轨迹，为俄罗斯文学史活生生勾勒出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是最好的鉴别。从帕斯捷尔纳克和肖洛霍夫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同经历和命运中，我们感悟到什么是一个作家应该持守的人格立场和道德底线。■

（作者为山西省作协前副主席）

（责任编辑　杜明明）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㈠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㈡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㈢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㈣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㈤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6、57733088、57733087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顾娜、高晶（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代购代邮

| 书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价 | 邮费 |
|---|---|---|---|
|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 资中筠 | 29.00 | 7.00 |
|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 280.00 | 12.00 |
| 邓小平时代 | 傅高义 | 88.00 | 12.00 |
| 走进怀仁堂(一)(二) | 董保存 | 70.00 | 11.00 |
| 我眼中的改革 | [德]汉斯·莫德罗 | 45.00 | 8.00 |
|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 李慎明主编 | 59.00 | 9.00 |
|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 沈志华 | 58.00 | 9.00 |
|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 雷　颐 | 32.00 | 7.00 |
| 观念的水位 | 刘　瑜 | 36.00 | 7.00 |
| 昨天的中国 | 袁伟时 | 42.00 | 7.00 |
|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 孙越生 | 35.00 | 7.00 |
|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 金冲及 | 32.00 | 7.00 |
|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 陈铁健　黄道炫 | 48.00 | 8.00 |
| 我与第二次握手 | 张　扬 | 32.00 | 7.00 |
| 国史札记(史论篇) | 林蕴晖 | 38.00 | 7.00 |
|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 李庆　根志优 | 58.00 | 9.00 |
|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 金　雁 | 68.00 | 10.00 |
|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 陆南泉　左凤荣等 | 246.00 | 20.00 |
|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 萧功秦 | 48.00 | 8.00 |
|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 马立诚 | 39.00 | 7.00 |
| 金正日与朝鲜 | 高秋福 | 36.00 | 6.00 |
|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 张希贤 | 56.00 | 8.00 |
|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 沈志华 | 148.00 | 18.00 |
|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 赵　诚 | 38.00 | 6.00 |
| 孤舟独树 |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 38.00 | 7.00 |
|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 58.00 | 8.00 |
|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 俞可平 | 45.00 | 7.00 |
|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 李锐著 | 29.50 | 7.00 |
| 苏北利亚 | 于　疆 | 22.00 | 6.00 |
|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 吴思　李晨主编 | 72.00 | 12.00 |
| 亲历记(一)(二) | 吴思主编 | 58.00 | 11.00 |
|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 汪朝光等 | 42.00 | 6.00 |
|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 张聿温 | 32.80 | 6.00 |
|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 119.00 | 12.00 |
|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 150.00 | 12.00 |
| 国家记忆(一) | 章东磐 | 98.00 | 10.00 |
| 国家记忆(二) | 章东磐　晏　欢　戈叔亚 | 88.00 | 9.00 |
| 可操作的民主 | 寇延丁　袁天鹏 | 28.00 | 7.00 |
|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 窦应泰 | 38.00 | 7.00 |
|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 杨奎松 | 48.00 | 8.00 |
| 官场怪圈定律 | 李茗公 | 46.00 | 8.00 |
| 黄埔恩怨 | 王晓华　张庆军 | 38.00 | 6.00 |
|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 吴　思 | 28.00 | 7.00 |
|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 88.00 | 10.00 |
| 读史求实 | 杨奎松 | 38.00 | 7.00 |
|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 张　鸣 | 26.00 | 7.00 |
|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 金冲及 | 128.00 | 12.00 |
|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七册) |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 216.00 | 26.00 |
| 母亲杨沫 | 老　鬼 | 45.00 | 6.00 |
| 血色黄昏 | 老　鬼 | 39.00 | 6.00 |
| 血与铁 | 老　鬼 | 39.00 | 6.00 |
|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 老　鬼 | 38.00 | 6.00 |
|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 埃德温·J·丁格尔 | 36.00 | 7.00 |
|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 龚小夏 | 28.00 | 6.00 |
|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 史景迁 | 19.60 | 6.00 |
| 李锐反左文选 | 李　锐 | 22.80 | 6.00 |
|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 杨继绳 | 42.00 | 7.00 |
| 通往立宪之路 | 刘刚　李冬君 | 60.00 | 8.00 |
|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 谢　韬 | 49.00 | 8.00 |
| 高岗传 | 戴茂林、赵晓光 | 59.00 | 7.00 |
|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 冯亚光 | 126.00 | 12.00 |
|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陆南泉　黄宗良等 | 246.00 | 20.00 |
|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 雷　颐 | 29.80 | 7.00 |
|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 杨奎松 | 88.00 | 10.00 |
|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 肖复兴 | 25.00 | 6.00 |
|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 乔云华 | 58.00 | 8.00 |
|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 38.00 | 7.00 |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 49.00 | 8.00 |
| 苏共亡党十年祭 | 黄苇町 | 26.00 | 7.00 |
| 三野名将 | 吴东峰 | 28.00 | 7.00 |
| 四野名将 | 吴东峰 | 28.00 | 7.00 |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 杨天石 | 60.00 | 8.00 |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 杨天石 | 38.00 | 6.00 |
| "中间地带"的革命 | 杨奎松 | 54.00 | 9.00 |
|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 林贤治主编 | 38.00 | 7.00 |
|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 朱　正 | 26.00 | 7.00 |
| 走出个人崇拜 | 冯建辉 | 16.50 | 5.00 |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 薄一波 | 88.00 | 11.00 |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 沈宝祥 | 39.80 | 8.00 |
|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 戴　煌 | 21.00 | 5.00 |
| 夹边沟记事 | 杨显惠 | 34.00 | 7.00 |
| 定西孤儿院纪事 | 杨显惠 | 25.00 | 7.00 |
| 军事学院在南京(1951–1969) | 钟德东　张利娜 | 498.00 | 30.00 |

## 图书介绍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自"苏联解体"这一国际重大的历史事件20几年来,俄罗斯社会并没有停止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追问与反思,先后有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和自传,也有当事人的访谈录,有档案材料的挖掘,也有历史细节的揭秘,还有学者的解析,等等。本书收集了近几年俄罗斯出现的最新资料,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材料译成中文选编成册,资料在编选和翻译的过程中尽量不加删节、全文照译。这些对于深入思考苏联亡国,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以及教训的素材和佐证,供读者研究参考。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它宣扬两种重要的现代价值,一是科学,二是民主。中国的启蒙事业是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在革命、建立党国体制的过程,在内战的过程中曲折发展的。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骤起,启蒙被抛弃,启蒙缺失的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给国家造成灾难。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遭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批判和阻击,更在一场巨大事变之后被强行中止。

中国最近几十年经济突然大规模的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化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反而暴露了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这个警告同样适合于当下的中国。

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一个现代文明秩序,涉及从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转型。今天的中国面临社会转型,思想启蒙的传播将会为改革提供力量。同时,启蒙是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1956年,中共八大刚过去一个月,东欧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波匈事件",紧接着的1957年,中国迎来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反右派"运动……

1957年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付办法,但这不符合毛泽东那自信和自傲的秉性——他从来不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示弱。所以毛泽东继续鼓励鸣放,甚至"引蛇出洞"。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近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继续跟着共产党走,还是会被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论者证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然而,"引蛇出洞"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幻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运动。

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的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了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

用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深度解读中国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 个人出书　家族出书

## ——订制型小数额出版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出版传播机构首倡“三千元五十本起订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模式，五年来编辑、出版个人文集自传、家族家史家谱三千余种，使民间订制型小数额出书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尚!**

**个人出书，历史见证；家族出书，文化传承! 我们呼吁老同志们重视自己的人生总结与家族精神提炼，把我们的求索、磨难、感悟与期盼载诸文字、传诸后世，成为我们人生价值的证明!**

家谱传记出版机构
family tree & biography publish agency

服务电话：**010—6252 5116　　6892 0114**

编印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80

展示接待：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网　　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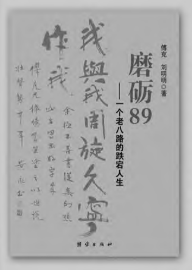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较(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 “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 A类出版作品展示



## B类出版作品展示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 听您讲述人生经历
# 为您撰写回忆录

我们已为千余位主人公撰写了个人回忆录

**您的回忆录是这样诞生的**

◎历史顾问与您共同制定采访提纲

◎访谈人员和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专业撰稿人将您的经历凝练成文

◎资深编辑三审三校

◎设计师为您量身制作精美图书版面

**回忆录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
传真：010-84186201 邮编：100007
公司官网：http://www.huiyi99.com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3年第4期

## 党在法下：八二宪法的关键原则

##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社会报》在改革浪潮中起落

## 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

## 毛泽东与胡风事件

## 同一个诺奖，不同的命运

ISSN 1003-1170
04>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